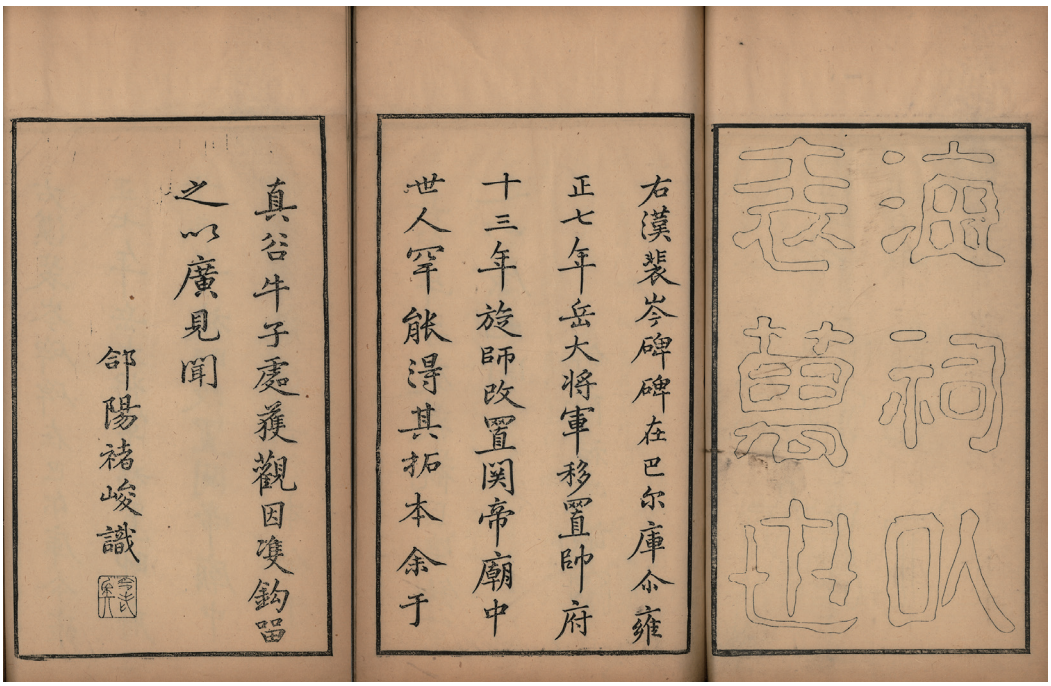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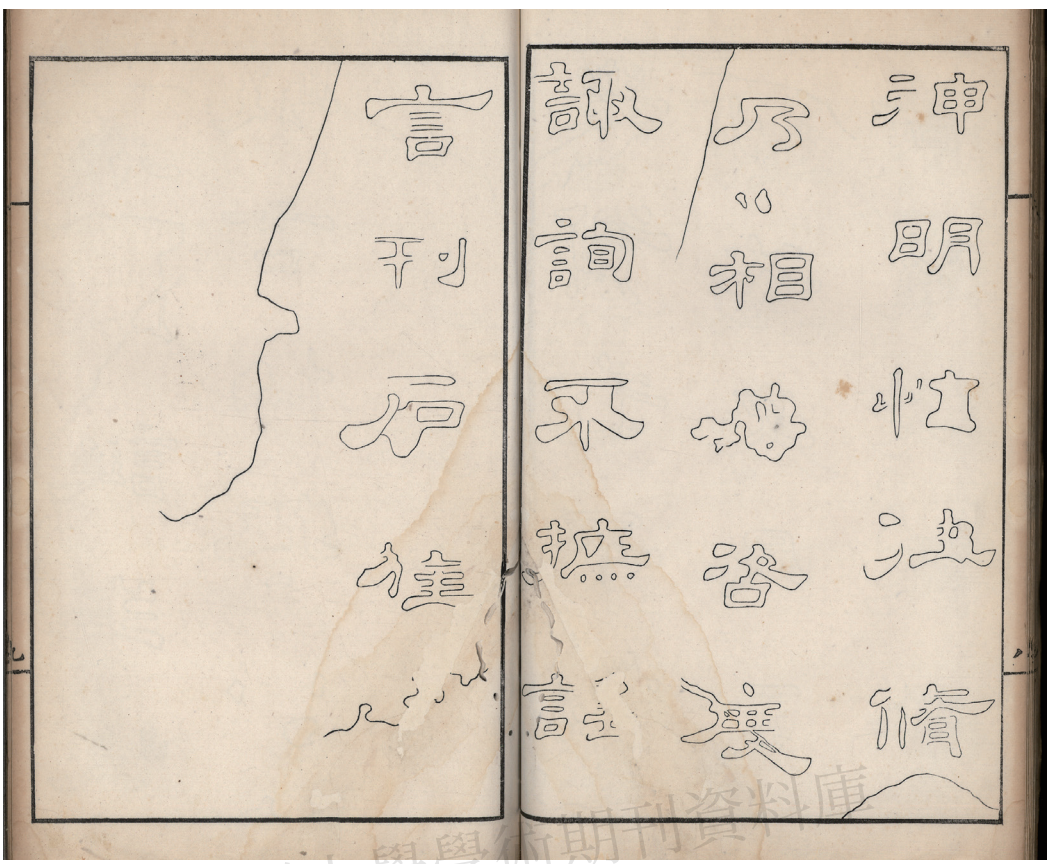


右漢裴岑碑碑在巴尔庫尔雍正七年岳大將軍移置帥府十三年旋師改置関帝廟中世人罕能得其拓本余于真谷牛子處獲觀因摹鈎留之以廣見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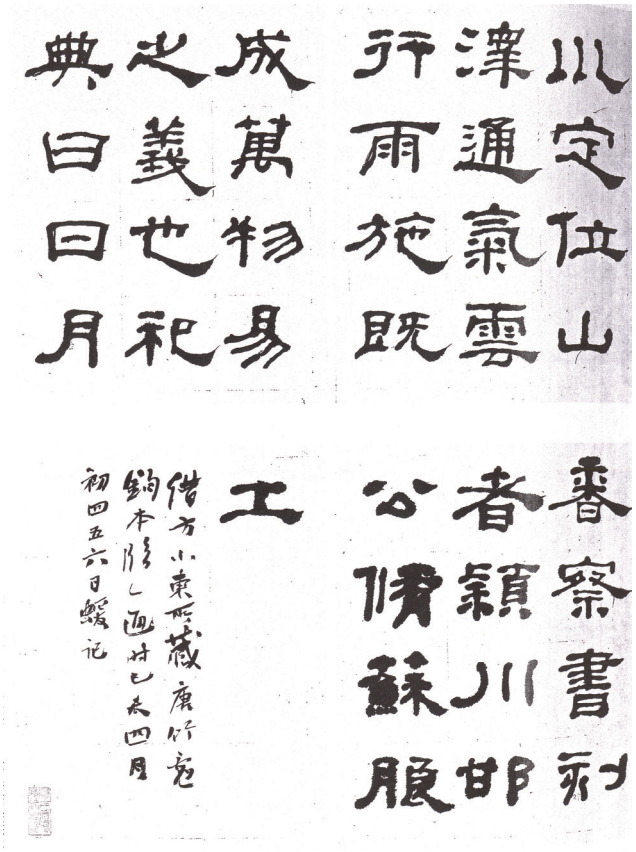
邵陽褚峻識

褚峻　鈎本《裴岑紀功碑》　收入《古歡閣雙鈎秦漢石刻》　上海圖書館藏



翁方綱　《蘇齋雙鈎劉熊碑》　上海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何紹基　《臨唐翊華雙鉤西嶽華山廟碑冊》　湖南省博物館藏



《西嶽華山廟碑》華陰本與趙之謙雙鉤本比較

DOI: 10.6541/TJAH.202109_(51).0003

當雙鉤本成為範本
——以乾嘉以後古碑的雙鉤、刊印與取法為中心*

薛龍春**

【摘要】清代乾嘉以後，大批金石學者與書家在無法得到古碑拓本時，都以雙鉤方式存其梗概，雙鉤本的功能並不止於獲得副本、積累研究資料或是翻刻古碑，它還是人們欣賞的對象以及臨摹的範本。尤其當雙鉤本進入刊印以後，更是化身千萬，成為清代碑學運動的主要資源。本文在討論清代乾嘉以後的雙鉤活動及其功能的基礎上，重點研究當雙鉤本成為臨習範本之後帶來的一些問題。因為脫離了拓本的背景，人們觀看的重點集中到了點畫的起止形狀與邊緣線，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左右了碑學的表現形式、技巧以及趣味。儘管雙鉤印本的目標對象是難以接觸拓本的「寒士」，但許多碑學名家都有臨摹雙鉤本的經驗。即便是偶一為之，他們大量的雙鉤實踐也必然參與塑造了觀看與再現古碑的方式。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雙鉤本也有著與刻帖翻刻本同樣的弊端——如走樣、風格化等，碑學所聲稱的臨碑等於臨摹真跡的合法性也應該受到質疑。

關鍵詞：雙鉤、刊印、拓本、乾嘉、碑學

引言

初唐宮廷的硬黃響搨，儘管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作的一些真相，點畫鋒杪的飛白，甚至一些殘破的痕跡也被精確復現，但與照相術相比，其還原程度

* 致謝：本文在圖片資料搜集的過程中，得到白謙慎、梁穎、高甫、錢松、秦明、方小壯、徐世平、田曉春、劉鵬、仲威、林俊臣、葉康寧、尚磊明、張鈺霖、何炎泉、戴家妙、陳超、張鵬、張義勇、陳霄等師友的幫助；在成文之後，曾寄蔡春旭弟閱讀，定稿之前，錢松兄又細為校閱一過；兩位匿名評審專家也給予許多切實而重要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感謝！

**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 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畢竟仍有相當大的距離，各種《蘭亭序》摹本因此被認為摻入了唐人的當代趣味，而與晉人風韻頗為懸隔。但即使是這樣的複製品，唐代一般的學書者根本無從接觸。

書學範本的匱乏，在宋代以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命侍書學士王著編次、刊刻《淳化閣帖》十卷，通過鉤摹晉唐名家墨跡入木，鐫刻之後再行椎拓，那些深藏秘府的前賢墨跡得以化身千萬。不過，《淳化閣帖》的初拓本相當有限，歐陽脩（1007－1072）記載說：「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① 不管是火災還是其他原因，《淳化閣帖》在當時也是一種稀有資源，能得到初拓本殊非易事。在《淳化閣帖》的示範之下，宋代掀起了一個刻帖的高潮，《潭帖》、《絳帖》、《大觀帖》等各種名目的法帖踵出。雖說由於底本來源的差異，關於刻帖版本的鑒定與評騭一直是宋代以後文化菁英的工作內容之一，② 但晉唐經典畢竟不再可望而不可即。

十六世紀以後，富庶的江南地區讀書識字人口顯著增長，因應著社會的需求，私家刻帖在蘇州、徽州、松江、嘉興等地出現並日漸興盛。在書學與鑒定上頗負盛名的文徵明（1470－1559）、董其昌（1555－1636）等人參與了大規模的法帖刊刻工作，③ 儘管他們本人多有接觸前人真跡的機會，並不完全依賴於這些法帖。雙鉤勒石與原作之間的差距一直為文人所警惕，清初周亮工（1612－1672）已經指出，「雙鉤已隔一紙，況聽命於勒石傭，重儓耳，烏足

① 歐陽脩，《集古錄跋尾》，卷10，《十八家法帖》，收入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編，《歷代碑誌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第1冊，頁96。

② 如黃伯思曾指出《淳化閣帖》誤收南唐時期仿書的晉唐名作，《東觀餘論》（明毛氏汲古閣刊本），卷上，《記與劉無言論書》：「予言《淳化法帖》中有南唐人一手偽帖頗多，如偽作山濤、崔子玉、謝發、卞壺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耳，第三卷最多。今秘閣有數匣子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仿書』，不作傳摹與真跡。」頁39b-40a。

③ 相關討論參見增田知之，〈明代法帖刊行與蘇州文氏一族〉，《書法叢刊》，2009年第2期，頁82-96；〈從董其昌的法帖刊行事業看其確立權威的構想〉，收入孫曉雲、薛龍春主編，《請循其本：古代書法創作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321-3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重？」④ 而出於射利的目的，各種閣帖衍生系統的法帖被不斷翻刻，更加重了知識階層對於刻帖的信任危機。康有為（1858－1927）在討論清代碑學的興起時，徑指其契機正是「帖學之壞」。⑤ 清中葉一些推崇碑刻的學者如畢沅（1730－1797）、阮元（1764－1849），不僅懷疑翻刻可能導致的走樣，也懷疑法帖之祖《淳化閣帖》到底是王著根據墨跡精心鉤摹，還是按己意妄加增損。⑥

碑學萌芽於明末清初，興盛於乾嘉以後，此一時期，唐以前的無名氏碑刻成為書家取徑的熱門。作為一種為知識階層普遍接受的觀點：早期的碑刻皆書丹鐫石，可以視同原作，與輾轉翻摹的法帖相比，具有無可置疑的優勢。除了取法的合法性，眾多漢魏碑刻在十八世紀以後重見天日，拓本流傳遍於宇內，也為學者獲得心儀的範本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然而，檢討清代乾嘉以來的文獻，擁有拓本尤其是名碑拓本並沒有我們想像得那樣易如反掌，即便是一些文化菁英，也常常以碑刻的「雙鉤本」作為研究資料與臨摹範本。刊印手段的介入，使得雙鉤印本比拓本更易普及，自黃易（1744－1802）、翁方綱（1733－1818）等人將碑刻的雙鉤本付梓，後繼者遂不絕如縷，即使照相術在晚清民國被引入出版業之後，這一古碑複製與傳播手段也沒有完全絕跡。

本文在勾稽雙鉤本的出現，乾嘉以後雙鉤本的製作及其功能的基礎上，著重討論雙鉤本與書法學習的關係，尤其是通過刊印之後廣泛傳播的雙鉤印本，

---

④ 周亮工，《賴古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22，《題許有介急就帖》，頁822。

⑤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尊碑第二」，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頁755。

⑥ 畢沅，《中州金石記》，卷2，《昇仙太子碑》云：「予嘗論學書之法，臨帖不如臨碑。碑則古人親自書丹，當時摹刊，求其神采，宜得十分之九。其見於法帖，則傳之百數十年，紙墨漫滅，或是後人臨摹贋本，賞鑒家誤以為真，俱未可定。觀《大觀》、《淳化》、《絳》、《汝》諸帖所收名臣書，訛錯支離，類皆以私意定之，不足信也。」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18冊，頁13766。阮元亦認為真義、獻亦未必全似《閣帖》，《閣帖》出於宋人輾轉勾摹，未可盡據。見《揅經室集》，三集卷1，《晉永和泰元磚字拓本跋》，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77冊，頁359-3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何成為文人欣賞的對象與臨習的範本，雙鉤本成為範本又如何左右了碑學的旨趣與技巧。需要說明的是，在書法史與金石學著作中頻頻出現的「雙鉤」，是一個具有多重意義的術語。它既指執筆法，也指複製書畫的手段，一種有裝飾趣味的書體，甚至還指向某種用筆方法下的特殊書寫效果。⑦ 本文的討論集中複製意義上的雙鉤本。

一、碑刻雙鉤本的出現

關於雙鉤本的研究素來不為學者重視，程渤〈清代雙鉤摹寫法研究〉一文是目前少見的研究成果。他在文中指出，雙鉤萌芽於宋，微顯於明，大盛於清。王澍（1668－1743）、翁方綱、桂馥（1736－1805）、黃易、錢泳（1759－1844）、徐渭仁（1788－1855）、趙之謙（1829－1884）、楊守敬（1839－1915）等人俱有雙鉤本行世。⑧ 這一宏觀的脈絡性的描述，勾畫出歷史上的雙鉤活動及重要的參與者，但遺憾的是，作者並未注意到宋明與清代的雙鉤，其功能與意義所發生的重大變遷。

宋明時期的雙鉤只是作為刻帖的一道工序，它雖直接關係到摹本與刻帖的品質，卻不是終極產品，所以在清代以前很少見諸記載與收藏。但清代以後，雙鉤卻成為書法複製的重要手段，除了墨蹟與碑帖，一些鐘鼎款識也依靠雙鉤

⑦ 關於雙鉤執筆法的討論，參見孫曉雲，《書法有法》（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頁86-87。關於唐人以雙鉤方式複製書畫的綜述，參見李寧，〈摹搨考〉，《中國書法》，2019年第7期，頁181。關於雙鉤是否書體的論爭，參見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9，《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前銘》，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0冊，頁7333；及楊翰，《息柯雜箸》，卷5，《跋嚴根復藏嵩山三闕舊拓本》，《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50冊，頁384，他們反對王澍將雙鉤作為隸法之一種的觀點。雙鉤在金石銘文中確實時有出現，但很可能只是出於裝飾或是省卻剜刻之勞的權宜之計，如長清孝堂山漢石室東壁榜題「令」、「成王」、北壁榜題「大王車」、「孔子」、「二千石」、西壁榜題「胡王」，波磔都是雙鉤（圖1）。北朝東平洪頂山摩崖《大空王佛》、《摩訶衍經》、泰山經石峪摩崖《金剛經》等，也多見雙鉤不刻的情形（圖2）。關於雙鉤是因擅用羊毫筆而形成的「畫旁皆聚墨成線如界」的效果，參見包世臣，《藝舟雙楫》，「述書上」，收入《歷代書法論文選》，頁641-642。

⑧ 程渤，〈清代雙鉤摹寫法研究〉，《美術學報》，2014年第9期，頁98-1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存其圖像與銘文。⑨ 雙鉤本遂爾成為學者與書家競相追逐之物。而通過付梓刊行，廣佈十方，這些雙鉤本獲得了更大的學術、藝術與市場空間。為了與雙鉤刻帖作出區分，本文的討論將以古碑拓本的雙鉤為中心。雖然這一活動直到乾嘉以後才逐漸興盛，但明代中葉已見先聲。

見諸記載的，如王澍曾見過文徵明雙鉤歐陽詢（557－641）《化度寺碑》，⑩ 都穆（1458－1525）藏有江陰徐充惠贈的《夏承碑》舊刻雙鉤本，⑪ 顧藹吉（活動於康熙間）曾據寒山趙氏所藏《婁壽碑》舊拓製作雙鉤本。⑫ 可知至遲在明代正德、嘉靖（1506－1566）以後，一些漢唐碑刻的雙鉤本已經開始為人收藏，無論是文徵明、都穆，還是趙宧光（1559－1625）、趙均（1591－1640）父子，都是書學與金石學的權威，文徵明曾參與《真賞齋帖》與《停雲館帖》的鉤摹，都穆出使慶藩時沿途訪碑，嗣有《金薤琳琅》之撰，趙氏則有《寒山金石林部目》及《金石林時地考》，他們製作或收藏古碑拓本的雙鉤本，很有可能是作為臨習或是著錄的資料。其時鄞縣豐坊（1494－1571後）與吳門遙相呼應，萬卷樓藏有宋拓《石鼓文》、《西嶽華山廟碑》（即四明本），《夏承碑》華夏（1494－1567）真賞齋本（今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圖3）、丹陽孫楨（1506－1566）本（今藏上海博物館）都有他的題跋。豐坊與都穆、文徵明等人都有交往，嘉靖三年（1524）十二月廿三日，他曾作札向都穆商借《石鼓文》與《武氏祠畫像》的拓本。⑬ 豐坊雖未見雙鉤古碑的記載，但他的同鄉晚輩范大澈（1524－1610）每見佳拓往往鉤摹存副，

⑨ 如吳雲，《二百蘭亭齋鐘鼎款識》（稿本）中有不少文字雙鉤自他人收藏的金文拓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⑩ 翁方綱，《復初齋集外詩》，卷16，《去年見王虛舟書程爽林贈〈姚恭公碑〉事，臨寫於予所藏〈化度寺碑〉尾，并記以詩，今見太倉王雲泉所收〈姚恭公碑〉，即是本也，乃係贋刻，諸老皆誤以為真耳，再次前韻二首，題於〈化度帖〉後》夾註，《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82冊，頁522。

⑪ 都穆因此認為華夏所藏乃偽本，見《金薤琳琅》，卷6，《漢淳于長夏承碑》，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10冊，頁7674。

⑫ 顧藹吉，《隸辨》，卷7，《婁壽碑》，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17冊，頁13056。

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參見陳斐蓉，〈豐坊碑帖收藏研究〉，收入薛龍春編，《歷史脈絡中的收藏與鑒定》（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頁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跋《孟法師碑》云：「褚河南妙跡，無錫秦中翰餘山柱有宋搨本，恨不鉤得。」⑭ 中書舍人秦柱（1536－1585）藏褚遂良《孟法師碑》宋拓本，范以未能雙鉤而感到遺憾。

在1780年代寫給同鄉黃易的信中，杭州金石收藏家趙魏（1746－1825）也多次提到他所蓄明人雙鉤本，如：

> 近得明人雙鉤李斯《會稽頌》篆書一本，出《繹山碑》之上，意欲重摹公世，無如綿力，兄能助我否？⑮
>
> 孔氏刻手最佳，弟有明人雙鉤顏文忠［即顏真卿］《風賦》一冊，海內奇覯，當來與兄謀刊之，知必有子雲也。⑯

這裡提到的孔氏即曲阜孔繼涑（1726－1791），乾隆間有《玉虹樓法帖》叢刻，趙魏希望他收藏的《會稽頌》、《風賦》等雙鉤本能夠通過黃易的紹介，為孔氏翻刻成帖。⑰ 由此可見，流傳到清代的明人雙鉤本並不罕見，收藏也非個例。

在清中葉影響較大的，是錢泳發現的徐樹丕（活動於明末清初）名下的漢《熹平石經》殘石雙鉤本。徐樹丕是蘇州人，精於隸書。錢泳是無錫人，十九歲時與吳門書家游，而鐫碑、刻帖、雙鉤、響搨、臨摹諸事，一見了然。⑱ 1785年，二十七歲的錢泳偶然在舊書肆中購得舊本《管子》一部，中間夾著雙鉤五六紙，皆殘闕不全，不過細心尋繹，仍得五百餘字。因書上有徐樹丕的印

---

⑭ 范大澈，《碑帖紀證》，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第34冊，頁521。

⑮ 收入黃易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4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⑯ 收入黃易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7冊。

⑰ 黃易本人的藏品也多為孔氏刻帖。作為底本的提供者，當能獲得一定的分成。趙魏主動提供，當有一定的經濟目的。

⑱ □穎，《梅溪先生年譜》（清金匱錢氏述祖德堂稿本），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第122冊，頁178。如錢泳，《履園叢話》，卷9，《唐郎官石記序》云：「嘉慶乙丑歲（1805）余在京師，南海葉雲谷農部以此見示，後有王濟之、元美、敬美諸跋，余為雙鉤一本藏之。」收入《筆記小說大觀》（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第25冊，頁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記，故而他認為《石經》雙鉤殘本乃徐氏手筆。嗣後他據此鉤本再次雙鉤，寄海鹽張燕昌（1738－1814）、吳門陸紹曾（活動於乾隆間）諸人。此後，翁方綱、李亨特（？－1815）於南昌學宮、紹興學宮分別重摹《石經》，都使用了錢泳的雙鉤本作為底本。⑲ 這個雙鉤本，錢泳也曾贈予王昶（1725－1806），王據以編入《金石萃編》。⑳ 徐樹丕雙鉤《石經》，只是錢泳推測性的說法，楊守敬認為「即其自作，因覃溪［即翁方綱］據以勒石南昌，已售其欺，遂不肯自道其實」，儘管如此，《望堂金石》中鉤入《石經殘字》所根據的仍是錢泳與李亨特（？－1815）的翻刻本（圖4）。㉑ 值得注意的是，在1790年代以後，錢泳家中再次發現雙鉤《石經》殘字，並曾作札向黃易報告：「弟臥病時偶命舍侄輩翻理破書，復得石經勾本《論語》，是前回未經檢出之字，獲之不禁大喜。」㉒ 錢泳偽造之說，可能只是楊守敬的一家之言。

清代康雍以後，金石家開始熱衷於雙鉤罕見的碑刻舊拓。如淮安張弨（1625－1694）《瘞鶴銘辯》云：

> 況此石見存三十字，已得首尾之大概乎，誠令此石先得無恙，徐圖再摹三十九字與不全一字，並宋人補序三十四字，合一百三字，置於一處，則神物復還舊觀，一以正前人之譌舛，一以啓後來之信從。……亟重刻此本並力疾雙鉤數紙，以待識者且玩而老焉可矣。㉓

張弨是康熙間重要的金石學者，康熙六年（1667）秋冬，他在鎮江焦山發現《瘞鶴銘》殘刻，除了翻刻，也以雙鉤的方式為所見三十字殘石存影。顧藹吉雙鉤《西嶽華山廟碑》華陰本、《劉熊碑》，王澍、吳玉搢（1698－1773）雙

⑲ 錢泳，《履園叢話》，卷9，《漢熹平石經 熹平四年》，頁72。

⑳ 王昶，《金石萃編》，卷16，《石經殘字》：「後金匱錢君泳貽昶重摹雙鉤本，據云檢篋中得之，而不知其所自來。翁鴻臚方綱又合兩家所藏，彙摹其文，刻於南昌官舍，石經殘字存者止此。」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冊，頁291。

㉑ 楊守敬，《望堂金石》，「漢石經跋」，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4冊，頁2866。

㉒ 錢泳，《致黃易札》，收入黃易輯，《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4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㉓ 張弨，《瘞鶴銘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史部第278冊，頁588-5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鉤《夏承碑》，金農（1687－1763）、高鳳翰（1683－1749）、高翔（1688－1753）等雙鉤《西嶽華山廟碑》長垣本，在乾嘉時期也頗受學者重視。《夏承碑》原石不存，僅知明人華夏、孫楨藏本，入清後分別為陸恭（1741－1818）、何焯（1661－1722）所得。吳玉搢、王澍的雙鉤本皆從畢宏述（1662－1722）雙鉤的真賞齋本再次鉤出，翁方綱認為王澍鉤本多出三十字，很可能綜合了何焯藏本的存字。㉔

活動於清雍乾間的褚峻也是一位重要的金石學家，乾隆六年（1741），他以圖像的形式再現碑刻形制，並縮臨全部或部分碑文，成《金石圖》四卷，在當時的金石圈頗有影響。㉕ 他在牛運震（1706－1758）處曾經見到《裴岑紀功碑》拓本，因此碑遠在邊陲，拓本難得，因「雙鉤留之，以廣見聞」（圖5）。㉖ 這一雙鉤本後為濟寧李東琪（活動於清乾嘉間）之父李鯤所得。㉗ 1780年，黃易長兄黃庭（1729－1780）遣戍塞外，為他拓得此碑，黃易將之與自己雙鉤的紀昀（1724－1805）藏本進行比對，發現紀本「立德祠」三字，黃庭拓本作「立海祠」。此時李東琪向他提供了褚峻的雙鉤本，亦作「立海祠」，故黃易認為褚本不為無據。㉘

二、乾嘉時期翁方綱金石圈的雙鉤活動

乾嘉時期，發端於兩宋的金石學迎來了一個新的高潮。無論是證經補史，還是藉此研究小學與書學，大批學者與書家投入其中，「金石」甚至成為一個時期知識階層的時尚。㉙ 雖然碑刻訪求與收藏的範圍擴大到幾乎所有的古代

㉔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20，《跋宋拓夏承碑》，《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82冊，頁211。

㉕ 參見褚峻，《金石圖說》，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2冊。

㉖ 1889年，石宗建古歡閣印行《裴岑紀功碑》所使用的即是褚峻雙鉤本，見石宗建，《古歡閣雙鉤秦漢石刻一冊》（清光緒十五年刻本），上海圖書館藏。

㉗ 黃易藏本，《裴岑紀功碑》，後有李東琪（活動於清乾隆間）1780年一跋，稱其父李鯤藏有褚峻的雙鉤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㉘ 黃易，《致趙魏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㉙ 潘有為，《致黃易札》，見黃易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13冊。參見薛龍春，《古歡：黃易與乾嘉金石時尚》（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頁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字遺存（也包括畫像），但漢唐碑刻仍然最受矚目。尤其是那些已經不存於世的名碑，在拓本極為罕見的情況下，雙鉤本成為重要的替代品。一時參與雙鉤活動的學者甚眾，且大多屬於以翁方綱、黃易為中心的金石圈，如張塤（1731－1789）、宋葆淳（1748－？）、江德量（1752－1793）、桂馥、錢泳、何元錫（活動於清乾嘉間）、趙魏、張燕昌、丁傳（1722－1799）、潘應椿（1759年舉人）、陳焯（活動於清乾嘉間）、董洵（1740－1809）等。從總體上看，此一時期的碑刻雙鉤遠較法帖為盛。

《劉熊碑》是最具光環的漢碑之一，因該碑曾為酈道元（？－527）《水經注》提及，又為歐陽脩《集古錄》、趙明誠（1081－1129）《金石錄》著錄，洪适（1117－1184）《隸釋》則詳載碑文。此碑殘石明代以後不存，所知的只有趙宧光藏舊拓殘本，顧藹吉曾雙鉤一本，為藝林所艷羨。乾隆間歙縣巴慰祖（1744－1793）在杭州獲得另一拓本，字數倍於趙氏藏本，遂雙鉤數本餽贈友人。翁方綱也曾托友人為覓巴氏鉤本，㉚ 1783年春，在收到巴氏所寄鉤本之後，翁有詩云：「較之華廟瘦能疏，始識中郎力有餘。」㉛ 此時他對比《劉熊碑》與《西嶽華山廟碑》，認為有肥瘦疏密之別，所根據的都是雙鉤本。本年五月，他在巴慰祖雙鉤本的題跋中寫道：「得此雙鉤本，使天下學人復見前人之所未見，且所存字已倍蓰於谷口[即鄭簠，1622－1693]藏本，何快如之。」（圖6）雖然只是雙鉤本，翁氏仍生出頓還舊觀之感，更不用說所存之字比清初鄭簠藏本要多得多，因囑友人內閣中書張塤迅速將之梓木刊行。㉜

在無法獲見原拓的情形下，心儀巴慰祖鉤本的不止翁方綱一人，如奚岡（1746－1803）在1784年寫給黃易的信中，也興奮地聲稱：「巴君《劉熊碑》，已得其雙鉤本矣。」㉝ 奚、巴均擅篆刻，亦相熟識，這裡提到的雙鉤本

㉚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17，《水村諾為於徽州巴君俊堂家覓雙鉤劉熊碑本，再用前韻》，《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81冊，頁144。

㉛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26，《題巴俊堂所寄〈酸棗令劉熊碑〉雙鉤殘本，和唐人詩韻二首》，頁235。

㉜ 巴慰祖，雙鉤《劉熊碑》（清乾隆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刻本同時刊入釋文、巴慰祖1781年正月鉤摹後的跋文、翁方綱1783年五月的跋文及與張塤討論書丹者是否蔡邕的一段文字。

㉝ 奚岡，《致黃易札》，收入《奚鐵生手札不分卷》（民國間影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應該也是巴慰祖的手鉤本而非印本。此外，揚州汪中（1744－1794）家藏《劉熊碑》宋拓本，「雖經殘蝕，其字較多於巴氏，且有出於洪釋之外者。」江德量參合巴、汪兩本，重新製作了雙鉤本。嗣後錢泳見到天一閣所藏《劉熊碑》舊拓本，較江鉤本又多出若干字，乃知其所鉤只是全碑的上半截。㉞ 儘管巴、江二氏的雙鉤本比天一閣藏本有所不足，但在其時發揮的作用卻不見得更小，因為主人秘而不宣，有機會得見天一閣原拓舊本的畢竟只是少數人，而通過刊印，巴慰祖的雙鉤本卻得以化身千萬。至1816年秋，翁氏再次根據江氏鉤本重鉤《劉熊碑》，並製作碑圖，「闕者細書，存者大書，其存者復以汪容甫所藏宋拓殘本及巴儁堂雙鉤本合校」，三者相合，得二百四十三字，比洪适《隸釋》的釋文多出九字（圖7）。㉟

翁方綱對《西嶽華山廟碑》的鉤摹也頗具代表性。該碑明嘉靖間因地震毀壞，在清代止存四件舊拓本，分別為華陰本（關中本）、長垣本、四明本與順德本。順德本晚出，在乾嘉時期前三種更為知名。華陰本明末清初為王弘撰（1622－1702）收藏，後歸朱筠（1729－1781），翁方綱曾借以雙鉤一冊。㊱ 長垣本清初為王鵬沖收藏，後歸宋犖（1634－1712），很長一段時間不知下落，但金農、高鳳翰等人皆有鉤本。㊲ 1778年五月，時在太學的桂馥借得曲阜顏氏所摹金農雙鉤本以示翁方綱，翁據此完善了此前雙鉤的華陰本，在當年六月一日的題跋中，翁稱：「按前摹本闕處補全字一百有六，補闕筆及半字

㉞ 錢泳，《履園叢話》，卷9，《漢酸棗令劉熊碑》，頁73。

㉟ 翁方綱，《蘇齋雙鉤劉熊碑》（清刻本），上海圖書館藏，頁15b。此本為葉志詵校梓，汪喜孫以所藏本復校。何紹基認為翁方綱於每行字數未經細按，故釋文多有令人不解之處，他反復推敲，得出每行39字的結論。見《東洲草堂文鈔》（清光緒宣統間刻本），卷8，《記江氏劉熊碑雙鉤本》，頁11b-12a。

㊱ 翁方綱，《華陰東郭王朱標冊翦本》，收入《蘇齋題跋》（清抄本），卷上，頁25a。

㊲ 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清嘉慶道光間儀徵阮氏刊文選樓叢書本），卷2著錄翁方綱摹長垣本，桂馥題跋云：「此西陂宋氏完好本，金壽門、高南村所鉤並出於此。」頁10b。金農雙鉤長垣本著名于時，周懋源詩云：「雙鉤誰與留遺形，壽門、芑堂相繼起。壽門雙鉤鉤長垣，芑堂雙鉤鉤四明。」見方朔，《枕經堂金石題跋》，卷3，《雙鉤長垣本漢延熹華嶽廟碑跋》附周小農茂才懋源《題後七古》一首，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19冊，頁142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一十有六，於是碑字所闕無幾矣。」㊳ 秋冬之際，翰林院編修陳崇本（1775年進士，陳淮之子）以這一補全本用棗木刻於京師，並系跋文云：

> 乾隆戊戌秋，余見覃溪先生手摹《華山碑》，蓋從朱竹君[即朱筠]學使所藏王山史[即王弘撰]本摹出，復以金壽門[即金農]雙鉤宋商邱[即宋犖]本補之，山史本闕百五字，商邱本闕十字，余因為雕勒，以見二本判然，並存海內。……癸丑十月廿有五日，陳崇本識。㊴

在獲得金農鉤本的複本之後，翁方綱還曾借朱筠本細校，重新製作了一個雙鉤本寄給陝西巡撫畢沅，畢沅曾先計劃刻立於華陰廟，後因有人質疑而未果。㊵ 1789年春，翁方綱又據張燕昌所寄雙鉤四明整拓本製作碑圖，標明上下題字並中間泐損位置（圖8），㊶ 五月又「以關中王山史本及金壽門雙鉤宋商邱本合四明范氏天一閣本手搨」一軸。㊷ 1790年秋，再借錢大昕（1728－1804）所藏四明本整軸對勘，題記云：

> 予此本從四明本鈎出。乾隆庚戌秋，辛楣[即錢大昕]攜四明本來都，借留細對旬日，蓋即全謝山[即全祖望]所云整幅未剪之本。而其中間右邊石裂泐失數十字，茲用王長垣〔即王鵬沖〕、王山史〔即王弘撰〕諸本合補而成。㊸

㊳ 翁方綱，《跋延熹華岳廟碑 金冬心摹本》，收入翁方綱著、沈津輯，《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61。

㊴ 收入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卷2，頁6a。

㊵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25，《題嚴道甫〈玉井搴蓮集〉後》「重摹勒石竟何日，疑信紛紛見聞窄」句小注云：「予以所見王山史、宋漫堂二家所藏《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舊拓本雙鉤寄陝西，中丞將重勒之矣，會有疑其贋者，竟不果勒。」頁227。此際翁方綱致書黃易曾提及此事：「《西嶽華山碑》弟雖已雙鉤寄陝，而勒石拓寄尚無定期。今商邱陳伯恭出貲雕木，亦是有緣。惟跋字甚多，一時未得竣工。」收入裴景福等藏，《明清名人尺牘墨寶》（上海：文明書局，1922），第二集，卷5。

㊶ 翁同龢，《覃溪翁摹秦篆 泰山、琅邪、之罘，坿漢華山碑圖，族孫同龢藏》，翁萬戈先生藏。

㊷ 題記見翁方綱鈎摹，《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立軸，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㊸ 題記見翁方綱鈎摹，《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立軸。《蘇齋題跋》，卷上，《四明嘉定揚州褾軸整本》，頁21b。四明本在歸錢大昕以前，張燕昌就曾為翁方綱雙鉤一軸，翁廓填之後裝成巨軸。見翁方綱，《蘇齋題跋》，卷上，《蘇齋摹四明嘉定揚州本》，頁23a。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此本自鉤摹完成後，乾嘉學人觀瞻作跋者有34人之多，朝鮮學者朴齊家（1750－1805）也兩度題跋，足見一件鉤摹本可能產生的巨大影響。1793年冬日，翁方綱終於獲見陳崇本購自宋氏的《華山廟碑》長垣本，「十二月二日從陳伯恭侍讀借觀於寶蘇室，晴窗下橅搨五日而還之」，他又用五天時間完成全本的鉤摹。在若干次細緻的雙鉤實踐之後，他指出此本與華陰本相比，形較減削而神逾腴厚，並且注意到：「春秋傳，傳字竟誤作倕，予竟誤據以付伯恭鋟本，若非今親見之，悔曷由追耶？」㊹ 通過雙鉤與比勘不同版本的拓本，翁方綱在不斷辨明闕字與糾正錯誤的基礎上，逐漸獲得更為完善的鉤本。

吳門藏舊拓甚多，身在南方的陸恭、錢泳常有機會為翁方綱提供雙鉤服務。蘇州陸恭為王文治（1730－1802）之婿，他所藏的《夏承碑》真賞齋本，翁方綱曾據王澍所摹胡玉笥雙鉤本為之補摹闕字（圖9）。㊺ 陸恭的收藏中也有許多唐碑善本，如王世貞（1526－1590）所藏三本歐陽詢《化度寺碑》，第二本即為陸恭所得，㊻ 翁方綱曾作札向他索求雙鉤本，㊼ 此際翁正研究《化度寺碑》，「于此碑思欲窮各本之原委」，在同一封信中，翁氏又提及：「若得將令友蔣君處所有弇州第二本亦雙鉤一本，併以惠寄，尤感尤感。」（圖10）這裡提到的「蔣君」即長洲蔣春皋（1750－1803），是南方重要的碑帖收藏家。收到鉤本之後，翁曾有詩云：「夢想對看十四載，今者初覩真形模。神寒骨重非貌取，二百廿六珍驪珠。」㊽ 陸恭提供的雖然不是原拓而是雙鉤本，但毫髮相肖，翁方綱的珍視可見一斑。

錢泳是翁方綱委託雙鉤最多的友人之一。在1798年八月寫給黃易的信中，翁方綱提到錢泳春間北上，中途忽以私事返回吳門，他十分關心錢所允諾為

㊹ 翁方綱，《華嶽廟碑》長垣本摹本跋，收入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卷2，頁9b。

㊺ 翁方綱補摹，《夏承碑》題跋，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㊻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22，《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跋二首》:「則王弇州所稱三本之前二本，今其字最少之本在陸謹庭家，既為我雙鉤來矣，其存字略多。」頁228。

㊼ 翁方綱，《致陸恭札》，上海圖書館藏。又，《復初齋詩集》，卷42，《寄陸謹庭乞為雙鉤弇州舊藏〈化度碑〉二首》，頁383。

㊽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43，《謹庭雙鉤所藏〈化度〉弇州第二本見寄,賦此並題予所藏〈化度帖〉後》，頁396；又，卷47，《待帖詩邀諸友和作》亦提及此事，頁4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雙鉤《化度》、《孟法師》二碑及重鐫《李秀碑》諸事能否踐約。㊾《孟法師碑》為吳門繆氏雙清堂所藏，㊿趙懷玉（1747－1823）曾見此碑，並有雙鉤本，翁方綱心嚮往之。(51) 此後錢泳雙鉤《孟法師碑》寄贈翁方綱，自稱乏於神采，然翁已歎其奪真。(52) 繆氏所藏《化度寺碑》拓本，錢泳也曾為翁雙鉤，翁在重摹《化度寺碑》題跋中特地指出「嚮搨繆氏本，直抵真宋拓」。(53) 李邕（678－747）《李元秀碑》原石僅存數十字，翁方綱認為「是碑北海書之最遒美者，遠在陝碑《雲麾》之上，而泐壞至此」，他在吳門訪得畢瀧（活動於清乾隆間）藏舊拓本，此本在畢瀧去世後亦為蔣春皋所得，嘉慶元年（1796）六月，錢泳從蔣氏雙鉤寄京，(54) 翁方綱收到鉤本後報之以詩，盛贊其雙鉤絕技：「貞瑨元氣憑君得，落筆精微不我欺。今日錢君新拓出，重開仙鶴伏靈芝。」(55) 同樣為蔣春皋所有的還有華夏舊藏《婁壽碑》，1795年，錢泳也曾為翁方綱雙鉤一本，(56) 當年冬日，時在京師的桂馥將之付梓。(57)

㊾ 翁方綱，《致黃易札》，上海楓江書屋藏。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51，《錢梅溪為我手摹〈雲麾將軍李秀碑〉，將勒石于吳門，寄贈二首》，頁466。

㊿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51，《西涯圖四首》其四小註，頁468。

(51)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57，《陳白陽寫生卷二首 嘉靖癸卯秋》小注云：「味辛每為予說吳門繆氏所藏《孟法師碑》之妙，予見其雙鉤油素有白陽手題葉數、字數，對此怳復夢見之。」頁533。

(52) 翁方綱，《致錢泳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翁氏據此所作的鉤本雖今日未傳，但楊守敬《望堂金石》乃據此刊刻。

(53) 見翁方綱，《翁覃溪手鉤宋拓化度寺碑》（上海：有正書局，民國十五年）。

(54)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23，《跋李元秀碑》，頁239-240。趙懷玉，《亦有生齋集》文，卷8，《李秀碑樵本跋》，《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19冊，頁615。畢瀧（1733－1797）為畢沅之弟，收藏書畫甚富。

(55) 錢泳，《履園叢話》，卷9，《唐雲麾將軍李秀碑》：「一藏吳門蔣春皋氏，一藏歙人羅養芝家。相傳俱是唐搨，余猶疑其翻本，殆宋元物也。嘉慶元年六月，余嘗雙鉤蔣本寄翁覃溪先生。」頁74。

(56) 錢泳，《履園叢話》，卷9，《漢元儒先生婁壽碑 熹平三年》：「乾隆六十年，余從韻濤侄春皋明經雙鉤得之，以寄翁覃溪先生，曲阜桂未谷遂以刻之京邸，此顧南原作《隸辨》時所未見。」頁72。翁方綱《楳溪寄惠雙鉤婁壽碑》稱，他過去曾摹寒山趙氏鉤本，竊疑乃趙氏自運。此本為華夏收藏，後為顧憩閑所得，康熙間再贈何焯。見《復初齋文集》，卷40，頁423-424。

(57)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20，《跋婁壽碑》，頁2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翁方綱對金石的書學價值尤為重視，除了集聚拓本，雙鉤舊拓也是他獲得研究素材與書學資源的重要手段。他於碑帖並無偏嗜，一方面對於秦漢碑刻有極其濃厚的興趣，另一方面對《蘭亭序》、隋唐名碑也從不放過，除了李邕行書碑之外，他對歐、虞、褚以來等名家楷書碑也極盡搜羅、考覈之能事。[58] 1807年，他雙鉤元人康里巎巎（1295－1345）舊藏虞世南（558－638）《孔子廟堂碑》唐拓本[59]一百二十字，跋文云：

> 黃山谷〔即黃庭堅〕云：「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蓋此碑唐本前惟山谷見之，後惟王敬美〔即王世貞〕、孫月峰〔即孫鑛〕見之，近日嗜古博聞如何義門〔即何焯〕、王虛舟〔即王澍〕、徐壇長〔即徐用錫〕皆未之見也。今幸得見元康里氏舊藏本，真唐石字，尚存千四百許，而泐損殘失者多矣。陝本最精腴，而每以欹側失其平正，又失在石肩圓滑，撇頂尖纖，捺腳笨鈍；城武本清犍矣，又失枯瘠。今以原本證之，陝本、城武本皆有極肖處，而有必不可不訂正處，恨無名手可追二本格韻，與其勉強重鐫全文，遜於前人，不若擇其要者存之，為訂正二本之助。謹摹此百廿字，龕識其槩，他日儻得遇良工，摹此千四百餘字，砌諸曲阜齋廊，則閔中丞所重摹陝本及方綱所摹城武本舊拓殘字，皆不足云矣。……嘉慶十二年丁卯夏四月望，北平翁方綱識。[60]

翁方綱選擇唐拓本中與陝本（宋王彥超重刻本）、城武本（重刻時間不明）有異的120字，雙鉤成冊，以為訂正之助，並迅速以《廟堂碑唐本存字》為名梓行。這個雙鉤本頗為精緻，包括拓本的缺失處也細緻鉤出（圖11）。嗣後李宗瀚（1769－1831）根據唐搨本翻刻此碑，竟然較翁所言1400餘字少了100餘字，錢泰吉（1791－1863）曾據翁氏雙鉤印本進行校勘，認為足以補闕。[61] 楊守敬也曾高度評價這一雙鉤本：「翁覃溪合三本對較，摘唐拓百餘字，刻為雙鉤

---

[58] 雙鉤法帖在清代乾嘉以後也頗有從事者，像翁方綱、錢泳、何紹基、楊守敬等人都鉤摹過大量帖學範疇的楷書與行書法帖。因非本文討論的中心，此後不再專門談及。

[59] 今藏日本三井文庫。

[60] 翁方綱，《雙鉤唐搨廟堂碑字 蘇齋刻本》（清嘉慶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61]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餘稿卷1，《跋摹刻唐石廟堂碑 二則》，《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72冊，頁3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亦甚精細。」⑫

黃易也是翁方綱金石圈的重要成員，1783年春，翁方綱從黃易那裡借到陸紹曾（活動於清乾隆間）所摹《唐搨本武梁祠像》殘本，凡十四幅，因手摹一本，並詳記其畫像。其時安邑宋葆淳在京，因倩其師趙君將畫像鋟木，不過榜題隸書并非原本，翁方綱在寫給黃易的信中提及：

> 弟意八分必待九兄覆示鉤本乃可入刻，而渠不能待，竟以原摹本映油紙入刻矣，所以此冊今尚在芝山[即宋葆淳]館中。今芝山即將所刻一紙寄覽，想兄意亦與弟同也（弟今不得已，每幅自摹八分一行與之，使修改，然亦不能肖原本也）。既有芝山此刻，竟望兄速寄八分鉤本來矣。⑬

宋葆淳急於將畫像刻板，但這些畫像並無八分榜題文字，翁方綱希望黃易速寄各榜題的雙鉤本。宋葆淳其時給黃易的書札，也提及題字皆其師趙某一手所為：「《武梁畫像》重刻本呈覽，其中題字是敝老師書，非原本耳。」⑭ 難怪翁方綱會深覺遺憾。1791年春，《唐搨本武梁祠像》的收藏者揚州汪鋆（約1727－1787）去世，其弟遵其遺囑將拓本贈予黃易。當年十月，黃易迅速鉤摹付梓，分諸同好，《武梁祠畫像》黃易跋云：「（雪礓［即汪鋆］）許以此本見贈，未及寄達，旋歸道山。其弟鄰初［即汪大宗］踐兄宿諾，竟以歸易。……謹藏小蓬萊閣以志盛誼，復手摹付梓，俾海內好古之士咸欣賞焉。」⑮ 這個包含圖像與榜題的刊本曾為周中孚著錄，⑯ 當年十二月間，翁方綱即收到黃易寄來的印本，他在回札中稱：「新鐫一本尚有數處應再致精審者，如後面龔蘅圃［即龔翔麟，1658－1733］小字一跋下之方印，竟未清楚，所當更為料理者也。」⑰ 可見他對於刊印複製的嚴苛要求。

---

⑫ 楊守敬，《激素飛清閣評碑記》（日本刊本），卷3，《孔子廟堂碑》，頁1。

⑬ 翁方綱，《致黃易札》，上海楓江書屋藏。

⑭ 收入黃易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7冊。

⑮ 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武梁祠像唐搨本」，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第1冊，頁629。

⑯ 周中孚，《鄭盦讀書記》（民國吳興劉氏嘉業堂叢書本），卷34，頁20a。

⑰ 上海楓江書屋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易的雙鉤刊印活動，下文將有詳細討論。作為癡迷金石的學者與收藏家，他也常常從友人那裡獲得罕見碑刻的雙鉤本。如1777年，在購得江寧龔琛家藏《漢王稚子雙闕》之前，篆刻家董洵（1740－1809）曾為雙鉤一本。[68] 黃易稱贊鄉友趙魏「鉤碑軟拓之法，超絕千古」，[69] 趙所藏《石經殘字》、《華山殘碑》，黃易都希望他雙鉤見惠。[70] 1784年初夏，趙魏入都，途經濟寧時給黃易帶來《劉熊碑》雙鉤本。[71] 錢坫（1744－1806）自陝西寄贈翁方綱《唐明皇西嶽華山碑》拓本，只餘半字四（是駕、如、陽、孕四字），翁認為極可寶重，旋即雙鉤一本奉贈黃易。[72] 此外，歙縣潘應椿也曾為黃易雙鉤漢《元守紀瑞碑》等。[73]

類似的碑刻雙鉤活動，充斥於乾嘉金石圈的社交之中。如翁方綱在王昶處鉤摹漢楊氏四碑全本；[74] 在黃易濟寧官舍手摹李陽冰（活動於唐開元間）篆書「聽松」二字拓本。[75] 陳焯為翁方綱雙鉤靈壽縣《魏張府君之碑》。[76] 聶品壘從王淳處借鉤《魏元丕碑》。[77] 何元錫雙鉤《瘞鶴銘》，其中「鶴壽華陽真逸不知其紀也」十一字為翁方綱所未見。[78] 可知雙鉤乃其時金石家的一個基本功夫。

---

[68] 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漢王稚子雙闕」，頁593。

[69] 黃易，《致趙魏札》，張廷濟錄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70] 黃易，《致趙魏札》，上海圖書館藏。趙魏的《華山殘碑》當來自於汪中，汪中跋《華山殘碑》拓本云：「西嶽華山殘碑，蔣前民故物也。……今日得此，足以（與朱筠藏本）並驅爭先，人生之快意無踰於此。錢唐趙晉齋、郃陽秦柏崖與中同有金石之好，使共賞評之。乾隆四十一年（1776）除夕，汪中題。」收入高學治，《陵苕館續刻金石文字》（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第1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71] 黃易，《致顧文鉌札》：「趙晉齋帶來《劉熊碑》雙鉤本、新刻《隸續》，甚精，均俟回日與高明欣賞。」上海圖書館藏。

[72] 翁方綱，《致黃易札》，收入黃易輯，《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2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73] 潘應椿，《致黃易札》，收入黃易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10冊。

[74]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17，頁7448。

[75] 翁方綱題，黃易舊藏，《聽松拓本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76] 翁方綱跋，《張府君之碑》，見《復初齋文集》（稿本），三，收入《清代稿本百種彙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第67冊。

[77] 王淳，《致黃易札》，收入黃易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4冊。

[78] 汪鋆，《補瘞鶴銘考》（清光緒九年刻本），卷上，頁11b。「不知其紀」，有些版本作「不知其紀」，似更準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道咸以後何紹基、趙之謙等人的雙鉤活動

道咸以後，各種古碑都出現了雙鉤本的製作，[79] 像何紹基（1799－1873）、趙之謙（1829－1884）這樣的著名書家也積極參與其中。何紹基潛心八分，遇到難得的漢碑舊拓必定雙鉤存副。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他隨父按試寧波，在天一閣見到《趙圉令碑》及《劉熊碑》單紙宋拓，不過主人只允許站著觀看，不允許假歸，遑談據本雙鉤。三十年以後，他在京師琉璃廠肆購得翁方綱雙鉤《劉熊碑》，其時澧州蔣明允（1793－1846）收得宋拓《劉熊碑》及顏真卿《祭侄文》，他允許何紹基雙鉤《祭侄文》，並以好酒好菜招待，但自己不出門半步，至於《劉熊碑》，則靳不與鉤。何紹基因剛買到翁鉤印本，亦未強索。咸豐十一年（1861），何紹基自山東回到長沙，從友人處分別借得黃易舊藏《趙圉令碑》整拓、錢大昕舊藏《趙圉令碑》整拓。一下子借到兩本珍貴的拓本，何紹基如貧兒暴富，其時正值酷暑，他不敢揮汗鉤摹，乃令刻碑人歷城陳浩為之雙鉤，並裝為巨軸展玩。[80]

咸豐九年（1859），藏書家楊繼振（1832－1879）自嘉興獲得《婁壽碑》拓本，答應何紹基借歸鉤摹，何紹基《借鉤楊又雲繼振所藏〈婁壽碑〉即題碑後》云：

> 又雲居士歐趙徒，禾中得此珍球琳。……許我借歸真大惠，江南舊夢重溫燇。午窗描取一兩幅，夜睡摹想晝破衾。桂、張二寶儻並到，何惜十指松煤黔（桂相國藏梁氏《華山碑》、張松屏藏宋拓《石門頌》，俱欲借鉤）。[81]

詩中每日鉤摹一兩頁的說法並非文學修辭，在當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日記中，何

[79] 除了名碑，漢代瓦當、畫像題字、冢墓遺文、北朝墓誌等，無不有好事者雙鉤鋟版，公諸同好。

[80] 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卷23，《題圉令趙君碑三首》，《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04冊，頁220-221。何紹基所題拓本見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善本碑帖綜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頁256。

[81] 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卷21，頁2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紹基寫道：「晨起，鉤《婁壽碑》起，……至竹朋［即李佐賢，1807－1876］處借小蓬萊閣刻，乃無有。……今日鉤帖得三紙。」可見何紹基的雙鉤頗為精心，他還希望借《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作為鉤摹的參考。直到本月二十三日，《婁壽碑》的鉤摹方大功告成。[82] 自從借得這件《婁壽碑》，何紹基不僅日摹夜想，還得隴望蜀，希望再借大學士桂良（1785－1862）所藏《華山廟碑》華陰本、張德容（1820－1888）所藏《石門頌》宋拓本一併雙鉤。

清代碑學書派的另一位大家趙之謙，也是雙鉤活動的積極參與者。同治二年（1863），趙之謙旅食京師，成《二金蝶堂雙鉤漢刻十種》，包括《趙廿二年上壽刻石》（圖12）、《甘泉山元鳳殘字》、《楊量買山記》、《萊子侯刻石》、《南武陽功曹墓闕》、《沙南侯殘碑》、《文叔陽食堂記》、《李禹表》、《陳德殘碑》、《楊叔恭殘碑》等。[83] 趙之謙作於當年九月十日的自序稱，他的雙鉤古碑活動乃在太平天國毀壞文物之後，有特別的意義：

> 無事靜坐，磨墨膏筆，少勞手足，以為玩好，誠非靈異，若其著錄此區區者，更何足道，況敢為之舉世不尚與毀棄之後哉。

八月二十五日，他還特意篆刻「二金蝶堂雙鉤兩漢刻石之記」一印（圖13），九月九日在「績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的邊款中又說：「同治二年，《二金蝶堂雙鉤漢碑十種》成，遂用之。」十二月刻「會稽趙氏雙鉤本印記」邊款亦云：「不能響搨能雙鉤，但願文字為我留，千載後人來相求。」可見雙鉤留存漢碑這一活動之於趙之謙的重要性。當然，對於自己的雙鉤功夫，趙之謙也極為自信。這套鉤摹本所用紙張極為精良，絲毫不遜於書畫用紙，也可見趙之謙的重視程度。在完成之後，他將雙鉤正本贈予

---

[82] 收入何紹基，《何紹基手寫日記》（臺北：世界書局，2012），頁336-340。

[83] 趙之謙《二金蝶堂雙鉤漢碑十種》定稿贈沈樹鏞，並未付梓，曾連載於日本《書菀》雜誌第七、八卷及新第一卷，惜僅有前六碑，餘未見。後歸羅振玉所有，攜出海外，參見羅振玉，《漢晉石刻墨影》（民國四年上虞羅氏景印晉古叢編本）序。黃苗子稱，日人稱天壤間惟一僅存殘本（真跡原存朝鮮金氏葆華閣）。參見黃苗子，《藝林一枝：古美術文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頁1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沈樹鏞（1832－1873），初稿則由魏錫曾（1828－1881）收藏，魏錫曾《書二金蝶堂漢碑十種序跋後》云：

> 同治癸亥（1863）秋冬間，見撝叔［即趙之謙］成此書於都門，其正本隨貽韻初［即沈樹鏞］，鉤摹跋語用高麗箋，以側理紙為前後副葉，宋藏經紙書簽，而以雙鉤初稿畀余。丙寅（1866）九月，余訪韻初吳門，手錄此本，至辛未（1871）四月十八日始綴成冊，續當據初稿重鉤入此序跋，必為副本行世。性苦懶惰，不知何日踐此言也。十九日記。㉞（圖14）

在沈樹鏞收藏的正本之外，魏錫曾計劃製作一套完整的副本，但最後似乎未能如志，他只留下了在吳門手抄的《二金蝶堂漢碑十種序跋》。名家雙鉤本成為人們的收藏品，說明了其藝術價值已經得到普遍的認同。

同治三年（1864）三月，趙之謙又據天一閣藏宋拓本《劉熊碑》，參合翁方綱鉤本補鉤二十九字並作考校，耗時十日。嗣後沈樹鏞將殘拓本、趙之謙雙鉤本、平安館刻翁方綱雙鉤印本裝為一冊（圖15）。㉟ 趙之謙在其時寫給魏錫曾的信中曾談及此事：

> 《劉熊碑》世間無拓本，僅天一閣本（此最古，多上列十五行，齊梅麓［即齊彥槐］雙鉤一紙為均初［即沈樹鏞］得）。汪容甫［即汪中］先生藏本、巴俊堂［即巴慰祖］本皆無可問者。均初忽買到一本，真奇寶也（明人剪褾本，價尚不昂，卅金）。因為重鉤天一閣多字本別存一冊，盡半月功考證訛闕，雪中手木強不知冷，近已裝池成。㊱

㉞ 《二金蝶堂雙鉤十種序跋》，魏錫曾抄本，上海圖書館藏。亦收入魏錫曾，《績語堂題跋》（清光緒九年刊魏稼孫全集本），頁8b。

㉟ 《天一閣宋拓劉熊碑雙鉤本》，原作見於華藝國際拍賣公司2018年春拍，上海中華書局1921年4月曾影印出版。

㊱ 見趙之謙，《二金蝶堂尺牘》（清光緒三十一年嚴氏小長蘆館石印本），亦收入顧燮光編，《漢劉熊碑攷》（民國二十三年會稽顧氏金佳石好樓石印非儒非俠齋金石叢著本），卷下，頁8b。据札下夾註繆荃孫書札，趙之謙還曾雙鉤漢碑篆額，乃「小品之有趣者」，墨本在其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套冊頁包括殘碑、鉤本、碑圖以及考校，其雙鉤乃「取墨本追摹體勢」，蓋「雙鉤古刻非能任意為之，一碑有一碑面目，宜先求形似，然後神骨，與臨池大異」。可見趙之謙對於雙鉤於形似之外，亦有神骨的要求，非尋常描摹可比。除了為沈樹鏞雙鉤考證《劉熊碑》，同治十一年（1872），趙之謙也接受李文田（1834－1895）的委託，為他新得的《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補摹缺頁，趙在鉤本上題道：

> 仲約學士［即李文田］得伍氏《華山廟碑》闕九十六字者，實海內弟四本也，惜長垣、華陰二本近在浙中而不得借，因摹舊雙勾本補之，俟諸異日，更鉤珍本。[87]（圖16）

趙之謙的補摹底本是舊雙鉤本而不是長垣本、華陰本舊拓，為此他深感遺憾。事實上，此一時期鉤摹古碑與乾嘉時期的精確要求已有所不同，趙之謙按其習慣的方式進行鉤摹，他的鉤本常常與底本差異甚大。

此一時期的金石學者大多也參與雙鉤，如楊澥（1781－1855）曾見一《瘞鶴銘》拓本，只存兩行，「估人索價昂甚，不能得，借而鉤之，當日鉤兩本。其一本並影抄翁（方綱）跋，為友人攫去。」陸恢（1851－1920）在這件雙鉤本上寫道：「《鶴銘》古本字口有鋒棱，曾見浭陽尚書[即端方，1861－1911]一本，只四五字，其鋒銳與此正同，勿以鉤本忽之。」[88] 雖然只是雙鉤本，但陸恢認為其輪廓分明，殊有鋒棱，與他所見端方所藏古拓本正同，因此價值在尋常拓本之上。劉喜海（1793－1852）收藏拓本至富，在獲得《西嶽華山廟碑》長垣本之前，曾就朱錫庚（朱筠之子）借鉤華陰本，《題宋拓華山廟碑》一詩即說：「聿余好古勤探索，竭來持示同展觀。雙鉤且許十日借，獨飽眼福向人誇。」[89] 道光間，他著《金石苑》一書，於諸碑「鉤摹其形，箋釋其文，為自來金石所未有」，其中既有陽文縮臨，也有原大雙鉤。此書並未全部完成，今

---

[87] 李文田舊藏，《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88] 楊澥雙鉤，《瘞鶴銘殘字》，見《中國書法》，2013年第9期。

[89] 劉喜海，《嘉蔭簃集》，卷下，《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80冊，頁2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可見《三巴耆古志》九冊（四川所得漢至宋金石六卷）（圖17）、《蒼玉洞題名》一冊（汀州郭外石刻）及《海東金石苑》八卷（朝鮮之金石）等。⑨⓪ 吳大澂（1835－1902）《恒軒所見所藏吉金》自序則稱：「余弱冠喜習繪事，不能工。洎官翰林，好古吉金文字，有所見輒手摹之，或圖其形存於篋。」⑨① 他不僅雙鉤文字，也鉤摹青銅器的器型。潘祖蔭（1830－1890）所藏《沙南侯獲碑》六行足本即倩吳雙鉤，潘跋云：

> 右《沙南侯獲刻石》足本。蔭所見凡五本，惟此本字最多。石始見於徐氏［即徐松］《西域水道記》、翟氏［即翟云升］《隸篇》。道光間劉燕庭［即劉喜海］方伯、吳子苾［即吳式芬］閣學皆得之，惟所見俱止前三行，無所考證。此石世無精搨本，近且日益泐，後三行又向未著錄。茲屬吳清卿［即吳大澂］編修鉤摹付梓，並以同人考釋附焉。⑨②（圖18）

吳大澂雙鉤《漢沙南侯獲刻石》有清同治十二年（1873）潘氏滂喜齋刊本。嗣後吳湖帆（1894－1968）重裝《沙南侯獲碑》拓本，將三行立軸改裝為冊，對頁所配即以吳大澂雙鉤本為底本的鉤摹本，冊後縮鉤六行全本亦同。⑨③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學者有時還需要請人代為雙鉤古碑。道光十五年（1835），翟云升（字文泉，1776－1858）編撰了一部隸書字典——《隸篇》（後又有續編、再續），楊以增（1787－1855）序云：「東萊同年友翟君文泉，性耽六書，尤耆隸古，吉金樂石，搜奇日富，蓋寢食於中者四十餘年。近

---

⑨⓪ 劉喜海，《三巴耆古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9冊；《海東金石苑》嘉業堂刊本與二銘草堂刊本分別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3冊；第2輯，第15冊。《蒼玉洞題名》，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第2冊。此外，《金石苑》的成稿還包括《長安獲古編》二冊（西安所得鐘鼎）、《龍門造象記》二冊（洛陽伊闕造象）等。參見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乙丁稿》，卷2，《重刻金石苑序》，《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56冊，頁820-821。

⑨① 吳大澂，《恒軒所見所藏吉金》（清光緒十一年自刻本），頁1。

⑨② 吳大澂，雙鉤《漢沙南侯獲刻石》（清同治十二年潘氏滂喜齋刊本），潘祖蔭序，頁3b。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⑨③ 上海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取所得金石選字雙鉤，區分部類，匯為《隸篇》一書。」[94] 但翟氏所采西漢至西晉百數十種隸書碑刻，並非均從拓本選字雙鉤，有些乃從雙鉤本鉤出，如書中《朱龜碑》字取自黃易雙鉤印本，《劉熊碑》字取自翁方綱雙鉤印本，《西嶽華山廟碑》字取自劉喜海所寄陳克明雙鉤本，《沙南侯獲碑》字取自吳式芬（1796－1856）雙鉤本。為了編纂此書，翟云升曾開漢碑目錄向王筠（1784－1854）求助，王轉而求諸葉志詵（1779－？）次子葉名澧（字潤臣），葉答應有幾種拓本許見借鉤，但王認為，「雖詞甚慷慨，而終未必與。」葉志詵長子葉名琛（字昆臣）則許以翁方綱所刻《夏承碑》代為雙鉤一本奉上，不過一時尚未完工。信中還談到向劉喜海借鉤《西嶽華山廟碑》一事：「自去冬與方赤［即李璋煜］同瀆燕庭［即劉喜海］，乃許假月汀［即李璋煜］雙鉤，近見燕庭，又言南叔［即陳克明］自鉤之，然須俟其高興，不受促迫，諄言年內當寄上也。」[95] 陳克明精於雙鉤，亦頗為自重，即使是著名學者請他雙鉤，亦不得以時促迫。

事實上，雙鉤殊非易事，1774年，翁方綱向朱筠（1729－1781）借鉤華陰本《華山廟碑》，「殫十日思力」；[96] 1785年，鉤摹歐陽詢《化度寺碑》，「每日僅拓十許字或廿卅字」，「每作一二字，即閉目凝神，返觀良久，而後再動數筆」。[97] 在一則長垣本《華山廟碑》的題跋中，何紹基也聲稱：

> 雙鉤古帖貴得神趣，若僅摹形質，便毫釐千里矣。昔從燕庭假此帖令人精鉤之，竟無是處。今從小東［即方朔，1817或1820－約1872］處見此，始

[94] 陳官俊（1781－1849）序則稱其「以摹代臨，如景隨形。而楷式所存者期於曲肖也」。二序收入翟云升，《隸篇》（清道光十五年刻本）卷首。楊以增序言亦收入《退思廬文存》，《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56冊，頁5-6。楊守敬於光緒五年（1879）年曾重刻《隸篇》，讓他稍覺遺憾的是，《隸篇》限於體裁，分類擇字，「每碑僅取數十字或數十字，參錯其間，不復見古人章法之妙。」收入《激素飛清閣評碑記》，卷1。

[95] 王筠，《清詒堂文集》（民國抄本），收《致文泉先生》，《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45冊，頁708-710。

[96] 翁方綱，《華陰東郭王朱標冊翦本》，頁25a。

[97] 見翁方綱，《翁覃溪手鉤宋拓化度寺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悟摹古不在得貌，非善書人直無庸動手鉤刻古帖也。[98]

劉喜海出借《華山廟碑》拓本由何紹基倩人雙鉤，但此人的雙鉤水準不能令何滿意。何因此認為，雙鉤並非機械描摹，其人若不善書，即便「精鉤」也絕無妙處，僅得形質之似，實質謬以千里。與趙之謙一樣，何紹基的雙鉤目標與翁方綱等人對於細節的嚴苛要求已經有所差別。也正因為如此，但凡由著名書家雙鉤的本子，往往會被認為與他的手跡同樣寶貴，從而成為人們爭相追逐的收藏品。

在這樣的社會需求之下，雙鉤也成為一種專門的伎巧，清代活躍著不少專門從事於茲的匠人，如同活躍於金石圈中的拓工。翁方綱《致陸恭札》云：「乞將尊齋所收弇州之《化度》有陸文裕[即陸深]跋者，奉懇覓匠用油紙雙鉤一本惠寄，其有泐處悉依之。」[99] 翁方綱所提出的精細要求，頗類於指示拓工打碑。吳榮光（1773－1843）曾通過吳式芬延請一位郭生為之鉤摹金文，並按每字八文支付酬金，[100] 這位郭生也是吳式芬藏拓的雙鉤人，龔自珍（1792－1841）《致吳式芬札》中曾多次提及：「望付郭君手，先鉤摹於油紙。必須在尊齋，如尊齋有事，則弟寓亦別有一椽靜室，可招之來，目同鉤摹，較放心也。」「問渠之三種尚易單勾，雙鉤可否付郭君？」[101] 前文提到劉喜海的友人陳克明工於雙鉤，劉曾請他雙鉤所藏《西嶽華山廟碑》長垣本分贈友人，王筠、楊守敬等人對於陳的手藝贊不絕口，認為精審出諸本之上。[102] 何紹基也

[98] 方朔，《枕經堂金石題跋》，卷3，《雙鉤長垣本漢延熹華嶽廟碑跋》，附《何子貞太史跋・咸豐庚申》，頁14260。

[99] 翁方綱，《致陸恭札》，上海圖書館藏。

[100] 吳榮光，《致吳式芬札》：「郭生鉤模金文已面訂，照前每字大錢八文。即請定庵招至，發其鉤出可也（不管飯食）。鉤後如有未協，祈妙筆改定。」收入吳式芬輯，《吳式芬藏名人書札》（清稿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第1冊，頁13下。

[101] 龔自珍，《致吳式芬札》，收入吳式芬輯，《吳式芬藏名人書札》，第2冊，頁7上、頁9上。

[102] 王筠，《再復翟文泉書》：「去冬燕庭出守汀州，即以陳南叔所鉤《華山碑》交方赤，方赤及弟各鉤一本。」收入《清詒堂文集》，頁712。楊守敬，《望堂金石》，「華山廟碑」題跋云：「同治丁卯，敬得武原陳南叔克明雙鉤本於諸城劉氏，蓋長垣本道光中歸劉燕庭方伯，此本即劉燕庭倩南叔手鉤者，故精審出諸本上。」頁28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曾稱贊他的雙鉤人陳浩：「歷下陳生手眼敏，精校兩本為雙鉤。鉤成裝幀快懸看，兩本古重一本遒。（題雙鉤本）」[103] 陳介祺（1813－1884）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到濰縣王石經（1831－1918），說他喜收金石書畫古拓帖，能篆隸刻印，「雙鉤亦佳，非近人所及」。[104] 光緒乙酉（1885）冬日，吳大澂於都門購得崇恩舊藏所謂宋拓《郭有道碑》，兩年之後倩新田樂炳元雙鉤，欲刻端石，以公同好（圖19），[105] 樂炳元是吳氏撫湘時專用的刻碑人，他也擅長雙鉤摹勒。

四、雙鉤本的功能

程渤在研究雙鉤技術時，曾概要地指出其作用是複製、保存稀見拓本或舊拓，便於攜帶、翻閱；通過書籍的刊印，使罕見的碑刻藉此得到傳播；雙鉤因為複製了碑刻文字，也能在考據時發揮對勘的作用；用雙鉤法勾勒碑文，也能翻刻舊碑。[106] 程氏的論述頗為簡要，本文仍有進一步申述的必要。

前文曾經指出，在響搨漸漸退出歷史舞臺之後，刻帖的第一道工序仍是雙鉤，有了鉤本，再經過朱、鐫刻，然後才能椎拓成拓本。錢泳在乾嘉之交曾董理畢沅《經訓堂帖》、成親王永瑆（1752－1823）《詒晉齋帖》。[107] 其跋《經訓堂帖》云：「余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月應畢秋帆尚書之招，始至河南幕府。尚書於政事之暇，酷嗜翰墨，因有刻帖之舉。旋市石洞庭，至五十三年（1788）五月始得雙鉤起手。」[108] 明言雙鉤仍是刻帖的第一步。

---

[103] 何紹基，《題圉令趙君碑三首》，頁220-221。

[104] 收入陳介祺，《簠齋尺牘》（民國上海商務印書館印本）。

[105] 樂炳元雙鉤《郭有道碑》及吳大澂跋（稿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樂炳元也是光緒年間刻端硯銘文的高手。

[106] 參見程渤，〈清代雙鉤摹寫法研究〉，頁98-104。他指出明清以後，翻刻多是商賈所為，故多不足取，與事實不符。

[107] 錢泳，《履園叢話》，卷9，《家刻》，頁78-79。

[108] 錢泳，《寫經樓金石目》（清刻本），第3冊，《經訓堂帖十二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根據雙鉤本翻刻古碑在此一時期更為常見。如1777年，在黃易購得《漢石經殘字》之後，翁方綱曾加手摹，屬張燕昌勒石。[109] 1792年，黃易又委託錢泳翻刻《漢石經殘字》，次年十二月，錢泳在答書中提及此事：「所委摹刻《石經》三頁，勾本久已上石，或作或輟，又時在外間奔走，至今尚未刻完，難以報命，大約明歲正月中旬定可告成奉寄。」[110]

再如《西嶽華山廟碑》，根據雙鉤本所進行的翻刻，包括襄陵喬氏重摹本、曲阜孔氏重摹本、商邱陳氏重摹本、揚州阮氏重摹本、大興翁氏重摹本。在當時的評論中，商邱陳氏重摹本摹刻頗工，隸法亦有典型，視諸摹本為勝；揚州阮氏重摹本鉤摹全碑，神完氣足，雖不足亂真，但碑之磨泐處、字之剝蝕處，大小位置，無不吻合。方朔認為，漢碑舊拓實不易得，況原石已磨泐者，他希望有朝一日能雙鉤重勒如《夏承》、《魏君》、《朱龜》、《譙敏》、《劉熊》、《婁壽》、《趙君》、《靈臺》及《石經殘字》諸刻，再傳天壤。[111] 罕見的碑刻，收藏者一旦獲得拓本，首先想到通過翻刻公諸於世，如何紹基藏顏真卿（709－785）《大字麻姑仙壇記》宋拓本，友人晏啟琳曾假以油素手自雙鉤，何紹基以為極為精到，「與余所鉤《忠義堂顏帖》為異曲同工，若即以鐫石流傳，尤為妙事。」[112] 這個鉤本後翻刻成碑。潘祖蔭在獲得《沙南侯獲碑》之後，楊翰（1812－1879）也立即幫他覓人雙鉤摹石。[113]

有些翻刻活動有一定的經濟目的，如孔繼涑《谷園摹古法帖》第一卷收《漢華山碑》、《漢石經殘碑》，這些都是開價售賣的。[114] 天一閣藏松雪齋北

---

[109]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3，《漢石經殘字》：「乾隆丁酉（1777）秋八月，錢塘黃秋盦易購得《漢石經殘字》，……方綱手摹，屬海鹽張芑堂燕昌勒之石。」頁7236。

[110] 錢泳，《致黃易札》，收入黃易輯，《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4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11] 方朔，《枕經堂金石題跋》，卷3，《舊拓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跋》，頁14265。

[112] 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卷10，《跋晏雲唐大字麻姑山仙壇記雙鉤本》，頁11a-b。

[113] 楊翰，《息柯白箋》，卷7，《致潘伯寅》，《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50冊，頁491。

[114] 周震榮在寫給黃易的信中，曾購買孔繼涑的刻帖：「承示孔氏帖單，內所須者八種，謹依來單付庫平紋銀十三兩一錢五分，乞轉懇谷園，即檢石刻寄付，為禱。」收入黃易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6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本《石鼓文》，張燕昌雙鉤刻石於家，亦為應付社會的索求。有些公共空間的翻刻則帶有教化目的，嘉慶初年阮元為浙江學政，「細審（《石鼓文》）天一閣本並參以明初諸本，屬芑堂［即張燕昌］以油素書丹，被之十碣，命海鹽吳厚生刻之。」[115] 十鼓刻成之後，置之杭州郡庠明倫堂壁間，俾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取法。[116] 葉志詵就養粵東時，次子名澧自都中寄《石鼓文》油素雙鉤本，亦從天一閣摹出者。葉選工勒石，寄置他的家鄉漢陽府學，以廣其傳；復為摹勒留置廣州府學，使同好者共窺古法，以結翰墨之緣。這些都出於公益的目的。[117]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時期雙鉤本的製作並非都為了翻刻，在原本佚失的情況下，雙鉤本本身也是極為重要的拓本替代物。有些碑刻雖然已有各種翻刻本問世，但根據原拓雙鉤仍是好古文人的選擇。嚴可均（1762－1843）每遇罕見拓本都會雙鉤留副：

> 跋《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嘉慶十三年（1808）歸阮伯元［即阮元］撫部，越三年，余在撫部寓所，坐臥相對者七日，雙鉤一幅而歸。……余既從阮伯元撫部借得四明天一閣整本，手自雙鉤訖，整本缺字百餘，乃借出成邸此本[即長垣本]鉤補缺字。……復全鉤一本，而額首缺題名亦以整本鉤補附諸冊末。[118]
>
> 跋《劉熊碑》：余在京師，獲見舊墨本，僅存二百十七字，蓋宋以後所拓者，因竟日之力雙鉤一本，歸諸插架。[119]

---

[115] 阮元，《致黃易札》，收入阮元、孫星衍，《二家書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用於雙鉤的紙張通常是一種透明而不滲水的油素紙（或稱油紙），油素謂其光如油。

[116] 嗣後根據張、阮二家刻本重新翻刻者頗多。如徐渭仁刻本、楊守敬刻本、姚覲元刻本皆據張燕昌本。

[117] 戴肇辰修、史澄纂，《（光緒）廣州府志》（清光緒五年刊本），卷98，《金石略二》，頁1a。

[118]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9，《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70冊，頁692。據湖州博物館藏嚴可均雙鉤《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自跋，雙鉤在嘉慶十五年（1810）五月，「越三年」為誤記。嚴可均還指出，長垣本乃凍墨所拓，須審視墨暈并與整本對看始能措手，他批評雍正閒如皋姜任脩重刻本鉤手庸惡，牛鬼蛇神，不復成字；顧南原與翁方綱的鉤本皆無鋒鋩，與真蹟不合。

[119]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9，頁6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跋《自然殘碑》：庚午（1810）夏，余至京師，見葉東卿［即葉志詵］案頭有此拓本，凡六十九字，……隸法似《婁壽碑》，字形大小亦同，因雙鉤一本，以備漢碑之一種云。⑳

嚴可均雙鉤的這些碑刻，其時大多有翻刻本存世，但據拓本雙鉤仍被認為更為近真。除了名碑舊拓，一些邊遠地帶的碑刻，學者也通過雙鉤獲得珍貴的副本。前文我們已經提到《裴岑紀功碑》，此碑為雍正七年（1729）寧遠大將軍岳鍾琪（1686－1754）在新疆巴里坤發現，褚峻曾根據拓本製作雙鉤本，紀昀雖藏有一件原拓，但也有雙鉤副本在外流傳。再如《張騫碑》，在新疆伊犁西南卡倫外那林河草地，松筠（1752－1835）任伊犁將軍時曾遣人摹拓，字在有無之間，不可辨識。㉑ 宋葆淳在寫給羅聘（1733－1799）的信中，希望暫借他的藏本十日，「欲油紙印寫一本，知足下愛惜，必不致汙損也。」㉒ 儘管真偽難辨、字跡也難辨，《張騫碑》拓本仍是極難一見，故宋氏亟欲鉤摹一本。晚清的趙于密（1845－？）在一則題跋中也說：

> 右《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刻石》，光緒二年克復新疆回城，為統兵部下所獲，始有搨本流傳內地。剝蝕極難辨讀，其文義蓋當時治路記也。……推之與史悉合，絕域精拓罕得，因亟鉤釋以餉同好。㉓

雖然碑刻尚在新疆，但精拓內地罕得，故雙鉤具有存其梗概的意義。而一般新出土的碑刻則很少有人雙鉤，王懿榮（1845－1900）《致陳介祺札》有云：「承詢武氏石槨銘，聞系丁小農[即丁彥臣]所得，已鉤刻矣。未悉是新出者，抑其所得孤本。新出想不須鉤刻，孤本則未見著錄。」㉔

---

⑳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9，頁694。

㉑ 齊學裘，《見聞續筆》，卷5，《漢張騫碑》，《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181冊，頁435。

㉒ 宋葆淳，《致羅聘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㉓ 趙于密，《雙鉤本跋》，收入陸繼煇，《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清稿本），卷1，《龜茲左將軍劉平國刻石》。

㉔ 王懿榮，《致陳介祺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了作為拓本的替代物，雙鉤也是補全殘拓的有效手段。如嘉慶十四年（1809），阮元將《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整軸挾至京師，次年與長垣本互對缺文，摹其碑右所全百字，雙鉤補於拓本缺處。[125] 李文田藏順德本《華山廟碑》有缺頁，趙之謙根據舊雙鉤本再加雙鉤，補全碑文96字。[126] 汪鳴鑾（1839－1907）藏《乙瑛碑》拓本冊，起首闕頁，佚15字，也通過雙鉤法補齊。[127]

在原本不可見的情形下，雙鉤本在金石學與書學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前文的許多例證說明，翁方綱尋求各種雙鉤本，大多是為了互相比勘，在他的資料系統中，雙鉤本與拓本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他所要瞭解的是雙鉤本所反映的拓本文字、筆劃的形態，因此他懇請陸恭雙鉤新得《化度寺碑》拓本，「雖多一二筆亦妙也」。[128] 1809年春，阮元集《西嶽華山廟碑》三種拓本於京師，聚集友人一起題碑。其時孫星衍（1753－1818）官山東，聽說之後致書乞借三碑響拓，次年特命嚴可均入都親理其事，十日之中，手鉤三碑以歸。[129] 這些不僅是孫星衍重刻商邱本的依據，也是他研編纂《寰宇訪碑錄》一書的基礎資料。[130]

---

[125] 阮元，《揅經室集》，三集卷3，《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頁383。

[126] 李文田舊藏，《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127] 上海圖書館藏，收入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善本碑帖綜錄》，頁83。還有一些殘缺的拓本，鉤摹不以墨筆而以朱砂，如姚廣平藏《石鼓文》即用朱筆根據天一閣本補全，收入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善本碑帖綜錄》，頁16。

[128] 翁方綱，《致陸恭札》，上海圖書館藏。

[129] 張鑑，《冬青館集乙集》，卷7，《西嶽華山碑書後》，《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90冊，頁681。張鑑誤將「戊辰」寫為「戊午」。

[130] 嚴可均雙鉤的整拓本，題跋云：「嘉慶十五年夏五六日，在都門阮撫部元寓，藉天一閣整本《漢西嶽華山廟碑》手自雙鉤，碑缺百餘字，以成邸長垣本雙鉤補足，其明月，復以兩本對鉤，各取其長，庶稱完本。因付孫襲伯均、觀察星衍各刻石吳門孫子祠，以公同好。烏程嚴可均記。」又右側孫星衍跋云：「《西嶽廟碑》已失，世間僅見三本，阮中丞既刻天一閣本於揚州，又屬嚴孝廉以商邱宋拓本鉤補，缺字完足，並參校兩本，易其肥失真者數字，似較姜氏、巴氏、□□所刻者為精善，家襲伯均刻此於吳門孫子祠，余又重刻商邱本，共永其傳。庚午歲七月望日，孫星衍。」湖州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為一種饒有古意的裝飾，雙鉤本在乾嘉以後還被用於製箋。如翁樹培（1764－1809）所用「未之思軒主人仿漢瓦箋」，背景「長毋相忘」瓦尚是陽刻，而胥繩武（1757－1808）所用箋紙則以飛鴻延年瓦作為背景，「延年」二字即是雙鉤。（圖20）[131] 楊翰（1812－1879）在泰安見《泰山石刻》十餘字，雙鉤「臣請」二字製箋。[132] 到了晚清以後，吳大澂、俞樾（1821－1907）、姚華（1876－1930）（圖21）等人則更多地運用各種青銅器、漢魏碑刻、磚瓦、印章等各種金石文字與圖案製作箋紙，其中有不少也是雙鉤文字或圖像。

雙鉤本有時也被帖估用於作偽。錢泳曾提到蘇軾（1037－1101）《橘頌》卷有趙孟頫（1254－1322）題跋，一直藏於蘇州洞庭席氏，乾隆五十一年（1786），有善作偽書的沈某兄弟二人藉以雙鉤填墨，與原跡無二。畢沅竟以千金購之，實是偽跡。[133] 反之，以墨充填雙鉤本的周邊，成一偽拓本的情形更為普遍，葉昌熾（1849－1917）就曾遇到此類偽拓：「惟作偽者以雙鉤本墨填四圍空處，中留白文，以充古拓，此則惡俗不可耐爾。」[134] 光緒三十四年（1908），劉拙東「響拓」北涼《沮渠安周造像記》，就是按照端方（1861－1911）從柏林帶回的拓片原大雙鉤製作的（圖22）。[135]

五、對雙鉤本的欣賞與臨摹

乾嘉以後，雙鉤的作用並不止於前述的翻刻、拓本替代品、研究資料、製箋乃至造偽，它更是藝術欣賞的對象和學者臨池的範本。這一問題對於清代書學而言頗為重要，但研究者對此從未關心。尤其是雙鉤本大量進入刊印流通之後，較拓本更易獲得，從而進入到日常的書法實踐之中。

---

[131] 胥繩武，《致黃易札》，收入黃易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11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32] 楊翰，《會合詩續編》收《乾州秦弼臣來晤，同游石蓮閣諸勝，瀕行，屬到秦中覓〈沙南侯碑〉、〈李壽碑〉各古刻，有懷舊遊，再用牧仲和虞山尋南岩韻》小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50冊，頁586。

[133] 錢泳，《履園叢話》，卷10，頁82。

[134] 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 語石異同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10，《右雙鉤本一則，附木本、廓填本》，頁549。

[135]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中國傳拓技藝圖典》（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文曾經提及，1795年錢泳寄贈《婁壽碑》雙鉤本，翁方綱稱「作真拓本觀可矣」；[136] 1797年翁方綱收到錢泳雙鉤的《孟法師碑》，「歎其奪真」。[137] 類似的評價還有，1789年，翁方綱在南昌見到何元錫《歐陽詢小楷千字文》雙鉤本，有「親見仙人，如聽吹笛」的感慨。作為其時最熱衷於雙鉤與摹刻活動的金石學者，翁方綱經常討論雙鉤本的藝術價值，認為高明的雙鉤本「雖有黃金白璧不可換矣」。[138]

對古拓雙鉤本的激賞，翁方綱並非個例。在1777年秋日自旗人董元鏡處購得《石經殘字》拓本之前，黃易曾請求趙魏將所藏《石經遺字》與《華山殘碑》鉤摹一本相贈，雖然是雙鉤本，黃易卻視為「至寶」。[139] 在寫給顧文鉌的信中，黃易稱趙魏進京經過濟寧，帶來了《劉熊碑》雙鉤本，他認為很「精」，要待顧回來之後一起欣賞。[140] 趙魏也曾向黃易借觀雙鉤《婁壽碑》，不過黃易並未應允，「惟《婁壽》雙鉤本，弟應酬作書往往臨此，故未寄耳。」（圖23）[141] 黃易確實有取法《婁壽碑》雙鉤本的作品傳世（圖24）。[142] 也就是說，除了欣賞，雙鉤本還是書家臨摹的範本。

阮元門生張鑑（1768－1850）第一次見到翁方綱雙鉤《華山廟碑》華陰本時，覺得「油素廓填，墨光如黍，不但隸妙，即此已驚心動魄矣」。[143] 一件在雙鉤基礎上填墨的摹本，竟然會讓他覺得驚心動魄。阮元另外一位門生屠倬（1781－1828）也有類似的感受，《集蘇米齋，覃溪先生出示手摹〈華山廟碑〉，凡三本，雲臺先生復出新刻四明本相校，賦呈兩先生》云：

蘇齋老人篤嗜古，著錄度越歐趙先。自云假自朱（竹君）陳（伯恭）錢

---

[136]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20，《跋婁壽碑》，頁209。
[137] 翁方綱，《致錢泳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38] 翁方綱，《翁覃溪手鉤宋拓化度寺碑》。
[139] 黃易，《致趙魏札》，張廷濟錄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40] 上海圖書館藏。
[141] 黃易，《致趙魏札》，張廷濟錄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42]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143] 張鑑，《冬青館集乙集》，卷7，《西嶽華山碑書後》，頁6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辛楣），雙鉤影搨兼廓填。其一立軸兩巨冊，波磔擘畫工迴旋。若令朱十並見此，驚心動魄何有焉。[144]

他認為若是起《西嶽華山廟碑》華陰本的主人朱筠於地下，他也會因翁方綱的鉤摹功夫而驚心動魄。

我們在下文將會討論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一書，該書收入了他所收藏的漢魏隸書舊拓的雙鉤本（少數小字為陽文縮本）。桂馥在收到黃易的贈書之後，把玩黃易的雙鉤，並回想十餘年前在黃易那裡見到《范式碑》、《魏元丕碑》原拓的情景。[145] 在桂馥看來，雙鉤與原拓是一個鏡像關係，在沒有原拓的情況下，雙鉤本也是值得欣賞的對象。同樣，孫星衍在寫給黃易的信中，也贊賞《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中的雙鉤本「極精」，[146] 這一評價既指鉤摹的準確性，也指它的藝術價值。

《西嶽華山廟碑》是金農學書重要的學書範本，也是他建立個人風格的重要資源，他以此對抗傳統的二王經典。他曾有詩云：「會稽內史負俗姿，字學荒疏笑騁馳。恥向書家做奴婢，華山片石是吾師。」[147] 不過他大量的臨摹作品（圖25），範本很可能是自己製作的雙鉤本，而不是難得一見的舊拓。揚州八怪中的藝術家大多擅長隸書，高鳳翰、[148] 高翔也曾雙鉤《西嶽華山廟碑》作為臨摹範本。高鳳翰的雙鉤本，桂馥曾曲阜見到。[149] 王澍客居揚州時，高翔嘗贈

---

[144] 屠倬，《是程堂集》，卷10，《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35冊，頁95。

[145] 桂馥，《未谷詩集》，卷4，《黃小松見寄所刻漢碑雙鉤本 己未太和作》，《續修四庫全書》，第1458冊，頁744。

[146] 孫星衍，《致黃易札》，收入阮元、孫星衍，《二家書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47] 金農，《冬心先生續集》，卷上，《魯中雜詩》第三首，《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63冊，頁89。

[148] 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卷2收桂馥跋：「此西陂宋氏完好本，金壽門、高南村所鉤並出於此。……覃溪先生雙鉤本並此而三，然各有合處，不相掩也。乙卯（1795）登高日，桂馥。」頁10b。

[149] 桂馥題，翁方綱鉤摹，《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云：「去年在歷下見高西園[即高鳳翰]填廓《華山碑》，謂之頃刻碑，蓋如頃刻花也。西園跋言作於揚州，不審所據誰氏本，然精神奕奕，宛如古搨。惜索直大昂，無力留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雙鉤本，王「得之喜，遂精意摹此本」，[150]可見他精意臨摹的也是雙鉤本。

對於《西嶽華山廟碑》長垣本的臨摹，吳江陸耀（1723－1785）之父陸瓚（字虔實）最為熱衷。陸耀《隸便序》云：「昔先君子之學書，自弱冠以還，未嘗一日廢臨摹。中歲得商邱宋尚書家《華山碑》雙鉤本，立意摹三百通行世。」[151]在《西嶽華山廟碑》華陰本的題跋中，他再次聲稱：

> 《華山碑》墨拓傳世絕少，先君子晚年得宋商邱家雙鉤本，謂如對臨三百過，庶幾方駕古人，遂棄人事而為之，已至二百餘矣，不幸捐館。……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月上浣，吳江陸耀跋。[152]

根據陸耀的描述，他的父親在去世之前已經臨摹了兩百多通《西嶽華山廟碑》，但範本是長垣本的雙鉤本，而非原拓。

乾嘉以後，雙鉤作為臨摹範本更是尋常之事，即使是一些著名書家也常常臨摹雙鉤古碑。被稱為清代碑學開山之祖的懷寧布衣鄧石如（1743－1805），早年經梁巘（1710－1788）介紹，於南京梅鏐（活動於清乾嘉間）家中觀摩所藏金石拓本，梅喜歡隸書，藏秦漢碑拓本甚多，這是鄧石如一生中極為重要的經歷。同鄉後生方朔在評價他的篆書時曾說：

> 吾邑完白山人出，則獨空前古，蓋結構一本秦相，波折頓宕，又能參以碑頭瓦當，故與三代金石之文暗合，而能遠紹上蔡絕學心傳也。[153]

乍看這一評價，會以為鄧石如所取法的古碑古瓦都是原拓本，但以鄧石如的經濟能力，在離開梅家之後，不見得還有大量原拓本用於臨摹。1791年四月，身在揚州的鄧石如曾致札黃易，索要申兆定（1762年舉人）所翻瓦頭十幅。[154]申兆定候補長安時深好古篆籀之文，他見到畢沅幕客所得瓦當，凡有異文奇字，

---

[150] 王澍，《竹雲題跋》（清海山仙館叢書本），卷1，《西嶽華山廟碑》，頁5a。

[151] 陸耀，《切問齋集》，卷6，《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52冊，頁439。

[152] 阮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卷4，頁11a。

[153] 方朔，《枕經堂金石題跋》，卷2，《秦泰山琅邪臺石刻合裝拓本跋》，頁14238-14239。

[154] 鄧石如，《致黃易札》，收入黃易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9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皆為雙鉤，並用舊磚摹仿。[155] 鄧石如篆書的創造性與取法漢碑額及瓦當文字有極大的關係，他向黃索要這些翻刻本無非用作臨習的範本（圖26）。鄧石如臨摹秦篆也非原拓，在方朔的記載中，鄧石如在老家的門生雲杉上人曾向他介紹鄧氏學篆的奧秘，一是許氏《說文》，一是李斯（約前284－前208）諸刻，他特地向方朔展示了鄧石如以油素手鉤的《泰山石刻》廿九字以及《琅邪臺石刻》，這些不僅是鄧石如自己臨摹的範本，也是他傳授給門生的範本，這些雙鉤本同樣讓方朔「喜不可言，遂常臨仿」。可見，一份雙鉤本成了數輩人取法的對象。[156] 雲杉上人向方朔出示的除了這兩種秦碑，還有鄧氏油素雙鉤宋搨《石鼓文》，有四百五六十字，方也覺得「精神湛然」。[157] 鄧石如還曾雙鉤過《瘞鶴銘》，楊翰曾從中取「鶴壽」二字制硯為何紹基祝壽。[158] 可知雙鉤本是鄧石如後來臨寫活動的主要資源。

方朔學習漢碑，亦從雙鉤本入手。他十二三歲（1829－1830）時得到《西嶽華嶽廟碑》長垣本及華陰本的名家鉤本，歷年所臨不下數百本，自認為造詣不在陸瓚之下。相比之下，各種翻刻本皆非所當意。乾隆間，武進唐翊華在畢沅幕府，曾向商邱宋氏借鉤長垣本，此本後為方朔所得，他認為「鉤筆之精，足傳此碑之神」，嗣後友人往往借以再鉤：

> 壬辰（1832）在塾，查琴齋明經［即查懋桐］，乙巳（1845）入都，延膏源大令［即承德縣令延瑞］，於此皆鉤一本去，亦甚肖。今來山東，何子貞［即何紹基］太史首鉤一本，張小蓬司馬［即張盤，1812－？］、沈小石大使亦相繼各鉤一本裝之，皆極佳。[159]

---

[155] 錢泳，《履園叢話》，卷2，頁21。

[156] 方朔，《枕經堂金石題跋》，卷2，《秦泰山琅邪臺石刻合裝拓本跋》，頁14238-14239。

[157] 方朔，《枕經堂金石題跋》，卷2，《舊拓周宣王石鼓文跋》，頁14237-14238。

[158] 楊翰，《裒遺草堂詩鈔》，卷8，《摹「鶴壽」二字製硯壽何貞翁 從鄧完白鉤本》，《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50冊，頁291。李兆洛（1769－1841）收藏的《瘞鶴銘》，起首「鶴壽」二字乃從鄧石如鉤本摹入，何紹基將此本贈予楊翰，楊以蝯、鶴皆壽，特地摹此雙鉤二字製硯作為何紹基生日的壽禮，成一藝壇佳話。

[159] 方朔，《枕經堂金石題跋》，卷3，《雙鉤長垣本漢延熹華嶽廟碑跋》，頁142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友人們不僅以雙鉤本為底本再次雙鉤，還裝潢成冊，以為臨池之助。咸豐九年（1859），何紹基曾盡三日之功通臨此本，其款識云：「借方小東所藏唐竹虛鉤本臨一過，時己未四月初四五六日，蛻記。」（圖27）[160] 此時，何紹基還力勸方朔將所藏唐翊華雙鉤本付梓，如《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之例，但一時未果。到了第二年（1860）夏日，方朔從軍經過濟寧，有舊識骨董客持一冊來求售，竟然是顧藹吉手鉤油素《西嶽華山廟碑》華陰本，這個鉤本風神波磔，與梁章鉅（1775－1849）藏本[即華陰本原拓]無二，方朔狂喜之下，認為「足敵四明」，因再行購歸。回到濟南之後，何紹基一見激賞，又借臨數月之久。方也計劃仿黃易摹《武氏石室畫象》故事，將舊拓新刻與此本合刻一帙，以貺海內同好。[161]

何紹基精善八分，又以八分入行楷，援碑入帖，遂開先河。在《張黑女墓誌》的題跋中，他曾自信地聲稱：

> 包慎翁[即包世臣，1775－1855）]之寫北碑，蓋先於我二十年，……余以橫平豎直四字繩之，知其於北碑未為得髓也。……余既性嗜北碑，化篆分入楷，遂爾無種不妙，無妙不臻。[162]

既言「橫平豎直」，又言「化篆分入楷」，則何紹基的碑學素養主要是篆隸碑刻而非魏碑。他從方朔這裡重鉤《西嶽華嶽廟碑》的雙鉤本，除了欣賞，也作為臨習範本。前文已經談及何紹基雙鉤《婁壽碑》、《趙圉令碑》、《西嶽華山廟碑》等漢碑，但他所鉤遠不止此。如咸豐己未（1859）八月，他自崇恩（1803－1878）處借得《沙南侯獲碑》，雙鉤一紙20餘字。在這個大軸上，他還過錄了椎拓此碑的薩迎阿（？－1857）、尹濟源（1808年進士）二札及他

---

[160] 何紹基，《臨唐翊華雙鉤西嶽華山廟碑冊》，湖南省博物館藏。

[161] 方朔，《枕經堂金石題跋》，卷3，《雙鉤長垣本漢延熹華嶽廟碑跋》，頁14260。何紹基跋張盤雙鉤本亦云：「方小東有此鉤本，余借來影鉤之，張小蓬亦借鉤之。」方朔則認為，張盤雙鉤本「尤不失竹虛［即唐翊華］之神。」《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8冊，頁6076。

[162] 何紹基，《跋魏張黑女墓誌拓本》。亦收入龍震球、何叔置校點，《何紹基詩文集》（長沙：嶽麓書社，2008），頁7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寫給崇恩的贈別詩，[163] 詩中有云：「摩挲十日不忍釋，老腕鉤出多細筋。」「老蝯獰腕雙鉤出，可比將軍墨拓佳」（圖28）。[164] 可見何紹基對自己的雙鉤極為自負，認為比原拓還要精彩。崇恩也有類似的看法，咸豐九年（1859）秋日，何紹基跋張盤雙鉤自何氏鉤本的《沙南侯獲碑》云：

> 近日崇雨舲[即崇恩]中丞處《沙南侯君題字》，余借鉤之，小蓬從余鉤本影出二通，一贈中丞，一自藏之。中丞謂余鉤出者精采出原拓上，果有是耶。小蓬見示此裝本，輒為記數語，以見一時翠墨佳話。但遇古拓各自鉤存傳賞，即何異許多古拓在世乎？[165]

在何紹基、崇恩他們看來，輾轉雙鉤的鉤本不僅是複製拓本的重要手段，其價值甚至可與古拓等量齊觀，精彩的雙鉤本同樣可以供人傳賞與臨摹。[166]

作為知識階層欣賞與臨摹古碑的重要資源，雙鉤本常常獲得人們的激賞。如邊浴禮（1858年前後在世）《西嶽華山碑歌，書陸費紫卿雙鉤本》云：

> 延熹漢碑藝林寶，紫卿公子世家學。趨庭十載游畿南，吉金樂石抱奇癖。
> 獨於分隸情尤耽，雙鉤雪繭誇示客。腕力外拓神中含，驚心動魄推第一。[167]

邊氏從桐鄉陸費棻（字紫卿）的雙鉤之中也能見得「腕力」——一如何紹基對自己的雙鉤本的評價，而「驚心動魄」已經若干次出現於對於雙鉤本的評價之

---

[163] 見於北京保利2017年春拍。啟功先生綾邊題跋稱：「當影印之術未出時，金石善本但憑雙勾，辨析毫釐，不減唐人響搨，況出何蝯翁［即何紹基］之手，勝於唐世供奉搨書人遠矣。」

[164] 此拓原為薩迎阿收藏，後歸尹濟源，尹去世後，此軸流落古董店，為吳樹聲所得，以獻崇恩，何因得借鉤。何紹基題詩即《東洲草堂詩鈔》，卷21，《雨舲中丞見示〈伊吾司馬侯猗碑〉，手鉤一通，適君以閣學內擢，因題碑後兼寫別懷》、《再題〈伊吾司馬碑〉》，頁205。何紹基將「獲」字認為「猗」字。

[165] 見丁彥臣，《雙鉤華山廟碑》題跋，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8冊，頁6076。

[166] 吳大澂、吳式芬等人也曾雙鉤《沙南侯獲碑》拓本，翟云升《隸篇》即據吳鉤本入錄。

[167] 邊浴禮，《修健堂詩集》，卷4，《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59冊，頁41-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精於篆書的楊沂孫（1812或1813－1884）曾得到一本徐鉉（916－991）摹刻《碣石頌》的雙鉤本，認為遠勝唐人李陽冰篆碑真拓：

> 陽冰而後，篆之可見者獨宋初徐鼎臣[即徐鉉]，《繹山》之傳於今者即其所摹也。余又得《碣石頌》雙鉤本，玩其結體筆法，斷非輓近所能偽作，其書實勝於陽冰。[168]

在楊沂孫的眼中，雙鉤本不僅可以玩其結構，其中也有筆法在！不獨雙鉤的原跡，那些經過刊印的雙鉤本，也同樣得到學者們的青睞。道光二十八年（1848）七月，金陵張寶德（活動於清道光咸豐間）在楊鐸（1813－1879）處見到《婁壽碑》印本，因借臨一過，這個本子就是桂馥數十年前印行的錢泳寄贈翁方綱的雙鉤本。[169] 鮑源深（1811－1884）《跋趙補園學博所藏夏承碑》則說：「至雙鉤漢碑，向見雲間馮少眉雙鉤漢《鄭固碑》、《樊敏碑》刊本，不爽毫髮，惟妙惟肖。」[170] 被鮑評價為「惟妙惟肖」的馮承輝（1786－1840，字少眉）雙鉤漢碑，也是刊本。

晚清民國之際，碑學已具席捲之勢，但有人甚至連真正的雙鉤本都沒有機會見到，他們所臨摹的古碑常常是刊行的雙鉤本。光緒九年（1883），俞樾在《思古齋雙鉤漢碑篆額》一書的序言中，明言此書學篆者宜人置一冊：

> 漢篆不可多見，欲觀漢篆者不得不博求之碑額。蓋漢碑諸篆額實秦篆之嫡派也。世人習見《繹山》傳刻之本，以為秦篆初不如是，不知彼傳刻本結構僅存，神奇全失，烏足以言秦篆？……何竟山［即何澂］太守博學好古，篆隸並工，嘗裒聚其所得漢碑額，用雙鉤法摹而刻之，以印本寄余。余謂欲學篆者宜各置一篇，以玩其用筆之法，勝於摹寫棗木傳刻之本萬萬也。[171]

---

[168] 楊沂孫，《觀濠居士文集》，卷上，《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53冊，頁347。

[169] 楊鐸，《函青閣金石記》，卷3，《漢元儒先生婁壽碑》，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6冊，頁5037。楊鐸曾雙鉤，《秦泰山刻石》，於清同治九年（1870）梓行，南京圖書館藏。

[170] 鮑源深，《補竹軒文集》，卷5，《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50冊，頁735。

[171] 俞樾序言見，何澂，《思古齋雙鉤漢碑篆額》（清光緒九年刊本）卷首，亦收入《春在堂雜文四編》，卷5，《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85冊，頁6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楊沂孫從《碣石頌》雙鉤本窺其結構筆法如出一轍，俞樾認為透過何澂刊印的《思古齋雙鉤漢碑篆額》（圖29），亦可「玩其用筆之法」，他要求學者將這部雙鉤印本視為學篆的津梁。

六、《小蓬萊閣金石文字》：雙鉤本大規模刊印的嚆矢

在照相製版出現以前，雙鉤也用於刊印金石文字，與在木板上雕鏤陰文——如同宋代以來的刻帖——相比，雙鉤入木只保留文字的外輪廓，在刷印時可以大大節省油墨。不過在翁方綱、黃易以前，雙鉤梓木的嘗試似乎很少見到。自南宋洪适《隸續》以後，顧藹吉《隸辨》、褚峻《金石圖》（圖30）、[172]張燕昌《金石契》、王昶《金石萃編》、鮑昌熙《金石屑》、馮雲鵬馮雲鵷《金石索》再現碑刻、畫像大多採用縮摹的方式，錢泳《攀雲閣臨漢碑》（後來改名《漢碑大觀》）則是臨寫的方式，其性質與刻帖並無差異。

黃易最大規模的雙鉤活動，是完成於嘉慶五年（1800）的《小蓬萊閣金石文字》。該書很可能分階段刻板，如《范式碑》雙鉤付刻在乾隆己酉（1789）十一月（圖31），[173]《漢故圉令趙君之碑》雙鉤付刻在嘉慶元年（1796）七月。[174]《范式碑》作為單行本其時已在藝林流傳，如翁廣平致翁方綱札提到：「既而得攆石先生[即錢載]所贈大人手書詩箋並雙鉤《范式碑》印本、蔡邕《石經》摹本及諸漢碑，時時習之。」[175]錢載（1708－1793）所贈《石經》摹本很可能是翁方綱的翻刻本，而《范式碑》則是小蓬萊閣的雙鉤印本，這些都成為翁廣平習隸的範本。

在乾隆後期，黃易陸續雙鉤刊行了所藏漢魏諸碑的舊拓本，包括《石經殘字》、《魏元丕碑》、《朱龜碑》、《成陽靈臺碑》、《譙敏碑》、《范式

[172] 褚峻，《金石圖》自《天發神讖碑》以下六十圖，但於一碑之中鉤摹數十字或數字，頁987-1016。

[173] 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所收《范式碑》黃易跋，頁612。

[174] 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所收《漢故圉令趙君之碑》黃易跋，頁650。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49，《漢圉令趙君碑為黃秋盦賦》亦稱「黃子急為謀雙鉤」，頁450。

[175] 翁廣平，《聽鶯居文鈔》，卷26，《上族祖覃溪先生書》，《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66冊，頁255-2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碑》（新出殘石附）、《王稚子碑》等七碑，分四冊裝幀，封面署「黃氏小蓬萊閣初印金石錄 攬勝齋藏」。⑯ 1797年，他又增加《武梁祠像唐拓本》（新出《武梁祠像》附）、《趙圉令碑》、《祀三公山碑》等三種，成五冊的規模，最終定名為《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1798年六月，翁方綱收到黃易所寄「新鋟鉤摹古刻五冊」，當即此書。在其時的回信中，翁指出雙鉤石經《論語》中的可商之處：

> 再附商者，石經《論語》「所損益」，損：此手旁下一畫似有穿過右邊之意，似不可𠂇，此處直畫不應一直逕下，是否？益：此中間八，其左一筆原本不甚分明，似乎今雙鉤太著痕跡，此一筆當如何？求兄再細酌之。此刻匆匆未及逐字細審，姑就鄙見先說此二字，恐冊內尚有欲商訂處，求兄再逐字細審之。惠寄刷印精工，紙墨俱好，而闕弟一葉（石經「斯害也已」起，闕前弟一紙），便中乞補寄此葉，更妙。⑰（圖32）

被認為以「鑒賞」——而不是「考證」——知名的金石學者，翁方綱指出黃易雙鉤本中「損」字的手旁不盡準確，而「益」字中間的「八」實而不虛，未能體現原碑的混沌感。這種細微之處的挑剔，透露出他對拓本一點一畫的專注觀察，其出發點自有範本價值的考慮，而不僅學術研究的意義。如果僅僅在意於釋文，他根本無需在這些枝節問題上大費周章。

嘉慶五年（1800），《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在卷首又增加了錢大昕的序言：「（黃易）頃歲出其家藏宋搨《石經殘字》及《成陽靈臺》、《魏元丕》、《朱龜》、《譙敏》、《王稚子》、《范式》諸刻，雙鉤而鐫諸木。」⑱

---

⑯ 攬勝齋在杭州聖因寺，黃易何以如此標識，原因尚不清楚。參見楊虎，〈故宮藏《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版刻年代辨析〉，從避諱字、板式、所選碑刻的層次、與原拓本題跋對校的訛錯情況等綜合討論《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四卷本，收入秦明主編，《黃易與金石學論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337-345。

⑰ 翁方綱，《致黃易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⑱ 錢大昕序只提到七種宋拓，可能並非本年完成的。此書的版本極為複雜，淩霞《癖好堂收藏金石書目》著錄了《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兩種版本，一為三冊，有錢大昕序，另有陳鈞序，則他本所無，為初印本，鮑澄所藏；一為五冊，有翁方綱題記及詩，乃極初印本，無《三公山》、《譙敏》兩碑，《武梁祠》無考釋，羅聘藏本。頁18-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摹刻在書中的翁方綱一段隸書題識也說：「錢唐黃秋庵小蓬萊閣所藏金石，就其罕傳者雙鉤鋟木，以公同好。」[179] 他們都將黃易以「雙鉤」作為這本書最為重要的特點。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的刊印是黃易宣傳所藏舊拓的重要策略，在收錄各家題跋、為學界提供各種學術觀點的同時，他以雙鉤的方式再現碑文的一波一磔，也為學書者提供一份可信的臨摹範本。[180] 此書刊行之後，一時洛陽紙貴。[181]《石經殘字》曾經的主人董元鏡認為此書「既使古人之遺跡不泯，復令後人之取法有資」，在保存古人遺跡的同時，也為有志隸書的學者提供了優質範本。[182] 這一反饋充分肯定了《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的書學價值。

此書原版今日罕見，流傳甚廣的有道光十四年（1834）石墨軒翻刻本、道光二十二年（1842）仁和高學治陵苕館重摹本等。高學治在翻刻該書的跋文中稱：「黃先生秋盦《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如干通，摹勒精好，耆古者珍之。以年歷稍久，刻畫改觀，復就藏冊重摹一過。」（圖33）在重摹《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的次年（1843），他又續刻《夏承碑》、《婁壽碑》、《劉熊碑》與《吳天璽碑》四碑的雙鉤本：「其《婁壽》、《劉熊》兩碑出翁先生覃溪鉤藏本，《吳天璽碑》火燬後墨本日少，爰假宋拓鉤摹，以存古碑面目。《夏承

---

[179] 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頁551。

[180]《武梁祠像唐拓本》榜題字甚小，因摹寫——而非雙鉤——上板，其他新出碑刻如《祀三公山碑》、《范式碑殘石》、《武梁祠像》等，因有拓本流傳，故亦摹寫，不作雙鉤。

[181] 阮元、董元鏡、孫星衍、桂馥、胥繩武、巴樹穀等人或得到餽贈，或作書相求。見阮元，《致黃易札》，收入阮元、孫星衍，《二家書札》；董元鏡，《致黃易札》，收入黃易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9冊；孫星衍，《致黃易札》，收入阮元、孫星衍，《二家書札》；桂馥詩作見《未谷詩集》，卷4，頁744；胥繩武，《致黃易札》，收入黃易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11冊；巴樹穀，《致黃易札》，收入黃易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12冊。

[182] 董元鏡，《致黃易札》，收入黃易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9冊。當然，這部書也具有相當的學術含量，除了拓片上舊有的題跋，如《王稚子碑》過錄攝六老人、文柟、顧苓等跋文；《唐拓武梁祠畫像》過錄查慎行、金農、查嗣瑮、朱彝尊、龔翔麟、胡開泰、查田、沈元滄、馬曰璐等人跋文。黃易也將釋文與當日徵集的友人題跋一併彙刻，從中可以看到相關學者關於釋文與考證的對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碑》則梁氏、巴氏皆有刊本，流傳或寡，因類梓之。」[183] 他的續刻活動顯然受到了黃易的啟發與鼓舞。

如同黃易所期待的，除了學術上的價值，《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也一直扮演著碑學範本的角色。如方朔於童年時獲得一本《小蓬萊閣金石文字》，覺得其中的《武梁祠堂畫像題字》字體古秀，摹勒精工，以至「朝夕臨仿，愛不釋手」。[184] 王懿榮則認為《武梁祠畫像題字》小隸書不帶波磔，用於著款，最為雅觀。[185]

七、晚清的雙鉤刊本

作為漢魏隸書碑刻雙鉤本的叢刻，《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成為後來學者刊行同類書籍的模範。1798年，阮元祝嘏京師，張鑑同行，得見《西嶽華山廟碑》三種拓本，阮元屬其為考，張本打算「欲每字雙鉤為之引證，然後入考，如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之例」，但阮元急於成書，未能施行。[186] 這是將《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當作學術典範的例子。歸安丁彥臣（1829－1873）則將該書視為書學楷模，他在宦游山左時，搜集古鐘鼎彝器、殘碑斷碣拓本甚多，因仿《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之例，取其佳者雙鉤鋟木，成《梅花草盦雙鉤碑刻》五冊（1872），該書只刊雙鉤圖版，無任何考釋文字（圖34）。[187] 凌霞《梅花草盦石刻鉤本敘》特別談到了雙鉤複製書法的重要性，認為好的雙鉤本如

[183] 高學治，《陵苕館續刻金石文字》自跋。其中《西嶽華山廟碑》乃據張廷濟藏殘本增刻，高學治跋云：「《華山碑》傳世絕少，所見雙鉤本皆去其侵蝕痕跡，故與真本不合。張丈叔未出示殘拓，因就其屈曲處細意模之，差與原本不遠。叔荃記。」

[184] 方朔，《枕經堂金石題跋》，卷2，《漢武氏祠左右前後石室畫像題字全本跋》，頁14252。

[185] 王懿榮，《致王瓘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86] 張鑑，《冬青館集乙集》，卷7，《西嶽華山碑書後》，頁681。

[187] 丁彥臣，《梅花草庵雙鉤碑刻》四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所刊雙鉤本包括《篆存》與《漢碑鉤本》，卷前摹有「同治壬申暮春之初湖州丁氏梅花草庵刊本」牌記及匡源（吳懋乾代書）、宮本昂題名，凌霞同治壬申（1872）八月序言。丁氏鉤本此書未見者尚有《西嶽華山廟碑》，乃同治七年（1868）屬海鹽張芷衫從翁方綱雙鉤本、方朔藏唐翊華雙鉤本重為雙鉤。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8冊，頁60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燈取影，若摹勒盡善，足與真跡抗衡。他還追溯了清代的雙鉤碑刻刻板活動：

> 然或孤本單行，如曲阜桂氏刻《婁壽》，歙巴氏之刻《劉熊》，海鹽許氏之刻《夏承碑》是也，許名《古均閣寶刻錄》或不止此一碑，諒是未成之書。若其裒集各種，鏤版精良，則首推黃氏，嗣仁和高氏陵苕館續刻繼之，而上海徐氏隨軒、上元張氏鐵齋亦其類也。近人宜都楊孝廉守敬亦有《望堂金石文字》之刻。[188]

凌霞提及，雙鉤刻木的單行本，桂馥、巴慰祖、許槤（1787－1862）皆曾有之，[189] 前文談到巴慰祖寄贈翁方綱的《劉熊碑》雙鉤本，1783年張塤曾為梓木；錢泳寄贈翁方綱華夏舊藏《婁壽碑》雙鉤本，桂馥欣然為付剞氏。海寧許槤所刻《古均閣金石寶刻錄》雖然只有《夏承》一碑，但他原先計劃的可能也是一部大型叢刻（圖35）。杭州吳清鵬（1817年進士）曾稱：「安得珊林（許）與雙鉤，更倩梅溪（錢）為上石。」[190] 可知許槤與錢泳在嘉慶年間頗有雙鉤與勒石的名聲。凌霞也認為集合多種碑刻的雙鉤本當以《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為嚆矢，此後續有高學治《陵苕館雙鉤古刻五種》（1843）、徐渭仁《隨軒金石文字四冊》（寒木春華館刊本，1837）（圖36）、張寶德《鐵硯齋雙鉤石刻文字一冊》（1852年序）、楊守敬《望堂金石文字十六冊》（1870－1877）及《望堂金石二集》等。如《隨軒金石文字》常為晚清學者參考，葉昌熾《語石》卷十《孤本一則》云：「四楊碑，余曾得上海徐紫珊[即徐渭仁]雙鉤本，天津樊文卿[即樊彬]所藏也。」[191] 李瑞清《跋漢圉令趙君碑》亦說：「隨軒謂人間三本，其二已殉葬，則此紙誠海內孤本矣，曾雙鉤於《隨軒金石文字》。」[192]

但凌霞沒有提及的雙鉤印本其實尚多，包括葉志詵《平安館金石文字七

---

[188] 凌霞，《天隱堂文錄》，卷上，《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29冊，頁556-557。

[189] 許槤，《古均閣寶刻錄一冊》（清咸豐八年古均閣刻本），僅雙鉤夏承一碑，自序並附考證。

[190] 吳清鵬，《笏庵詩鈔》，卷13，《小香侄藏張文敏公墨蹟》，《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53冊，頁555。

[191] 見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 語石異同評》，頁548。

[192] 見李瑞清，《清道人遺集攟遺》，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91冊，頁8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吳雲（1811－1883）《兩罍軒彝器圖釋》、《二百蘭亭齋金石文字七種》、《長垣本西嶽華山碑雙鉤本一冊》（1867）、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十六卷》（1871－1872）、何澂《思古齋雙鉤漢碑篆額三卷》（1883）、吳大澂《攀古樓漢石紀存（沙南侯獲刻石）》（1873）、石宗建《古歡閣雙鉤秦漢石刻一冊》（1889）（圖37）、余弼《儷古閣雙鉤金石文字一卷》（1878）、舒立濬《山可樓雙鉤古刻十六卷》、劉心源（1848－1915）《奇觚室樂石文述》（1899）等。如吳雲庚午仲夏雙鉤《漢東海廟碑》，題記有云：「舊臧長洲顧氏藝海樓，後歸於余。……余昔曾重樀勒石，臧之焦山，今復雙鉤鋟版，庶流傳益廣云。」在吳氏藏本的題跋中，有張開福（張燕昌子）壬寅四月十日一題記，云：「此刻為江南之冠冕，惜石已佚，今從藝海樓藏本獲見之，它日得雙鉤，付之梨棗，以垂不朽，如黃氏《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本，不亦快載。」[193] 可見通過雙鉤刊行以擴大碑刻的流傳，是當時金石學者的共識。而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無疑是後來者的典範。又如石宗建《古歡閣雙鉤秦漢石刻一冊》，雙鉤秦漢石刻四種，凌霞題跋稱：「其意殆欲彙為一書，與小蓬萊閣抗衡，今所存止此」，意謂石氏原先的規模可能更大，惜三十五歲遽然病歿。[194]

這些雙鉤印本，其主要目標是再現古碑書法，為學者提供一個值得信賴的範本。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收碑涵蓋秦漢迄南朝，[195] 同治十年（1871）七月，潘祖蔭在序言中談到《小蓬萊閣金石文字》雙鉤漢魏碑刻全文，可惜「寥寥數種而已」。至於各種縮本，已失其真，不足為訓。[196] 而張德容的鉤本「文字之大小多寡悉據所見本為准，不使稍有增損」，[197]「皆鉤摹精審，不失銖黍」。[198] 在卷首的《論略》中，張德容也特別立下雙鉤的原則：

---

[193] 吳雲，雙鉤《漢東海廟碑殘字》，清同治九年（1870）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94] 石宗建，《古歡閣雙鉤秦漢石刻一冊》，上海圖書館藏。

[195] 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自序云：「至於篆隸筆跡為書家寶貴，特其顯焉者爾，容于秦漢皆鉤摹之，三國至南朝碑版無多，因而附焉，北魏以下則錄其全文，記其行款。」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3冊，頁1720-1721。

[196] 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頁1718。

[197] 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陸增祥序，頁17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雙鉤影摹，……為書法起見者，必求字跡完好，筆畫精工，所貴勾勒鋒芒，與真跡不差纖悉。……惟出土稍後，……或舊拓佳本庶幾筆意猶存，若殘泐之碑版，不過略具規模而已。未可以一例觀也。
> 傳摹金石與翻刻法帖不同，蓋翻刻法帖者意專在乎講求筆法，皆運以己意，……若傳摹金石，但求存其跡而已，固不容己意存乎其間也。
> 今每鉤摹一碑，必取所得新舊拓本盡列於前，細意核對，不拘一本，或此字取此本彼字取彼本，皆擇其善者從之。
> 有甚模糊之碑，而鉤本反甚明白者，此其臨時審諦，具有苦心。
> 學漢隸者往往多為頹鋒禿穎，描頭畫角，自以為古，不知古人作字無不出鋒者，或如斬釘截鐵，或如劍拔弩張，蔡邕、衛恒皆言書勢，其頹禿者乃碑之磨泐使然，豈其勢哉。[199]

雖然為此書作序的學者每嘲諷翁方綱等人為賞鑒家，《二銘草堂金石聚》縱然也有考證文字，但從《論略》看來，再現古碑書法無疑是這部印本的旨趣，為此張德容一再解釋如何選本、如何克制己意、如何處理拓本的模糊之處、如何認識鋒芒與頹禿等。羅振玉歷論自來的金石學著作，認為洪适《隸釋》易隸以楷，字形已失；王昶《金石萃編》於漢魏諸碑乃各如其書體錄之，「形差得矣，而原石漫漶缺泐之處，又不免以意增損」；而張德容《金石聚》以雙鉤存古碑原形，視二者為勝。但在比較趙之謙《二金蝶堂雙鉤漢碑十種》（其書為羅所藏，未付梓）之後，羅又認為趙氏鉤勒精於張氏，《金石聚》「鉤勒未善，加以粗工拙刻，筆意全失，譌誤滋生，仍不能無遺憾」。[200] 可見從事者的目標與讀者的認識之間往往有很大的距離。但這些精粗不同的雙鉤本都進入了晚清書學的範本系統。

楊守敬對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也非常熟悉，嘗評《成陽靈臺碑》、《涼州刺史魏元丕碑》、《幽州刺史朱龜碑》、《王稚子闕》、《廬江太守范式殘碑》諸鉤本「秀潤異常」、「秀雅流麗」、「最佳」。徐渭仁《隨軒金石

---

[198] 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潘曾瑩序，頁1717。

[199] 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卷首《金石聚論略》，頁1722-1724。

[200] 羅振玉，《漢晉石刻墨影》（民國四年上虞羅氏景印碧古叢編本）卷首《序》。《二銘草堂金石聚》所鉤諸碑，大多破碎而棱角特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字》所刻《巴郡太守樊敏碑》雙鉤本，楊守敬也以為「最佳」。[201] 他還曾專門討論黃易、翁方綱等人所創雙鉤刻本的重要價值，題《廬江太守范式殘碑》云：

> 小蓬萊閣有雙鉤宋拓全本，最佳。余嘗謂黃小松、翁覃溪諸公創為雙鉤刻本之法，有功於後學，亦有功於古人。惜僅刻其石之不存者，而其石之見在者，俱未之及。余以為今日所存之石，更數百年必多亡佚，□即如《隸釋》所載，今十不得二三，即有存者，剝蝕太甚，假使洪氏當日悉用雙鉤之法，至今不稱為奇寶乎。……私意欲將漢晉篆隸及六代三唐書，無論石之存與不存，擇其尤者雙鉤鐫木，使窮鄉僻壤單寒之士皆得集天下之大觀，窺書法之正傳，又使後之好古者易於重刻，不至有傳寫訛誤之失，而古人之精神面目永傳於不敝，豈非一大快事哉！但落落難合，此志未知終能償否。世有好事之君子，余願襄校訂之役焉，特附記於此。[202]

在這篇跋文中，楊守敬充分肯定了黃易、翁方綱等人的雙鉤刻本保存古物，且使後人有所取則的重要意義。但他們所鉤刻的都是一些原石亡佚的碑刻，對於那些碑石尚在的則忽焉不鉤。楊氏認為陵谷遷變，即使今日新出碑刻在未來也可能磨泐或是毀壞，仍有鉤刻的必要，他以洪适編撰《隸釋》為例，指出今日所見碑刻與洪所錄文者已經大相徑庭。[203] 雖說楊氏刊行《望堂金石》旨在為「天下寒士」提供一套完整的古代書法範本，但即如梁啟超（1873－1929）這樣富於收藏的學者也常常臨摹其雙鉤刻本，其跋《自臨張表碑》云：「《張表碑》在分書中最姿媚，與今隸偪近。拓本極難得，從楊氏《激素飛青閣雙鉤本》臨一通，為莊兒學楷師資，乙丑上元任公自跋。」[204] 可見以梁啟超的資源，尚不能輕易獲得晚近出土的《張表碑》的拓本，他的臨摹乃取資於楊守敬的雙鉤印本。古碑拓本的雙鉤本在乾嘉之後大量刊行，填充了人們對於範本需

[201] 見楊守敬，《激素飛清閣評碑記》，卷1、卷2。

[202] 見楊守敬，《激素飛清閣評碑記》，卷2。

[203] 此說也得到淩霞的贊同，見《天隱堂文錄》，卷上，《梅花草盦石刻鉤本敘》，頁556-557。

[204]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民國十五年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卷77，頁43b。《激素飛青閣雙鉤本》即《望堂金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求的空缺，扮演了比碑刻原拓更為重要的角色。

儘管覺得一己之力或有不足，楊守敬仍有宏大的雙鉤刊印古碑的規劃，這個規劃就是《望堂金石》。除了一些已經佚失或是遠在邊陲的碑刻，新出的北魏碑刻也大量出現在這個規劃之中。借助於可見的拓本、鉤本及已經刊印的雙鉤本，《望堂金石》計畫雙鉤古碑50種，在序言中，楊守敬再次提到洪适僅錄碑文而不雙鉤文字的失誤：

> 右雙鉤古碑五十餘種，宜都楊氏之所摹也。金石家言嘗病洪氏《隸釋》，以今所存原碑校之，多不合，良由輾轉翻刻，致斯訛誤。假使景伯[即洪适]當日用雙鉤之法，今日之寶洪氏書者當更何如？自洪氏至今日，碑之存者十不得三四，更數十百年後，必尤多亡闕。因念見存漢碑不過數十種，即全摹之，所費亦不甚巨，將來因罕見珍，始知此事非過舉。顧蓄此志以告人，無應之者，而余之力又不及此，乃先以碑之不存者或最舊拓本付之梓人，六朝、唐碑則以有名之跡附焉。其已見錢唐黃氏《小蓬萊閣》及上海徐氏《隨軒金石文字》者，俱不復刻。自同治庚午（1870）迄光緒丁丑（1877）共得斯數。耗精力，竭資財，極屯窮而不悔，後之君子其有鑒於斯。二月廿六日，守敬記。[205]

楊守敬前後耗費七年精力，投入大量貲財，將《小蓬萊閣金石文字》、《隨軒金石文字》所未刻的一些舊碑（自《石鼓文》至唐人楷、行名碑）俱付梓人。這次大規模的刊行事實上只完成了32種，嗣後楊守敬再選18種碑刻，於宣統二年（1910）刻成《望堂金石二集》，[206] 在首碑《禮器碑》之前，有楊守敬一跋，云：

> 守敬前於京師見北宋本於揚州董氏，光緒甲申過蘇州，□梅生處見南宋本，去年於金陵端制府署見元拓本，皆鉤而藏之。守敬又於上海得「廟」字不損本，乃囑黃岡劉晞參合諸本，審慎無訛，付之梓人。自今已往，使

[205] 見楊守敬，《望堂金石》，楊守敬自序，頁2778。

[206] 《望堂金石二集》收入了《日本古刻佛足跡碑》、《日本道澄寺鐘銘》、《日本古刻銅燈檯銘》、《新羅真鑒禪師碑》等域外碑刻，此外楊守敬還單獨刊刻了一些大字碑刻，如《高句麗好太王碑》、《滎陽鄭氏碑》、《泰山經石峪》、《匡喆刻經頌》等，收錄範圍較之前的同類書籍更為廣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天下學者皆得見宋元本矩度，伯皆［即蔡邕］、元常［即鍾繇］如臨几席，分隸正傳即之斯在，不亦快乎？[207]

楊守敬將所見各種版本的《禮器碑》皆一一鉤藏，最後參而合之，成一獨特的善本，再行入木，他認為這個印本的價值足可代表隸書的正傳，學者置一冊於案上，不啻如見蔡邕（133－192）、鍾繇（151－230）的手澤。[208] 值得注意的是，楊的雙鉤也非皆以舊拓本為底本，大多皆雙鉤本的重鉤本。

在《望堂金石二集》的編輯過程中，楊守敬仍陸續得到一些碑刻善本，不過因年事已高，無力雙鉤，如宣統元年（1909）四月廿六日，七十二歲的楊守敬跋《宋拓本麓山寺碑》云：「惜余老，不能雙鉤，與《李秀》、《法華》并入《望堂金石》中也。」同年跋《李思訓碑跋》又云：「及見弇州、叔未［即張廷濟］本，乃知天壤間已無不缺字之本。幸油箋雙鉤本尚存篋中。今年春乃以入木刻，既竣，徐君行可乃得此本，為天門蔣氏故物，……亦未必非宋拓。……惜余刊版已成，未能互校之也。」[209] 可見這一大規模的雙鉤刊印活動，乃楊氏晚年最為著意者。

羅振玉《漢晉石刻墨影》也雙鉤了新出碑刻15種，其1915年八月一序云：

> 去年冬，予撿晚出之漢魏諸刻咸同諸家所未得見者二十餘種付諸裝池。今年長夏，矢志影模，舍漫漶已甚及細書非吾目力所能勝者，日模二三紙，逾月遂得十有五種。其十四種者皆出於我生以後，惟嵩廟石人頂「馬」字爲黃小松訪得，以傳拓至少，亦並及之，顏之曰《漢晉石刻墨影》。取校原刻，自謂筆法具存，臨池家可取以臨寫，僅下墨本一等。然以視初志，僅償什佰之一二已耳。[210]

---

[207] 見楊守敬，《望堂金石二集》，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4冊，頁3014。

[208] 以同樣精審的方式，《望堂金石二集》中還刊刻了《雲麾將軍李秀碑》、《法華寺碑》、《李思訓碑》等李邕名下的行書碑刻。楊守敬跋《雲麾將軍李秀碑》稱：「余以丙戌（1886）道出津沽，得此舊本於市上，裝池既解，損失復多，然的是未斷截時拓本，乃就陳刻排次並補其殘缺，鉤而藏之。越十有一年，覆之於木，並刻李本之後，以所摹各有手眼不同也。」頁3178。

[209] 皆收入楊守敬，《鄰蘇老人手書題跋》（民國五年宜都楊守敬觀海堂景印本）。

[210] 羅振玉，《漢晉石刻墨影》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羅振玉早年即有志於取傳世漢魏石刻，求明代及清初善拓，手自勾勒，以傳其真，不過少居鄉里，得善拓不易，壯年出遊，又不暇從事，直到衰年索居海外，才有機會雙鉤所藏漢魏刻石若干，以償夙願。從序言可知，他的雙鉤目標乃傳其筆法，供書家臨寫（圖38）。可見在晚清以後，臨池範本已經成為雙鉤本的首要功能。雖然黃易、徐渭仁等人的雙鉤為考證家所鄙視，如朱一新（1846－1894）認為：「若黃小松、牛空山［即牛運震，1706－1758］、徐紫珊諸書鉤摹雖精，乃鑒賞家之事，非史學所亟。」[211] 不過碑刻雙鉤及其刊印在晚清卻擁有巨大的市場，眾多學者其實也未能置身事外。

因應人們對名家作品的欣賞與學習需要，晚清也出現了許多當代隸書的雙鉤本，如佚名雙鉤巴慰祖《臨漢魏碑冊》，以油紙雙鉤巴氏所臨《聞喜令韓仁銘》、《魏修孔子廟碑》等若干種（圖39）；[212] 又如何紹基臨漢碑常數日一通，且各碑輪流，周而復始，宮爾鐸（1838－？）《跋何子貞臨張遷碑》云：

> 子貞太史以善書名海內，……此冊乃太史臨寄丹初［即閻敬銘，1817－1892］相國者，頗擅蛟龍盤拏肉屈強之勝，頃假得臨橅數過，屬解梁曹茂才鑫雙鉤藏 ，用識墨緣。[213]

宮爾鐸除了臨摹何氏臨摹的《張遷碑》，還特地倩人雙鉤收藏。翁同龢（1830－1904）激賞翁方綱、何紹基書法，也曾重鉤翁方綱鉤摹《化度寺碑》，[214] 並鉤摹何紹基臨《衡方碑》等。[215] 有些雙鉤本甚至進入刊行，成為碑學書派的當代資源，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雙鉤印行《伊銘谷先生法書》即是一例。[216]

---

[211]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4，《答問經史學問》，頁174。

[212] 安徽省博物館藏。該館將此冊命名為《清巴慰祖雙鉤漢碑冊》是錯誤的。

[213] 宮爾鐸，《思無邪齋文存續集》，卷1，《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41冊，頁187。

[214] 私人藏。

[215] 《猗叟臨衡方碑》雙鉤本，翁同龢署簽。

[216] 南京圖書館藏。銘谷為伊秉綬子伊念曾（1790－1861）之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八、雙鉤本作為範本

雙鉤本進入刊印與傳播，成為人們臨池的範本，無疑促進了古碑的經典化。但不能否認的是，鉤摹只以墨筆或朱筆提示金石文字的外輪廓，很難全面揭示拓本的古意。

從視覺屬性也就是視覺空間特性上來說，雙鉤本保留的是一個個空心字或是空心的點畫，而承載它的背景卻消失了。在拓本中，那些斑駁的背景雖然對於人們理解書法幫助無多，但黑白對比的強刺激，會抑制觀看者對於其他區域尤其是字畫邊緣線的特別注意，拓本在視覺上所強調的是一種空間組織關係，以及這種組織關係所暗示的書寫動態，而單一的點畫形象尤其是起筆、收筆的形狀不會被凸顯。不過，雙鉤本中「背景」的缺席，使得點畫輪廓線成為觀看與臨習的重心，尤其對於那些少見真正拓本的人來說。原先並不為人注意的黑白交接處的輪廓線，此時卻能讓臨習者的視覺神經感到興奮。如何通過用筆實現邊緣線緩慢而曲折的變換，以及點畫起止的形狀如何得到更為準確的刻畫，成為臨習的主要目標。

《西嶽華山廟碑》的拓本與雙鉤本，其視覺旨趣大不相同，如一些波畫收筆的形態在拓本中很容易被理解為向上翻騰的筆勢，以及與下一筆畫的關聯，但在雙鉤本中，卻會被固定為一個程式化的斜切面，這個斜切面通常具有幾何形的特徵（圖40），在臨寫中加以刻畫需要放慢速度，有時要相當刻意才能辦到。對於邊緣線的蓄意刻畫——無論是光潔還是曲折，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書寫的速度，以至於速度的變化常常只體現在出鋒點畫的略微加速，並產生輕微不滿的「飛白」效果。[217] 當然，不同層次的書家多少都有獲睹原石與拓本的機會，在臨習時並不會完全受到雙鉤本的左右。但清代碑學的主要人物大多有參與雙鉤活動的經驗，有些是資源受到局限，有些卻樂在其中，因此即使是臨習拓本，也會在觀看方法、美學趣味與表現手段上潛在地受到雙鉤實踐與雙鉤本視覺特徵的影響。

---

[217] 至於我們在碑刻拓本中不難分辨的點畫、磨泐或是石花，在雙鉤本中卻可能會被理解為碑刻的元素之一，如《古歡閣雙鉤秦漢石刻》、《儷古閣雙鉤金石文字》所收《秦篆殘石十字》所用的都是葉志詵鉤本，這個鉤本對石花的刻畫有一種奇特的裝飾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雙鉤與刷印技術而言，能否再現原碑準確的輪廓也是一個問題。比如時人評論中常常出現的肥瘦之論，很可能涉及到雙鉤輪廓取拓本文字外邊緣還是內邊緣，可見鉤摹本與碑刻拓本之間並非完全對應的關係。雍正年間，吳玉搢與王澍都做過宋拓《夏承碑》的雙鉤本，翁方綱曾分別據以鉤摹。1781年，翁方綱在見到吳門陸氏所藏宋拓本之後，深感舊拓「古氣渾淪，真希世之珍，其拓本筆筆有陰陽向背之勢」，於是再次借來王澍雙鉤本對看，發現王未得此碑之妙。雖說吳玉搢的雙鉤本遠佳於王澍的雙鉤本，但原本左右向背陽開陰閉之妙，吳鉤本仍然全未夢見。[218] 翁方綱從拓本中看到的向背開闔，在王、吳二家的鉤本中都無從感受。翁氏的遺憾，無疑來源於雙鉤者理解力與技術能力的不足。

但即使是擅長雙鉤如吳大澂者，對於以雙鉤刊印的方式複製拓本也心存疑慮。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時任陝甘學政的吳大澂收到陳介祺所寄秦瓦文字八十種的拓本，他將在鉤摹後依照阮元刻《王復齋鐘鼎款識》之式，請刻工在三原上板，但他不知是用雙鉤，還是依照拓本翻刻。[219] 次年（1875）二月，在得到雙鉤上板的指令之後，他迅速鉤成二十餘葉寄至三原，屬工人立即上板，不過吳大澂此時寫給陳的信中並不自信：

> 惟拓本渾成，鉤本板滯，僅存模範，恐失神采，□□雙鉤亦須運腕填墨後筆力較健，其一種樸茂之氣則不可模仿。即無字各種神妙變化，一圈一點，皆與古籀相通。[220]

像吳大澂這樣多見古物與拓本的金石學者，又身在陝西，熟稔瓦文的古質趣味，他擔心雙鉤上板不僅不如填墨後的摹本較有筆力，也根本無法再現拓本的「樸茂之氣」：哪怕是那些非文字的圖像、紋飾、邊框，也隱然有篆籀生動之意。

---

[218] 翁方綱，《復初齋集外文》，卷4，《跋宋搨（夏承碑）》，《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82冊，頁666。

[219] 吳大澂，《致陳介祺札》，收入《吳愙齋尺牘》（民國十七年長沙商務印書館景印本）。

[220] 吳大澂，《致陳介祺札》，收入《吳愙齋尺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葉昌熾對於雙鉤刊本也有保留意見，認為「如先雙鉤而廓填之，索索無生氣」，他曾說：

> 模勒古碑，古有響搨之法，今人輒喜用雙鉤。歸安吳氏《化度》、《溫虞恭公》皆有雙鉤本，激素飛清閣雙鉤古帖多至數十種。吾友費屺懷［即費念慈，1855－1905］同年嘗謂余云，重刻石本滯於跡象，不如雙鉤本之傳神，洵為知言。然亦視其工拙何如耳。小玲瓏館馬氏重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氣動墨中，精光四射，視西安原本幾幾青出於藍。劉燕庭《金石苑》縮豐碑於尺幅，大小真行，各極其態，皆黑文也。試以初印精本《隸釋》（黑文）與新刊《隸篇》（雙鉤白文）校之，黑文何嘗不勝白文。㉑

在費念慈（1855－1905）看來，雙鉤本比重刻本更為傳神。對此葉昌熾雖表認同，但認為要分別對待，工藝水準才是關鍵。在他看來，劉喜海《金石苑》中有不少碑刻都是縮摹的「黑文」［即陽文］，非常精彩（圖41）。同樣，精印的洪适《隸釋》與翟云升《隸篇》相比，縮本陽文（前者）也更勝於雙鉤（後者）。除了縮臨與雙鉤的水準，刷印是否精緻考究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標。

此外，與刻帖一樣，雙鉤也存在底本問題。㉒ 前文的舉例中，我們提到許多雙鉤本並非都從原拓本上獲得，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根據雙鉤本不斷製作雙鉤本，翁方綱、何紹基等人的雙鉤實踐，很多建立在雙鉤本而非原拓本的基礎上，《望堂金石》中大量雙鉤本也是楊守敬從他處再次雙鉤而來。反復鉤摹所獲得的雙鉤本，與拓本之間的距離無疑進一步擴大，如同不斷翻刻的刻帖。因此，晚清關於刻帖的種種批評其實也同樣適用於雙鉤本。

何紹基曾說，不善書者，其鉤本的品質無法得到保證，故清代的雙鉤本大多出自名家手筆。但這也帶來另外一個問題：鉤本（包括摹本）的風格化。

㉑ 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 語石異同評》，卷10，《右雙鉤本一則，附木本、廓填本》，頁549。

㉒ 有時也會有真偽的爭議，如何紹基認為：「《元丕碑》久佚，止有孤拓本，故此老為此語。小蓬萊閣雙鉤本全乏古意，恐所藏舊拓尚是翻刻本也。」見《東洲草堂詩鈔》，卷25，《意有未盡再題六首》其二，頁2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鉤本體現出書家的書寫習慣或者他觀照碑刻的興趣點，是很自然的事。王懿榮《致陳介祺札》曾經提到：

> 侄嘗謂當時人書、當時匠人刻之，無論工拙皆勝於後人名匠摹刻萬分，天地止此一氣運，當時刻者手腕與寫者手腕不計工拙，皆息息相通，中有真氣，且能符寫者本色，以蘇、黃當時刻石之品，較以後人精摹從原跡鉤下者，較之自見，雖精亦遜。侄嘗謂甚不取後人刻帖也。若翁鉤者，字似翁；錢刻者，字近錢。無怪《閣帖》，先不必別其真偽，止此一部都似一手書，為可笑耳。故益重此寒舍冷石也。㉓

碑刻一旦經過雙鉤——無論用於刻帖還是刊印，都會打上了鉤摹者深深的烙印。王懿榮舉例說，翁方綱的雙鉤本，字像翁方綱，錢泳刻的帖，字像錢泳。那麼，當一個學書者將翁、錢等人的雙鉤本與刻帖作為範本時，他們臨摹的到底是古碑，還是翁或錢的書法？趙梓汝在研究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與其雙鉤底本時也指出，黃易雙鉤《魏元丕碑》時，多處將原拓的缺損筆畫補全，「補缺的過程更易融入黃易作為一名書家的個人書風」。㉔雙鉤本如果連形似都做不到，展現的只是雙鉤者自己的書法風格，其作為範本的意義無疑需要重新評估。

今日所見同一塊碑刻的雙鉤本常常有很大的差異，除了鉤摹者的書法風格之外，也與他們的個人習慣有關。比如，在點畫起止的處理上，有尖、方、圓的不用，有些甚至起止不封口；輪廓線有連續、斷續乃至破碎的不同；線條邊緣有光潔、曲折的不同；殘泐部分空出不鉤或全部鉤出的不同，等等。《劉熊碑》現存乾隆年間巴慰祖鉤本、翁方綱鉤本（陵苕館、平安館、望堂皆據此）的刊印本，翁本乃據江德量、巴慰祖鉤本及汪中所藏宋拓本合而成之，與巴本雖有一些顯著的差異——如巴本結構較為鬆散，而翁本更為茂密；有一些字如絕、妙、其、心、旁、不、在、我等，結字也存在差異（圖42）；且巴本的漫漶只涉及單字，翁本則鉤出鄰近區域的石花。但兩本的點畫輪廓都光潔連貫，

㉓ 王懿榮，《致陳介祺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㉔ 趙梓汝，〈由黃易雙鉤古碑衍生的相關書學信息初探〉，收入秦明主編，《內涵與外延：故宮黃易尺牘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8），頁279、2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顯得混淪古茂。值得注意的是，同治年間趙之謙為沈樹鏞重鉤所藏錢泳（沈樹鏞此前誤認為齊彥槐）雙鉤本——該本以天一閣藏本為底本，趣味與巴、翁完全不同，這個鉤本輪廓曲折，起收方棱，楊守敬認為殊非原碑真相。㉕（圖43）除了楊氏所揭示的底本樣貌的差異，鉤摹者的習慣是參與其中的重要因素，這個習慣有可能與書寫習慣相對應，如翁方綱隸書大多點畫光潔，他所鉤《琅邪臺殘石》（圖44）、《婁壽碑》等，大多展現出光潔圓潤的特點；㉖但也有可能與書寫習慣相左，只是一種鉤摹的「風格」，如趙之謙隸書也很少頓挫痕跡，但他的鉤摹本大多點畫輪廓頓挫竭蹶，且輪廓線多斷續、不連貫，如《二金蝶堂雙鉤漢碑十種》所收諸碑，手法皆大同小異。

再如《西嶽華山廟碑》，翁方綱以四明本為底本的鉤摹本、嚴可均合四明本與長垣本的雙鉤本、阮元補四明本的雙鉤本、趙之謙補順德本的雙鉤本，在形貌上也頗有不同的特點。翁本光潔渾厚，磨泐處往往外廓之內再以實筆標識點畫，與他所鉤《劉熊碑》等有一致的習慣（圖45）；阮本亦連貫潤澤，惟於點畫起首及交界處往往略加肥重，頗有楷意，這與他對此碑的認識有關（圖46），其跋華陰本云：「原碑……凡撇皆甚尖出鋒，迥不似隸法，即此可見漢末已近於楷。凡摹刻皆圓其鋒以就隸法，皆失之矣。」㉗嚴本按筆順鉤摹，對於鋒芒更為強調，楷意也更加濃厚（圖47）。而趙本則輪廓方棱，用筆細碎曲折，若將趙本與其底本——冊中所附舊雙鉤本進行比較，差異也一目了然，後者雖有偶斷續處，但整體上波磔豐肥，轉折處婉轉流利（圖48）。可見，趙之謙的雙鉤並不忠實於舊本，而顯示出強烈的個人習慣與意趣。如果我們再比較陵苕館（據張廷濟藏本）、梅花草庵（據長垣本）與望堂（據長垣本）的鉤本，其間差異也很大，在雙鉤手法上，高本保留浸蝕痕跡，細意摹其屈曲，故頓挫沉鬱，相比之下，丁本簡直稚拙，楊本則整飭茂密。風格之異，一目了然（圖49）。事實上，在後人眼中，各種《西嶽華山廟碑》的鉤摹與翻刻本幾乎完全不同，如劉喜海認為，襄陵喬氏重摹本、曲阜孔氏重摹本分別鉤自華陰本與金農雙鉤長垣本，但都以怪異為奇古，轉失漢人法度，後者「貌雖似古，意則失

㉕楊守敬跋、趙之謙鉤摹，《劉熊碑》，見於廣州華藝2018春拍。

㉖翁方綱鉤摹，雙鉤《秦碑三種》曾為常熟翁氏收藏，近年捐贈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㉗阮元跋，《西嶽華山廟碑》（華陰本），見《陵苕館續刻金石文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真，故作奇拙，轉成怪異，直是金冬心隸書」。他因此感歎「雙鉤古碑，襲其貌固難，得其意更難。」㉘劉喜海曾藏《西嶽華山廟碑》長垣本，並編纂《金石苑》，有大量雙鉤經驗，他的感歎自非鑿空之論。

再看《沙南侯獲碑》，此碑遠在新疆，拓本極罕，今天可見張德容鉤本（圖50）、㉙何紹基鉤本㉚與吳大澂鉤本，㉛張本點畫光潔，轉折處多有棱角，部分筆畫不封口，此後《二銘草堂金石聚》鉤入此碑，不僅釋文有所差別，如「安邊」改「字伯」，㉜且點畫邊緣屈曲如齒牙，起收多斜向方棱之筆，漫漶處多作誇張的強調；何本點畫不甚曲折，但強化大面積的殘泐，點畫輪廓更見奇崛；吳本於殘泐處往往不鉤，但線條細碎、圓轉、蜿蜒，點畫粗細幾無反差，兩端常不封口（圖51）。吳大澂隸書大多點畫乾淨清晰，然鉤本恰好相反，說明這很可能是他雙鉤古碑的習慣；而何紹基隸書講求漲墨與飛白的反差，連成一片的墨瀋與雙鉤本中大片殘泐痕跡頗有同趣。嗣後吳湖帆重裝《沙南侯獲碑》六行本，以鉤本配拓本，雖據吳大澂鉤本重鉤，但點畫遠較後者光潔與嚴整（圖52）。㉝趙之謙也曾從一位樊姓的雙鉤本鉤出，不過未能傳世，㉞但從《二金蝶堂雙鉤漢碑十種》可見的六種碑刻推想，曲折、細碎、方棱當是他一貫的鉤摹特點。當然，《沙南侯獲碑》這樣殘破模糊的碑刻，也給了雙鉤者更多發揮個性的機會。

碑學不以墨蹟為範本，人們根據碑刻拓本揣摩用筆方法本身就帶有很強的主觀性，不同的學者對於同一件碑刻往往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實踐路

㉘劉喜海，《嘉蔭簃集》，卷上，《漢西嶽華山廟碑重刻本跋》，頁227-229。

㉙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此拓為薩迎阿贈陳介祺，陳轉贈劉喜海，喜海之子轉贈張德容。1871年，張雙鉤後系跋文云：「此本為劉鶩卿同官比部時所貽。第三行紙損缺數字，今以滂憘齋本對校，諦審得二十九字。因鉤橅之以備參考。」可見他的鉤本綜合了薩迎阿與潘祖蔭的拓本。參見秦明，〈故宮藏〈清拓沙南侯獲碑〉陳介祺本考略〉，《書法叢刊》，2016年第2期，頁68-83。

㉚見於北京保利2017年春拍。

㉛吳大澂，雙鉤《漢沙南侯獲刻石》。

㉜參見秦明，〈故宮藏〈清拓沙南侯獲碑〉陳介祺本考略〉，頁68-83。

㉝上海圖書館藏。收入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善本碑帖綜錄》，頁71。

㉞《二金蝶堂雙鉤十種序跋》（魏錫曾抄本），上海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徑。如阮元稱《西嶽華山廟碑》碑額六字，「細玩皆是最軟羊毛筆寫，拖帶成字。」[235] 他從拓本中甚至可以推原書丹所使用的工具，儘管這一結論很難被證明。雙鉤本在乾嘉以後的流行，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主觀色彩。

就隸書創作而言，明末清初的王鐸（1593－1652）、郭宗昌（？－1652）、傅山（1607－1684或1685）、鄭簠、朱彝尊（1629－1709）等最早取法漢碑的書家，雖然風格不盡相同，但都講究筆勢流動，鄭簠甚至認為鋒芒是隸書的靈魂，顏光敏（1640－1686）稱他在曲阜訪碑，「東漢諸碑剜苔剔蘚，鋒鏑畢出」。[236] 鄭簠評論諸漢碑云：

> 筆力瘦勁，利如銛鋒，細若遊絲，在東漢諸刻自成一家，令後之學者難於繼述。[237]
>
> 鋒穎透露，嚴峭逼人，在漢碣中自成一家，故學者鮮能宗之。
> 字體方勁深刻，用筆險，難摹。其纖處若遊絲初嫋，不可蹤跡；其通處如鐵旗方展，雄健驚人。[238]

對於鋒芒、遊絲的觀察與表現，在清初是一種普遍的關於漢碑的知識。郭宗昌《漢曹景完碑跋》也說：「鋒芒銛利不損絲髮，因見漢人不獨攻玉之妙，渾然天成。」[239] 王弘撰也稱贊《華山廟碑》華陰本「風骨秀偉，鋒芒如新」。[240] 十七世紀的書家與學者都將鋒芒作為漢碑精神體現的一個重要標誌。鄭簠隸書因此用筆飛動，跳蕩驚奇，出鋒處頗為銳利（圖53），這在清初被視為古的象

---

[235] 阮元跋，《西嶽華山廟碑》（華陰本），見《陵苕館續刻金石文字》。

[236] 顏光敏跋鄭簠，《漢隸九種冊子》，見李放，《皇清書史》，卷29，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2000），史部第38冊，頁274。

[237] 金瑗，《十百齋書畫錄》，申集著錄《鄭簠臨漢碑冊》，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7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頁705。

[238] 鄭簠，《曹全碑》自跋，見柏巢，〈一件標誌鄭簠書法走向成熟的作品：鄭簠法書真跡六種〉，《書畫藝術》，2004年第4期，頁49。

[239] 郭宗昌，《金石史》，卷上，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第49冊，頁93-95。

[240] 王弘撰，《砥齋集》，卷2，《書郭胤伯藏華岳碑後》，《續修四庫全書》，第1404冊，頁3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但在乾嘉以後卻成為學者攻擊的重要「病症」。㉑

與鄭簠等人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乾嘉以後的隸書越來越弱化速度、節奏與鋒芒，而點畫的起收形狀與邊緣輪廓線的刻畫卻越來越受到重視，並形成了兩種側重點不同的隸書風格範式：翁方綱（圖54）、黃易、梅鏐、鄧石如、桂馥、伊秉綬、錢泳、阮元、趙之謙（圖55）等人重視起收的形狀與輪廓的平整；金農（圖56）、高鳳翰、何紹基（圖57）、翁同龢、俞樾、沈曾植（1850－1922）、李瑞清（1867－1920）等人更重視邊緣線的曲折生澀。雖然具體到不同的書家，仍有各自的特點，但無論如何，他們都不再像清初鄭簠、傅山等人那樣講究筆勢與鋒芒，如黃易隸書在起收之處雖有一定的速度變化，但對於波磔陡峭形象的刻畫相當蓄意，前文所引《臨婁壽碑軸》，與鄭簠的臨作（圖58）大異其趣。筆者當然不會認為這些都是雙鉤本作為範本的結果——它們也可能出於藝術家本人的見解，故雍乾時期的金農曲折生澀，而咸同時期的趙之謙卻光潔有型，但我們仍不難看出其間流變的大勢：清中葉更流行第一種隸書範式，而晚清則更流行第二種隸書範式，這與雙鉤本的發展趨勢正爾相侔，鉤與寫的趣味，形成了雙向的互動與刺激。㉒ 從總體上看，早期的雙鉤本邊緣線更為清晰、連續與光潔，而晚清的雙鉤本邊緣線則更為含糊、細碎與曲折。㉓ 如《望堂金石》中所鉤《天發神讖碑》為楊守敬自藏本，其風格大不同於該書沿襲自翁方綱、錢泳等人的鉤本，極盡曲折斑斕之能事，與陵苕館相對平正收斂的鉤法差異極大（圖59）。從刊刻工藝的角度說，刻畫那些崎嶇的線條，遠比光潔圓潤的線條更為費時費力，其所體現的自是主事者的主觀意圖。

前文對於書寫技術的分析雖然僅集中於隸書，但也代表了乾嘉以後碑學書法的基本走向，書家對於刻畫形態——而不是展現節奏——更有興趣。乃至康

㉑ 參見薛龍春，《鄭簠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7），第七章，〈從對鄭簠評價的歧異看清代碑學觀念之演進〉，頁168-186。

㉒ 羊毫與生宣在晚清的普及使用則強化了這種風格的趨向。

㉓ 隨著碑學理念的深入人心，剝蝕感成為金石氣的重要表徵，因此在書寫技術上，需要一種頓挫曲折（遲而澀的用筆手段）與之相匹配。清光緒、宣統間，人們臨習《蘭亭序》甚至也要求用北碑法，參見曹建，《晚清碑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59-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為徑稱：「蓋書，形學也。」[244] 康氏將形、勢混為一談，形學實與勢學相對待，前者靜後者動，前者厚重後者流動，這種審美趣味與技法表現的轉捩點，恰恰發生在乾嘉之際，雙鉤古碑興盛於此一時期，並非偶然。

從更長的時段來觀察，六朝到唐代是中國書法經典逐步確立的時代，但直到北宋刻帖出現，通過類似於印刷的椎拓技術，經典法書才得以化身千萬，成為人們主要的書學資源。不過從墨蹟到拓本，用筆的順序、速度與節奏大半已經落空，雖說點畫微妙的粗細變化與少量的飛白仍能讓人從中揣摩出書寫的動作與速度，但除非有機會多見前代名家墨蹟，學者對於視覺的控制——而不是手感的依賴——在逐漸增強，正因為如此，黃庭堅（1045－1105）、米芾等人要求學書必須看真跡，並且告誡人們石刻不可學。從墨蹟到法帖，生動的用筆過程與墨色變化被抽取了，「姿態」逐漸成為一個新的開掘方向，至晚明時期，篇章——而不是用筆——越來越成為書家經營的重心。[245]

由於廣泛的社會需求，私家刻帖蠭起於明代的江南，任何一種前代的法帖都被輾轉翻刻，蘇州甚至成為一個偽造法帖的中心。[246] 一方面人們更容易獲得帖學的範本，但另一方面對法帖也越來越不信任。伴隨著金石學在明末清初的振起，古碑成為一種可替代的新的書學資源，漢碑以及周秦碑刻、北朝碑刻緩解了人們對於學書範本的焦慮。乾嘉以後金石成為時尚，大量碑刻被發現、椎拓、收藏，碑學觀念由此茁壯並迅速深入人心。

但與此不相匹配的是，由於椎拓的困難與相對高昂的人工成本，一件具體的拓本雖然會在金石圈中流通，但數量畢竟有限，很快會被巨大的社會需求所稀釋，尤其是那些知名度高卻原石亡佚、只有少量拓本與雙鉤本傳世的漢碑，如《西嶽華山廟碑》、《夏承碑》、《趙圉令碑》、《婁壽碑》、《劉熊碑》等。遠在西北的《裴岑紀功碑》、《沙南侯獲碑》椎拓不易，情形也大致相仿。即使是一流的金石學者與書家，有時也不得不借助於雙鉤本進行研究與臨

[244]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綴法第二十一」，頁845。

[245] 參見薛龍春，〈從韻味到姿態——《閣帖》傳播與書法語境的轉換〉，《中國書畫》，2004年第4期，頁77-81。

[246] 范大澈，《碑帖紀證》，收《甲秀堂帖》云：「近日吳中集諸帖刻之以欺人，亦名《甲秀堂帖》，去舊本一無所同，射利如此，好事亦售，皆可發笑。」頁5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摹，遑論普通的學書者。在照相術傳入以前，古碑的雙鉤本——尤其是經過刊印進入尋常之家的雙鉤印本——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碑學取徑的真正範本。

當雙鉤本成為範本，雖然前文談到的楊沂孫、俞樾等人都聲稱從中能窺見「用筆」，但面對雙鉤輪廓，人們很難真正獲得對於用筆、節奏的體認，雙鉤的輪廓，也就是「形」的刻畫必然成為重要的議題。李瑞清所得意的無黍米不轉的筆法，只不過以毛筆劃出了一道道殘破而機械的邊緣線，這種訴諸形態而非筆勢的書法趨向，在晚清時期形成了席捲之勢。隨著二十世紀大量戰國漢晉三國簡牘、六朝寫經出土以後，人們才恍然發現，乾嘉以來被不斷總結的碑學用筆，如包世臣所揭櫫的「始艮終乾」，與唐以前的生動的篆、隸、楷書墨蹟無法對應，中鋒、藏鋒、中實、厚重等重要技術與美學指標，根本就是南轅北轍。[247]

結語

晚清民國之際，攝影與石印、珂羅版、銅版等新技術傳入中國，在一些大都市，古碑拓本的印刷品層出不窮。1876年，點石齋書局率先使用新技術影印碑帖。相比起木板雙鉤本，照相製版這一全新的技術立即受到金石學者的廣泛歡迎，孟慶雲（活動於清同光間）題《西嶽華山廟碑，寶漢齋本》云：「余初見雙鉤本，後得洋照本，又得洋人石印本。……寶漢齋摹刻遠不及洋照。」[248] 1886年三月十六日，吳大澂在給徐熙（字翰卿）的信中興奮地寫道：

> 前由念劬［即錢恂，1853－1927］處寄來《散氏盤》石印本，竟與原拓無異，墨色稍淡，字口絲毫不爽。……此等石印本，竟可亂真也。……（《窓齋集古錄》）夏秋之間可付石印，為三代古文傳燈之法，亦金文一鉅觀也。[249]

---

[247] 儘管在鍾繇的時代就有三體的說法，但我們無法將銘石體與手寫體完全對立，銘石體只是手寫體一定程度的規整化與美術化。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 王僧虔錄》，張彥遠輯，《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卷1，頁12-13。

[248] 孟慶雲，《紅藕齋漢碑匯鈔集跋》（清稿本）。

[249] 吳大澂，《吳大澂手札》（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2007），頁45-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吳大澂見到石印的《散氏盤》之後，認為可以亂真，為此他決定將《憙齋集古錄》也付之石印。誠如吳縣沈維鈞《寰宇貞石圖目錄弁言》所云：「然自吳清卿之《憙齋集古錄》出，楊星吾［即楊守敬］之《寰宇貞石圖》成，以原拓原文照相影印，生面別開，後來居上矣。」[250]（圖60）在此風氣之下，鄒安輯錄的《古石抱守錄》（1918）、周進輯錄的《居貞草堂漢晉石影》（1929）、金毓黻輯錄的《遼陵石刻集錄》（1934）等陸續以影印的方式出版，民國時期的期刊《神州國光集》亦縮印了相當數量的碑刻與字畫。[251]

作為臨池範本，影印本自有不可比擬的優勢。葉昌熾認為「近時歐洲電光攝影之法，可大可小，雖剝泐皴染筆墨所不到之處，亦無不傳神阿堵。此為古人續命第一妙方。垂燼之燈，火傳不絕，真翰墨林中無量功德也。」[252] 歐陽輔《集古求真》緒言談及傳摹碑帖時也說，「惟西法石印及玻璃版，無論大小模糊，撫勒所不能到者，莫不纖毫畢現，為古墨續命，洵為下真一等。在收藏家自以淂原石舊拓為貴，若學書者有此攝影傳神之本，亦足為臨池之助。」[253]「續命」之說，反映出學者們將新興的攝影、石印與珂羅版技術視為古碑存亡的救命稻草。不過，柯昌泗（1899－1952）認為雙鉤仍有其獨特的價值：

> 石印、玻璃、金屬版諸印刷法未出之時，雙鉤刻本號為極工。黃小松《小蓬萊閣》、徐紫珊《隨軒金石文字》所刻，以存佚為主。張松坪［即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趙撝叔［即趙之謙］《二金蝶堂漢晉石影》，楊鄰蘇［即楊守敬］《望堂金石文字》，則泛及新出之品。何鏡山［即何澂]《思古齋漢碑額》專收漢碑篆額，而桂未谷、張容園［即張寶德］之於《婁壽碑》，巴雋堂、葉東卿之於《劉熊碑》，張容園之於《戚伯著碑》，皆名家精心鉤摹之本，不可多得，當與舊拓同珍也。曩者羅師踵撝

[250] 楊守敬，《寰宇貞石圖目錄》（民國二十一年蘇州圖書館鉛印本），頁1。

[251] 參見徐無聞，〈《寰宇貞石圖》淺說〉，見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9冊，頁17。

[252] 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 語石異同評》，卷10，《右縮臨本一則 附攝影本石印本》，頁550。

[253] 歐陽輔，《集古求真》（民國十二年江西開智書局石印本），卷首上，《緒言》，頁5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叔之例，雙鉤《漢晉石刻墨影》，其後傳錄《熹平石經》亦用雙鉤，良以殘石片碣紙墨模糊，點畫缺泐，鉤本轉勝於影印矣。[254]

在柯昌泗看來，雙鉤本經歷了兩個不同的階段，嘉道間主要是為了保存佚失之碑，但咸同以後也擴大到新出的碑刻。即使有了影印技術，但因為碑拓模糊，雙鉤有時更加清晰，反而比影印更有價值。[255] 光緒八年（1882）楊守敬在日本石印他搜集的歷代拓片成《寰宇貞石圖》一書，收周秦以下300餘碑，蔚為大觀，此書宣統元年（1912）上海重印，但他同時並未停止《望堂金石二集》的刊印。

雙鉤古碑真正絕跡要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在印刷物貧瘠、而複印技術並尚未普及時，雙鉤仍然是學書者集聚學習資源的重要方式。但無論如何，雙鉤本作為範本的空間已經漸形逼仄。

時至今日，我們可以輕易獲得善本碑帖的印刷物，打開電腦，在搜尋引擎中鍵入關鍵字，品質不錯的電子圖片也隨時可以獲取。但我們不能因此迴避這樣一段歷史：在清代三百年的碑學大潮之中，人們據以臨摹的常常只是古碑的雙鉤本，或是雙鉤印本，即使是一些名家也不能例外。黃士瀚曾向楊守敬借舊拓《泰山刻石》原本雙鉤刻木，他認為，「古碑翻刻惟雙鉤為善」，[256] 這一意見代表了晚清學者對於古碑複製的基本態度。但嚴格意義上說，雙鉤古碑與翻刻法帖相比，並沒有任何優越性可言。在雙鉤本進入範本系統以後，其區別於拓本（包括原拓、翻刻）的視覺屬性，也不知不覺左右了清代碑學的趣尚與書寫技巧。

在我們的觀念中，清代碑學的合法性在於它擯棄不斷翻刻的刻帖，而直接向視同真跡的古碑拓本學習，而本文的研究卻打破了這些一廂情願的想像。從墨蹟到刻帖，再到翻刻的刻帖，從碑拓到翻刻碑拓，到雙鉤本，到雙鉤本的雙

---

[254] 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 語石異同評》，卷10，《右雙鉤本一則 附木本、廓填本》，頁549。

[255] 事實上，鉤摹本也通過石印出版傳播，如《翁覃溪手鉤化度寺碑》，上海有正書局1918年曾影印發行。

[256] 楊守敬，《望堂金石》，所收《泰山刻石》，黃士瀚跋，頁27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鉤本，到雙鉤印本，書學的資源似乎經歷了一次相似的輪回。但這些問題卻被晚清碑學學者刻意遮蔽了。時至今日，碑刻之於刻帖的優越性仍未引起學者們的懷疑，重構這段渲淡的歷史，其意義自不容小覷。

同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除了雙鉤本及其刻印本，一些縮臨本、臨摹本的出版物在晚清也備受歡迎，[257] 如錢泳為課子而作的《攀雲閣臨漢碑》甚至以《漢碑大觀》八集的名目出版（圖61），[258] 張祖翼（1849－1917）《漢碑範》八卷則以成品的方式展示他的漢碑臨摹與集字，以作為初學者的範本。[259] 事實上，當人們接受錢泳、張祖翼等人臨摹漢碑的刻帖作為範本時，這些刻帖對於碑學合法性的衝擊並不亞於將雙鉤本作為範本。葉昌熾曾經批評說：「金匱錢梅溪有漢碑縮臨本，頗為世重，字小如豆，鬚眉畢見。然梅溪隸法從唐碑出，豐贍有餘，遒古不足，與《石門》、《夏承》諸碑尤鑿枘，仍是我行我法耳。」[260] 所謂「我行我法」，正揭櫫了這些範本與「漢法」的扞格不入。不過，一般讀者和臨池者並沒有能力分辨錢泳臨摹的漢碑與真正的漢碑之間的差別，他們以此為範本的臨摹活動，也匯入了晚清的碑學大潮之中。

當康有為宣稱「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時，[261] 他們談論的是何種形態的「北碑」，寫的又是何種形態的「魏體」？毫無疑問，精英階層必定有機會接觸拓片而不僅取法雙鉤印本，只不過大多數楊守敬筆下的「寒士」取徑碑學卻不得不仰仗於茲。按康有為給窮鄉學子開出的二百餘種須購碑單，「精以求之，得百碑亦可成書，然言百碑，其約至矣，不能更少

---

[257] 早期的金石學著作如洪适《隸續》卷5、卷6為《碑圖》上下，收《樊敏碑》、《孔彪碑》、《趙圉令碑》、《夏承碑》、《婁壽碑》等碑形圖並額，《沈君神道闕》、《王稚子闕》圖並題字，《武梁祠》畫像石圖及題字，都是縮小臨寫。《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0冊，頁7111、7115-7117、7122-7123、7125-7131。

[258] 錢泳，《漢碑大觀》（民國間碧梧山莊印，求古齋發行），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8冊。錢泳的臨摹並非都依據拓本，許多都臨自雙鉤本。

[259] 例言第一條云：「此集為初學漢隸者示以徑塗，非敢出而問世，博雅君子幸毋譏焉。」第二條云：「漢碑種類甚多，拓本精者收藏不易，此集所采雖未大備，然大半皆鑒藏家必有之物，亦可見漢石之一斑矣。」見張祖翼，《漢碑范》（清宣統三年上海文明書局石印）卷首。

[260] 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 語石異同評》，卷10，《右縮臨本一則》，頁550。

[261]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尊碑第二」，頁7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矣。」[262] 這對於一般的學書者而言幾乎是不可能之事。本文借助大量文獻重構這段歷史，其目的自然不僅是質疑清代碑學的實際運作，還在於借助這段歷史的發覆來理解清代碑學何以發展為「形學」，如果說講求手感的晉唐經典書法是一種「意學」、「勢學」，則「形學」完全走到了反面，儘管它對於書史的意義並非完全消極。

經過清代碑學的洗禮，人們至今很難在帖學與碑學之間建立起真正的邏輯關係。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說法：帖學與碑學是不同的書學取徑，他們有不同的審美、技法與工具系統，但我們很少思考的是，同樣在談論書法，碑學與帖學為什麼完全不是一回事？碑學與帖學之間的鴻溝也帶來了書法品評的巨大隔閡，我們再也難以以一套遊戲規則來要求所有的書寫者，「人各有法」一次次成為所有矛盾的遁詞。

（責任編輯：陳卉秀）

[262]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購碑第三」，頁757、7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所見乾嘉以來雙鉤古碑刊印本

序號	名稱	鉤摹者	刊印時間	所收碑刻	收藏與影印
1	劉熊碑	巴慰祖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張塤刻本	劉熊碑	中國國家圖書館
2	翁覃溪手鉤宋拓化度寺碑	翁方綱	清乾隆五十年（1785）雙鉤，民國十年（1921）上海有正書局影印	化度寺碑	孔夫子舊書網
3	婁壽碑	錢泳	清乾隆六十年（1795）桂馥刊本	婁壽碑	中國國家圖書館
4	蘇齋雙鉤劉熊碑一卷	翁方綱		劉熊碑	上海圖書館
5	廟堂碑唐本存字	翁方綱	清嘉慶十二年（1807）蘇齋刻本	孔子廟堂碑	中國國家圖書館
6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黃易	清嘉慶五年（1800）刊本；道光十四年（1834）石墨軒翻刻本、道光二十二年（1842、1843）陵苕館重摹本	石經殘字、魏元丕碑、朱龜碑、成陽靈臺碑、譙敏碑、王稚子闕、范式碑（新出殘石附）、武梁祠像唐拓本（新出《武梁祠像》附）、趙圉令碑、祀三公山碑	天津圖書館
7	趙圉令碑	陳璜	清道光六年（1826）刻本	趙圉令碑	中國國家圖書館
8	隸篇	翟云升	清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	漢碑選字	中國國家圖書館
9	隨軒金石文字四冊九種	徐渭仁	清道光十七年（1837）寒木春華館刊本	石鼓文、雁足燈、四楊碑（楊統、楊著、楊馥、楊震）、趙圉令碑、樊敏碑、大業塔盤題字	中國國家圖書館
10	平安館金石文字七種	葉志詵	清道光十九年（1839）葉氏平安館印刻本	秦篆殘字、婁壽碑、劉熊碑、日本國殘碑、仿鑄漢建初銅尺	南京圖書館
11	陵苕館雙鉤古刻五種	高學治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	夏承碑、婁壽碑、劉熊碑、西嶽華山殘碑、吳紀功碑	中國國家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序號	名稱	鉤摹者	刊印時間	所收碑刻	收藏與影印
12	金石苑	劉喜海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	三巴漢石紀存九冊（王稚子、沈府君、馮君等巴蜀漢闕）、海東金石苑八卷（朝鮮金石）等	中國國家圖書館
13	蟫蘇閣雙鉤宋本夏承碑	不詳	清道光間影刻本	夏承碑	中山大學圖書館
14	古均閣寶刻錄	許槤	清咸豐八年（1858）古均閣刊本	夏承碑（應為未完成之書）	中國國家圖書館
15	鐵硯齋雙鉤石刻文字一冊	張寶德	清咸豐抄本	秦泰山廿九字殘石、戚伯著碑、司徒殘碑、婁壽碑、吳葛君碑	孔夫子舊書網
16	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	吳雲	清咸豐六年（1856）	開皇本蘭亭、聽松篆書及題記、鍾紹京書維摩經殘石	中國國家圖書館
17	二百蘭亭齋鐘鼎款識	吳雲	清稿本	金文雙鉤、摹寫	中國國家圖書館
18	二百蘭亭齋金石文字七種	吳雲	清同治二年至光緒九年（1863－1883）	號季子白盤、聽松題字、東海廟碑殘字、漢建安弩機、西嶽華山廟碑長垣本、宋拓化度寺碑、宋搨溫虞公碑	南京圖書館
19	天一閣宋拓劉熊碑雙鉤本	趙之謙	清同治三年（1864）雙鉤，民國十年（1921）上海中華書局影印	劉熊碑	北京大學圖書館
20	梅花草庵雙鉤碑刻五冊	丁彥臣	清同治七年（1872）湖州丁氏梅花草庵刊本	《篆存》三冊，包括：石鼓文、吉日癸巳、泰山刻石、群臣上壽刻石、祀三公山碑、北海相景君銘額、孔君碑額、鄭固碑額、孔宙碑額、孔宙碑陰額、孔彪碑額、韓仁銘額、尹宙碑額、魏元丕碑額、白石神君碑額、朱君碑額、鄭季宣碑額、張遷碑額、譙君碑額、樊敏碑額、唐公房碑額、上	中國國家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序號	名稱	鉤摹者	刊印時間	所收碑刻	收藏與影印
				尊號碑額、受禪碑額、孔羡碑額、范式碑額、天發神讖碑、郛休碑額、紀國陸妃碑額、李思訓碑額、怡亭銘額、高力士碑額、段行琛碑額、徐浩碑額；《漢碑鉤本》一冊，包括：元狩紀功刻石、五鳳二年刻石、魯共王墓前石人題字、鷹君碑、延光殘碑、四皓神坐題字、司徒殘碑、漢少室闕、裴岑紀功碑。第五冊未見，或即《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影印丁氏所鉤《西嶽華山廟碑》。	
21	二銘草堂金石聚十六卷	張德容	清同治十年、十一年（1871－1872）衢州張氏二銘草堂刻本	張仲□、石鼓文、趙上壽刻石、琅琊臺刻石、泰山刻石、鳳凰刻石、魯孝王刻石、朱博殘石、上谷府卿墳壇刻石、祝其卿墳壇刻石、萊子侯刻石（以上卷一）；三老忌日碑、開通褒斜道刻石、跳山買地刻石、三公山神碑（以上卷二）；南武陽昌聖卿闕、祀三公山碑、嵩山太室石闕銘、太室石闕後銘、嵩山少室石闕銘、少室東闕題名、開母廟石闕銘、是吾碑、右扶風丞李寓碑、孝堂山畫像、永建食堂刻石（以上卷三）；裴岑德祠碑、沙南侯獲碑、會仙友題字、北海相景君碑、文叔陽食堂刻石、武斑碑、武氏石闕銘、武榮碑、武梁祠堂畫像、武氏石室畫像、武氏祥瑞圖	國家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序號	名稱	鉤摹者	刊印時間	所收碑刻	收藏與影印
				畫像、孔子見老子畫像、何□趙武畫像、洪福院畫像、兩城山畫像（以上卷四）；石門頌、乙瑛碑、魯相謁孔廟殘碑、李孟初神祠碑、孔謙碣、孔君墓碑（以上卷五）；禮器碑、鄭固碑、倉頡廟碑、封龍山頌碑（以上卷六）；孔宙碑、張壽碑、衡方碑、史晨碑（以上卷七）；史晨後碑、惠安西表（西狹頌）、五瑞圖、孔彪碑、郙閣頌、（以上卷八）；楊淮表記、魯峻碑、熹平殘石、耿勳表、堂溪典嵩山請雨銘、韓仁銘、尹宙碑（以上卷九）；三公山碑、校官碑、白石神君碑、孔褒碑、鄭季宣碑、曹全碑（以上卷十）；張君表頌、吹角壩古摩崖、樊敏碑、高頤碑、高頤闕（以上卷十一）；唐君房碑、劉曜碑、少室之胄碑（竹葉碑）、華嶽廟殘碑陰、子游殘碑、劉君殘碑、正直殘碑、元孫殘碑、石牆村刻石、朱君長、楊君之銘、比干墓題字、魯王墓前石人題字、王稚子闕、沈君闕、李業闕、馮煥闕、楊宗闕、沈府君二闕、上庸長闕（以上卷十二）；上尊號碑、受禪表、魯孔子廟碑、邰陽殘碑三石、膠東令王君廟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序號	名稱	鉤摹者	刊印時間	所收碑刻	收藏與影印
				碑、曹真碑、范式碑、王基碑、李苞閣道題字（以上卷十三）；谷朗碑、天發神讖碑、禪國山碑、葛祚碑額、禹陵窆石題字（以上卷十四）；郭休碑、潘宗伯韓仲元閣道題字、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太公呂望表、爨寶子碑、枳楊府君神道、劉韜墓誌、堵陽韓府君神道、南明山葛洪題字、侍中楊公闕、中書賈公闕、廣武將軍□產碑、遼東太守呂憲墓表（以上卷十五）；爨龍顏碑、謝靈運石門新營詩、石佛妙相寺造像題字、句容石井床題字、太祖文皇帝神道、蕭秀碑額、始興忠武王蕭憺碑、蕭景神道、蕭宏神道、蕭績神道、蕭正立神道、顧廷謙造像、陳寶齊造像、瘞鶴銘（以上卷十六）	
22	攀古廔漢石紀存	吳大澂	清同治十二年（1873）吳縣潘祖蔭滂喜齋刻本	沙南侯獲刻石	中國國家圖書館
23	石門銘		清同治三十二年（1869）東都書學會石印	石門銘	孔夫子舊書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序號	名稱	鉤摹者	刊印時間	所收碑刻	收藏與影印
24	望堂金石文字十六冊	楊守敬	清光緒三年（1877）宜都楊氏激素飛清閣刊本	石鼓文、壇山刻石、泰山刻石、官擊文（未刻）、沙南候碑（未刻）、西嶽華山廟碑、夏承碑、王純碑、張表碑、陳德殘碑、婁壽碑、石經殘字、東海廟殘碑（未刻）、劉熊碑、司徒殘碑、戚伯著碑、破張郃銘、羅鳳墓石、李君石闕、四老神座題字、洛陽長史殘石（以上四種未刻）、中牟魯君闕、人君頌、天發神讖碑、廣平侯闕、司農公碑額、曹震碑、定武蘭亭、王獻之恒山銘（未刻）、舊館壇碑、蕭敷墓誌、敬妃王氏墓誌（以上二種未刻）、新羅真興王定界碑、梁鑒碑（未刻）、崔敬邕墓誌、高植墓誌、張玄墓誌、東魏關勝誦德碑、高昌侯裴鴻碑（以上四種未刻）、啟法寺碑、常醜奴墓誌（未刻）、姚辯墓誌、孔子廟堂碑、皇甫誕碑（未刻）、化度寺碑、九成宮醴泉銘、虞恭公碑、裴鏡民碑（未刻）、孟法師碑、王居士磚塔銘、日本題名殘碑、雲麾將軍李秀碑、郎官石記序、慧山寺石床題字、麻姑仙壇記	《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4冊
25	思古齋雙鉤漢碑篆額三冊	何澂	清光緒九年（1883）山陰何澂刻本	漢碑篆額32種、曹魏篆額4種	國家圖書館
26	魏崔敬邕誌雙鉤本	任道鎔	清光緒十四年（1888）任道鎔刻本	崔敬邕墓誌	北京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序號	名稱	鉤摹者	刊印時間	所收碑刻	收藏與影印
27	古歡閣雙鉤秦漢石刻一冊	石宗建	清光緒十五年（1889）刻本	泰山石刻殘字、裴岑紀功碑、潘宗伯韓仲元石門題字、漢司馬孟臺神道碑	上海圖書館
28	山可樓雙鉤古刻十六卷	舒立濬	不詳	不詳	李壽蓉《天影盦全集》文存下《山可樓雙鉤古刻跋》，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99冊
29	雙鉤殘宋拓瘞鶴銘	江標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刻本	瘞鶴銘	上海圖書館
30	奇觚室樂石文述四十卷	劉心源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嘉魚劉氏刻本	岣嶁禹碑、紅崖刻石、石鼓文、繹山刻石、琅琊刻石、碣石頌、會稽刻石、少室石闕銘、天發神讖碑、城隍廟碑、三墳記、謙卦傳、太白酒樓記（附駟馬橋記）	南京圖書館
31	荊南石刻三種雙鉤本	劉瀚	清光緒三十年(1904）海天旭日硯齋刻本		吉林大學圖書館
32	望堂金石二集	楊守敬	清宣統二年（1910）宜都楊氏激素飛清閣刊本	禮器碑、東海廟碑、廣武將軍碑、鄭文公碑、崔敬邕墓誌、啟法寺碑、姚恭公墓志、孟法師碑、王洪範碑、道因法師碑、懷仁集聖教序、雲麾將軍李秀碑、法華寺碑、李思訓碑、日本古刻佛足跡碑、日本道澄寺鐘銘、日本古刻銅燈檠銘、新羅真鑒禪師碑	《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4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序號	名稱	鉤摹者	刊印時間	所收碑刻	收藏與影印
33	大字石刻	楊守敬	清刻本	高句麗好太王碑、滎陽鄭氏碑、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匡喆刻經頌	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9、10冊。
34	儷古閣雙鉤金石文字	余弼	清刻本	泰山刻石、裴岑紀功碑、夏承碑、盤銘、漢司馬孟臺神道碑、曹魏李苞通閣道題名	南京大學圖書館
35	熹平石經殘字雙鉤本	莫友芝	清刻本	熹平石經殘字	北京大學圖書館
36	漢晉石刻墨影一卷十四種	羅振玉	民國四年（1915）上虞羅氏景印雪古叢編本	漢孟琁殘碑、子游殘碑、延年石室題字、琅琊相殘墓表、嵩岳廟石人頂馬字、石獅題字、故吏殘石、貸用殘石、爵千殘石、魏九都紀功刻石、皇女殘石、五官掾殘字、張盛墓表、馬槽題字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37	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補遺一卷	羅振玉	民國十九年（1930）石印本	熹平石經殘字	南開大學圖書館
38	雙鉤唐李陽冰書滑臺新驛記		民國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本	滑臺新驛記	上海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清）□穎
《梅溪先生年譜》，清金匱錢氏述祖德堂稿本，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第122冊。
（清）丁彥臣
《梅花草庵雙鉤碑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雙鉤華山廟碑》，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8冊。
《西嶽華山廟碑》，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8冊。
（清）王弘撰
《砥齋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404冊。
（清）王昶
《金石萃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1冊。
（清）王筠
《清詒堂文集》，民國抄本，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45冊。
（清）王澍
《竹雲題跋》，清海山仙館叢書本。
（清）王懿榮
《致王瓘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致陳介祺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方朔
《枕經堂金石題跋》，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19冊。
（清）巴慰祖
雙鉤《劉熊碑》，清乾隆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包世臣
《藝舟雙楫》，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
（清）石宗建
《古歡閣雙鉤秦漢石刻一冊》，清光緒十五年刻本，上海圖書館藏。
（清）朱一新
《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阮元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清嘉慶道光間儀徵阮氏刊文選樓叢書本。
補鉤《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揅經室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77冊。
（清）阮元、孫星衍
《二家書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李文田舊藏
《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清）李放
《皇清書史》，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史部第38冊，上海：上海書店，2000。
（清）李瑞清
《清道人遺集攟遺》，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791冊。
（清）李壽蓉
《天影盦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99冊。
（清）吳大澂
雙鉤《漢沙南侯獲刻石》，清同治十二年潘氏滂喜齋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恒軒所見所藏吉金》，清光緒十一年自刻本。
《吳愙齋尺牘》，民國十七年長沙商務印書館景印本。
《吳大澂手札》，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2007。
（清）吳式芬輯
《吳式芬藏名人書札》，清稿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清）吳清鵬
《笏庵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53冊。
（清）吳雲
《二百蘭亭齋鐘鼎款識》，清稿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雙鉤《漢東海廟碑殘字》，清同治九年（1870）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吳湖帆
雙鉤《沙南侯獲碑》（以吳大澂鉤本為底本），上海圖書館藏。
（清）何紹基
《東洲草堂文鈔》，清光緒宣統間刻本。
《臨唐翊華雙鉤西嶽華山廟碑冊》，湖南省博物館藏。
臨《張遷碑》，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東洲草堂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04冊。
《何紹基手寫日記》，臺北：世界書局，2012。
雙鉤《沙南侯獲碑》立軸，北京保利2017年春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何紹基著，龍震球、何叔置校點
《何紹基詩文集》，長沙：嶽麓書社，2008。
（清）何澂
《思古齋雙鉤漢碑篆額》，清光緒九年刊本。
（清）佚名
雙鉤《巴慰祖漢碑冊》，安徽省博物館藏。
（清）汪鋆
《補瘞鶴銘考》，清光緒九年刻本。
（清）宋葆淳
《致羅聘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明）范大澈
《碑帖紀證》，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第34冊。
（清）金瑗
《十百齋書畫錄》，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7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
（清）金農
《冬心先生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63冊。
《臨華山廟碑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漆書《西嶽華山廟碑》，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周中孚
《鄭盦讀書記》，民國吳興劉氏嘉業堂叢書本。
（清）周亮工
《賴古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清）俞樾
《春在堂雜文四編》，卷5，《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85冊。
（清）孟慶雲
《紅藕齋漢碑匯鈔集跋》，清稿本。
（明）都穆
《金薤琳琅》，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10冊。
（清）桂馥
《未谷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458冊。
（清）畢沅
《中州金石記》，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18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康有為
《廣藝舟雙楫》，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
（清）奚岡
《致黃易札》，收入《奚鐵生手札不分卷》，民國間影印。
（清）翁方綱
《致陸恭札》，上海圖書館藏。
《致黃易札》，上海楓江書屋藏。
《致錢泳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琅邪臺殘石》，翁萬戈舊藏。
《雙鉤唐搨廟堂碑字 蘇齋刻本》，清嘉慶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蘇齋題跋》，清抄本。
《蘇齋雙鉤劉熊碑》，清刻本，上海圖書館藏。
《翁覃溪手鉤宋拓化度寺碑》，上海：有正書局，民國十五年。
《復初齋文集》，稿本，收入《清代稿本百種彙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第67冊。
《兩漢金石記》，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10冊。
《復初齋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381冊。
《復初齋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382冊。
《復初齋集外詩》，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382冊。
《復初齋集外文》，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382冊。
（清）翁方綱鉤摹
《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立軸，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雙鉤《秦碑三種》，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清）翁方綱補摹
《夏承碑》題跋，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清）翁方綱著、沈津輯
《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清）翁同龢
《覃溪翁摹秦篆 泰山、琅邪、之罘，坿漢華山碑圖，族孫同龢藏》，翁萬戈先生藏。
（清）徐渭仁
雙鉤《趙圉令碑》，《隨軒金石文字》，寒木春華館刊本，1837，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翁廣平
《聽鶯居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66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凌霞
《天隱堂文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729冊。
（清）高學治
《陵苕館續刻金石文字》，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明）郭宗昌
《金石史》，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第49冊。
（清）宮爾鐸
《思無邪齋文存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741冊。
（清）陸耀
《切問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352冊。
（清）陸繼煇
《八瓊室金石補正續編》，清稿本。
（清）陳介祺
《簠齋尺牘》，民國上海商務印書館印本。
（清）許槤
《古均閣寶刻錄一冊》，清咸豐八年古均閣刻本。
（清）梁啟超
《飲冰室文集》，民國十五年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
（清）屠倬
《是程堂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35冊。
（清）張弨
《瘞鶴銘辯》，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史部第278冊。
（唐）張彥遠編、范祥雍點校
《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
（清）張祖翼
《漢碑范》，清宣統三年上海文明書局石印。
（清）張德容
《二銘草堂金石聚》，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3冊。
（清）張鑑
《冬青館集乙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90冊。
（宋）黃伯思
《東觀餘論》，明毛氏汲古閣刊本。
（清）黃易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第1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致趙魏札》，上海圖書館藏。
《致趙魏札》，張廷濟錄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致顧文鉷札》，上海圖書館藏。
《臨婁壽碑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黃易舊藏
《裴岑紀功碑》，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聽松拓本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黃易輯
《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黃小松友朋書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葉昌熾撰、柯昌泗評
《語石 語石異同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
（清）楊以增
《退思廬文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56冊。
（清）楊守敬
《望堂金石》，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4冊。
《望堂金石二集》，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4冊。
《鄰蘇老人手書題跋》，民國五年宜都楊守敬觀海堂景印本。
《激素飛清閣評碑記》，日本刊本。
《寰宇貞石圖》，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寰宇貞石圖目錄》，民國二十一年蘇州圖書館鉛印本。
（清）楊守敬跋、趙之謙鉤摹
《劉熊碑》，見於廣州華藝2018春拍。
（清）楊沂孫
《觀濠居士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53冊。
（清）楊翰
《息柯白箋》，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50冊。
《息柯雜箸》，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50冊。
《裒遺草堂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50冊。
《會合詩續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50冊。
（清）楊澥
雙鉤《瘞鶴銘殘字》，《中國書法》，2013年第9期。
（清）楊鐸
《秦泰山刻石》，於清同治九年（1870）梓行，南京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函青閣金石記》，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6冊。

（清）褚峻

《金石圖說》，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2冊。

（清）趙之謙

《二金蝶堂尺牘》，清光緒三十一年嚴氏小長蘆館石印本。

《二金蝶堂雙鉤十種序跋》，魏錫曾抄本，上海圖書館藏。

《二金蝶堂雙鉤漢碑十種》，日本《書筵》雜誌，第7、8卷及新第1卷（1943-1944）連載。

《天一閣宋拓劉熊碑雙鉤本》，華藝國際拍賣公司2018年春拍。

臨《祀三公山碑》，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雙鉤《西嶽華山廟碑》及所參照舊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清）趙懷玉

《亦有生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19冊。

（清）裴景福等藏

《明清名人尺牘墨寶》，上海：文明書局，1922。

（清）齊學裘

《見聞續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181冊。

（清）翟云升

《隸篇》，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清）鄭簠

《臨婁壽碑軸》，見北京保利2014年秋拍。

隸書《朱熹詩軸》，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宋）歐陽脩

《集古錄跋尾》，收入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編，《歷代碑誌叢書》，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清）歐陽輔

《集古求真》，民國十二年江西開智書局石印本。

（清）樂炳元

雙鉤《郭有道碑》及吳大澂跋，清稿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清）劉喜海

《三巴舂古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9冊。

《海東金石苑》，嘉業堂刊本，《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23冊。

《海東金石苑》，二銘草堂刊本，《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15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蒼玉洞題名》，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第2冊。

《嘉蔭簃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80冊。

（清）錢泳

《漢碑大觀》，民國間碧梧山莊印，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8冊。

《寫經樓金石目》，清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履園叢話》，收入《筆記小說大觀》，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第25冊。

（清）錢泰吉

《甘泉鄉人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72冊。

（清）鮑源深

《補竹軒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50冊。

（清）戴肇辰修、史澄纂

《（光緒）廣州府志》，清光緒五年刊本。

（清）魏錫曾

《績語堂題跋》，清光緒九年刊魏稼孫全集本。

（清）繆荃孫

《藝風堂文漫存・乙丁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756冊。

（清）邊浴禮

《修健堂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59冊。

（清）嚴可均

《鐵橋漫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70冊。

雙鉤《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湖州博物館藏。

（清）羅振玉

《漢晉石刻墨影》，民國四年上虞羅氏景印碧古叢編本。

（清）顧燮光編

《漢劉熊碑攷》，民國二十三年會稽顧氏金佳石好樓石印非儒非俠齋金石叢著本。

（清）顧藹吉

《隸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17冊。

近人論著

上海圖書館編

2017　《上海圖書館善本碑帖綜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Shanghai Library ed.

2017　*Shanghai tushuguan shanben beitie zong lu*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f Rare Book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d Rubb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

2012 《中國傳拓技藝圖典》，北京：故宮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ed.

2012 *Zhongguo chuan ta jiyi tu dian* (Illustrated Handbook of Chinese Techniques of Rubbing Making), Beijing: Palace Museum Press.

李寧

2019 〈摹搨考〉，《中國書法》，7期，頁181。

Li, Ning

2019 "Mo ta kao (Research on Tracing and Rubbing Making)," *Chinese Calligraphy*, no. 7, p. 181.

吳甌編

1999 《中國歷代印風系列 趙之謙印風（附胡鐶）》，重慶：重慶出版社。

Wu, Ou ed.

1999 *The Series of Chinese Seals in Past Dynasties, Zhao Zhiqian's Seals (including Hu Jue's)*,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杜鵬飛點校

2018 《如晤如語：茫父家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Du, Peng-fei ed.

2018 *Ru Wu Ru Yu: Mangfu Jiashu*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of Yao Hua to His Son),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柏巢

2004 〈一件標誌鄭簠書法走向成熟的作品：鄭簠法書真跡六種〉，《書畫藝術》，第4期，頁49-51。

Bai, Chao

2004 "The Work that Marks Zheng Fu's Calligraphy Turning to Maturity: Six Authentic Calligraphy Work by Zheng Fu," *The Ar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o. 4, pp. 49-51.

徐無聞

1997 〈《寰宇貞石圖》淺說〉，收入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第9冊，頁17。

Xu, Wu-wen

1997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recious Stone Carvings of the Realm," in Cheng-ren Xie ed., *Yang Shoujing ji* (The Yang Shoujing Collection), Wuhan: Hubei People's Press, Hu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vol. 9, p. 17.

孫曉雲

2010 《書法有法》，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un, Xiao-yun
2010 *Shufa you fa* (Calligraphy Owns Its Methods), Nanjing: Jiangsu Arts Press.
秦明
2016 〈故宮藏《清拓沙南侯獲碑》陳介祺本考略〉,《書法叢刊》,2期,頁68-83。
Qin, Ming
2016 "Gugong cang 'Qing ta sha nan hou huo bei' Chen Jieqi ben kaolue (A Study on Chen Jieqi's Rubbing of the Duke Sha'nan Stele the Palace Museum)," *Calligraphy Series*, no. 2, pp. 68-83.
曹建
2005 《晚清碑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Cao, Jian
2005 *Wan qing beixue yanjiu* (The Study of Late-Qing Stele-School Calligraphy), Tianjin: Tianjin renmin Arts Press.
陳斐蓉
2020 〈豐坊碑帖收藏研究〉,收入薛龍春編,《歷史脈絡中的收藏與鑒定》,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Chen, Fei-rong
2020 "Feng Fang bei tie shoucang yanjiu (The Rubbing Collecting of Feng Fang)," in Long-chun Xue ed., *Lishi mailuo zhong de shoucang yu jianding* (Contextualizing Art Collecting and Connoisseurship in Chinese Histo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程渤
2014 〈清代雙鉤摹寫法研究〉,《美術學報》,9期,頁98-104。
Cheng, Bo
2014 "Qingdai shuanggou mou xie fa yanjiu (Studies on the Qing-Dynasty Methods pf Tracing)," *Art Journal*, no. 9, pp. 98-104.
黃苗子
2003 《藝林一枝:古美術文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Huang, Miao-zi
2003 *Yi lin yi zhi: gu meishu wen bi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楊虎
2012 〈故宮藏《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版刻年代辨析〉,收入秦明主編,《黃易與金石學論集》,北京:故宮出版社。
Yang, Hu
2012 "Gugong cang 'xiao penglaige jinshi wenzi' banke niandai bianxi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Printed Epigraphy of the Little Penglai Belvedere)," in Ming Qin ed., *Huang Yi yu jinshi xue lunwen ji* (Proceedings of Huang Yi and the Epigraphy Studies), Beijing: Palace Museum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趙梓汝

2018 〈由黃易雙鉤古碑衍生的相關書學信息初探〉，收入秦明主編，《內涵與外延：故宮黃易尺牘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頁276-290。

Zhao, Zi-ru

2018 "You Huang Yi shuanggou gubei Yansheng de xiangguan shu xue xinxi chutan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Study of Calligraphy as Derived from Huang Yi's Tracing Copy of Ancient Steles)," in Ming Qin ed., *Neihan yu waiyan: gugong Huang Yi chidu yanjiu guoji xueshu taolun hui lunwen ji*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Letters of Huang Yi from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Palace Museum Press, pp. 276-290.

增田知之

2009 〈明代法帖刊行與蘇州文氏一族〉，《書法叢刊》，2期，頁82-96。

2010 〈從董其昌的法帖刊行事業看其確立權威的構想〉，收入孫曉雲、薛龍春主編，《請循其本：古代書法創作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321-339。

Masuda, Tomoyuki

2009 "Mingdai fatie kanxing yu Suzhou Wenshi yi zu (The Printing of Model Calligraphy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Wen Family in Suzhou)," *Calligraphy Series*, no. 2, pp. 82-96.

2010 "Cong Dong Qichang de fatie kanxing shiye kan qi queli quanwei de gouxiang (The Formation of Authority: Dong Qichang's Career in the Printing of Calligraphy Model Books)," in Xiao-yun Sun and Long-chun Xue ed., *Qing xun qi ben: gudai shufa chuangzuo yanjiu guoji xueshu taolun hui lunwen ji* (Keeping to the Original Ques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cient Practices of Calligraphy Writi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pp. 321-339.

蔣英炬等

2017 《孝堂山石祠》，北京：文物出版社。

Jiang, Ying-ju et al.

2017 *Xiaotangshan Shici* (Xiaotangshan Stone Temple),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謝承仁主編

1997 《楊守敬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第9、10冊。

Xie, Cheng-ren ed.

1997 *Yang Shoujing ji* (The Yang Shoujing Collection), Wuhan: Hubei People's Press, Hu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vol. 9, 10.

薛龍春

2004 〈從韻味到姿態——《閣帖》傳播與書法語境的轉換〉，《中國書畫》，4期，頁77-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7 《鄭簠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2019 《古歡：黃易與乾嘉金石時尚》，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Xue, Long-chun

2004 “Cong yunwei dao zitai: ‘ge tie’ chuanbo yu shufa yujing de zhuanhuan (From Temporality to Visuality: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hunhuage Ti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xt in Calligraphy),” *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 vol. 4, pp. 77-81.

2007 *Zheng Fu yanjiu* (The Study of Zheng Fu), Beijing: Rongbaozhai Press.

2019 *Gu huan: Huang Yi yu qian jia jinshi shishang* (The Pleasure of Antiquity: Huang Yi and the Trend of Epigraphic Studies in the Qianlong-Jiaqing Era),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孝堂山畫像題字中的雙鉤銘文，取自蔣英炬等著，《孝堂山石祠》(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頁52-54。

圖2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中雙鉤而未剜刻的字例，濟寧高甫先生提供。

圖3 豐坊跋華夏真賞齋本《夏承碑》，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圖4 楊守敬，《望堂金石》所收《石經殘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4冊，頁2860。

圖5 褚峻，鉤本《裴岑紀功碑》，收入《古歡閣雙鉤秦漢石刻》，上海圖書館藏。

圖6 翁方綱跋巴慰祖雙鉤《劉熊碑》，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7 翁方綱，《蘇齋雙鉤劉熊碑》，上海圖書館藏。

圖8 翁方綱，《西嶽華山廟碑圖》，見翁同龢《翬溪翁摹秦篆 泰山、琅邪、之罘，坿漢華山碑圖》，翁萬戈舊藏。

圖9 翁方綱據雙鉤本摹補《夏承碑》題跋，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圖10 翁方綱，《致陸恭札》，上海圖書館藏。

圖11 翁方綱，《廟堂碑唐本存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12 趙之謙，雙鉤《群臣上壽刻石》，見《二金蝶堂雙鉤漢碑十種》，日本《書筴》雜誌，第7卷，第1期（1943)，頁“二金蝶”5 。

圖13 趙之謙，「二金蝶堂雙鉤兩漢刻石之記」，取自吳颺編，《中國歷代印風系列 趙之謙印風（附胡鐵)》(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頁22。

圖14 魏錫曾，《書二金蝶堂漢碑十種序跋後》(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圖15 趙之謙，雙鉤天一閣本《劉熊碑》，見於華藝國際拍賣公司2018年春拍。

圖16 趙之謙，補鉤《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圖17 劉喜海，《三巴舂古志》雙鉤《馮使君神道闕》，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9冊，頁6262。

圖18 吳大澂，雙鉤《漢沙南侯獲刻石》潘祖蔭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19 樂炳元為吳大澂雙鉤《郭有道碑》，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圖20 胥繩武，《致黃易札》，收入《黃小松友朋書札》，第11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21 姚華信箋中木刻的雙鉤《熹平石經》及《廣武將軍碑》，取自姚華著、杜鵬飛點校，《如晤如語：茫父家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108)，頁108、45。

圖22 劉拙東墨筆製作的北涼《沮渠安周造像記》「拓本」，取自中國國家圖書館編，《中國傳拓技藝圖典》(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92。

圖23 黃易，《致趙魏札》，張廷濟過錄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4 黃易，《臨婁壽碑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5 金農，《臨華山廟碑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6 鄧石如篆書對聯，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

圖27 何紹基，《臨唐翊華雙鉤西嶽華山廟碑冊》，湖南省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8　何紹基，雙鉤《沙南侯獲碑》軸，見於北京保利2017年春拍。
圖29　何澂，雙鉤《漢張遷碑額》，收入《思古齋雙鉤漢碑篆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30　褚峻，《金石圖》縮臨《漢白石神君碑》，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圖31　黃易，雙鉤《范式碑》，見《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天津圖書館藏。
圖32　翁方綱，《致黃易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33　高學治，《陵苕館續刻金石文字》自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34　丁彥臣，《梅花草庵雙鉤碑刻》所收《石鼓文》，見於西泠印社拍賣公司2013年春拍。
圖35　許槤，《古均閣寶刻錄》雙鉤《夏承碑》，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36　徐渭仁，《隨軒金石文字》雙鉤《趙圉令碑》，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37　石宗建，《古歡閣雙鉤秦漢石刻》雙鉤《秦篆殘石》，上海圖書館藏。
圖38　羅振玉，《漢晉石刻墨影》雙鉤《漢孟琁殘碑》，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圖39　佚名，雙鉤巴慰祖《臨漢魏碑冊》，安徽省博物館藏。
圖40　《西嶽華山廟碑》華陰本與趙之謙雙鉤本比較。
圖41　劉喜海，《三巴舂古志》中的《文帝廟碑》「黑文」，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9冊，頁6281。
圖42　巴慰祖，雙鉤《劉熊碑》、翁方綱雙鉤《劉熊碑》單字比較。
圖43　趙之謙，雙鉤《天一閣本劉熊碑》，見於華藝國際拍賣公司2018年春拍。
圖44　翁方綱，雙鉤《琅邪臺殘石》，翁萬戈舊藏。
圖45　翁方綱鉤摹，《西嶽華山廟碑》（以四明本為底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46　阮元補鉤，《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47　嚴可均，雙鉤《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以長垣本補），湖州博物館藏。
圖48　趙之謙，雙鉤《西嶽華山廟碑》及所參照舊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圖49　高學治、楊守敬、丁彥臣雙鉤《西嶽華山廟碑》比較。
圖50　《沙南侯獲碑》清拓本及張德容雙鉤，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51　張德容雙鉤、張德容《金石聚》印本及何紹基、吳大澂雙鉤《沙南侯獲碑》單字比較。
圖52　吳湖帆，雙鉤《沙南侯獲碑》（以吳大澂鉤本為底本），上海圖書館藏。
圖53　鄭簠，隸書《朱熹詩軸》，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圖54　翁方綱隸書對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55　趙之謙，臨《祀三公山碑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56　金農，漆書《西嶽華山廟碑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57　何紹基，臨《張遷碑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58　鄭簠，《臨婁壽碑軸》，見北京保利2014年秋拍。
圖59　楊守敬、高學治雙鉤《天發神讖碑》比較。
圖60　楊守敬，《寰宇貞石圖》所刊《趙圉令碑》拓本，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圖61　《漢碑大觀》所刊錢泳臨《嵩山太室石闕銘》，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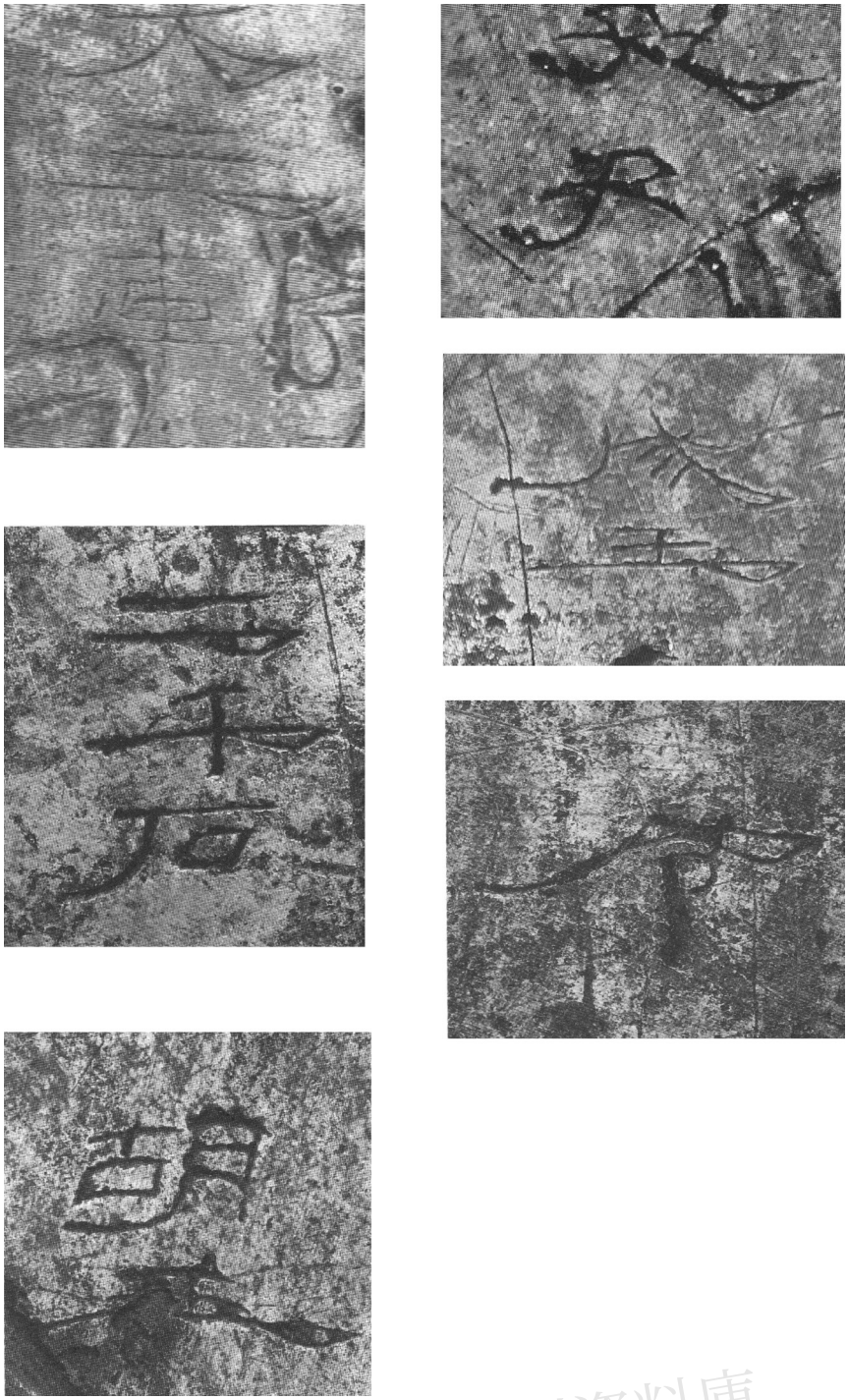


圖1　孝堂山畫像題字中的雙鉤銘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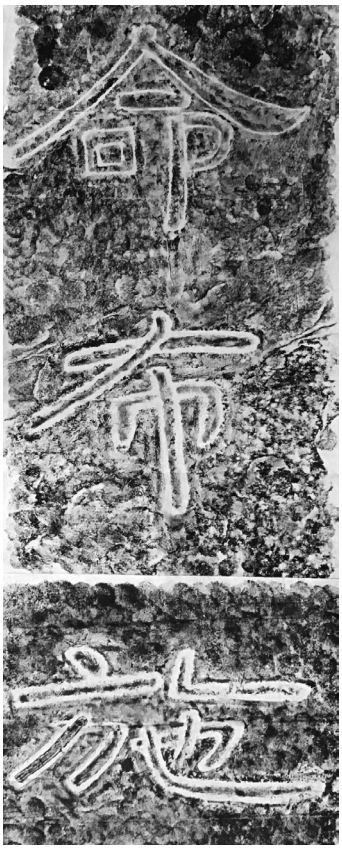


圖2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中雙鉤而未剜刻的字例 濟寧高甫先生提供



圖3 豐坊跋華夏真賞齋本《夏承碑》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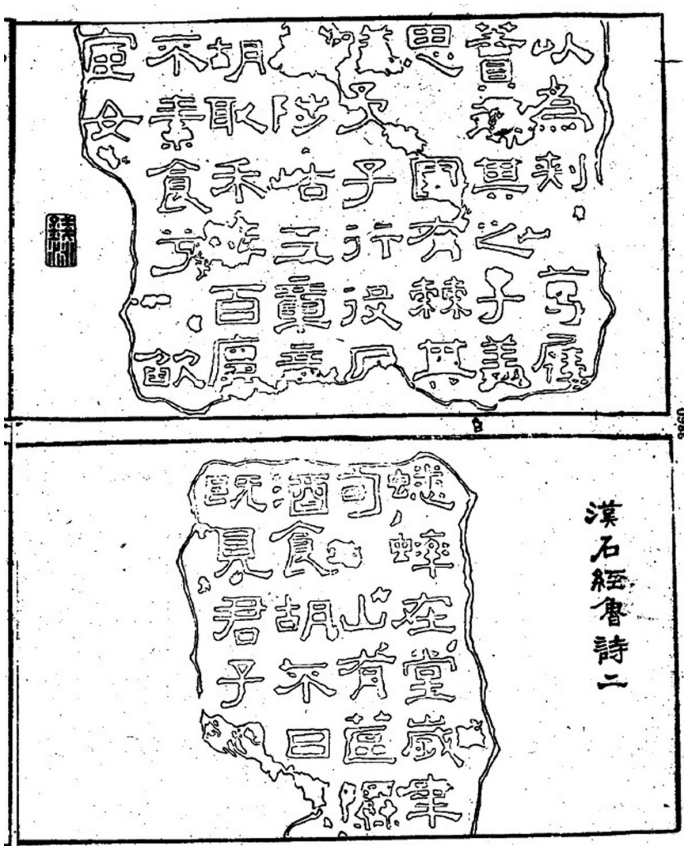


圖4　楊守敬　《望堂金石》所收《石經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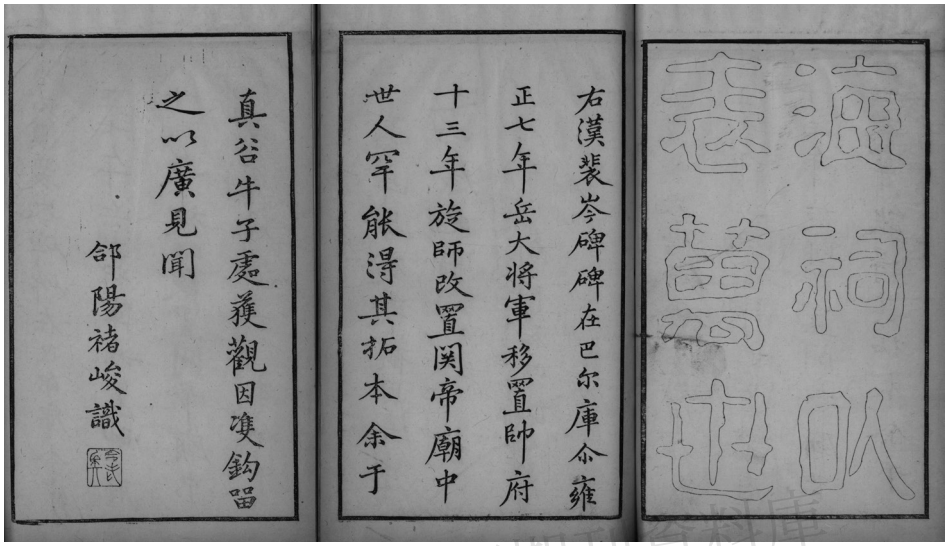


圖5　褚峻　鉤本《裴岑紀功碑》　收入《古歡閣雙鉤秦漢石刻》　上海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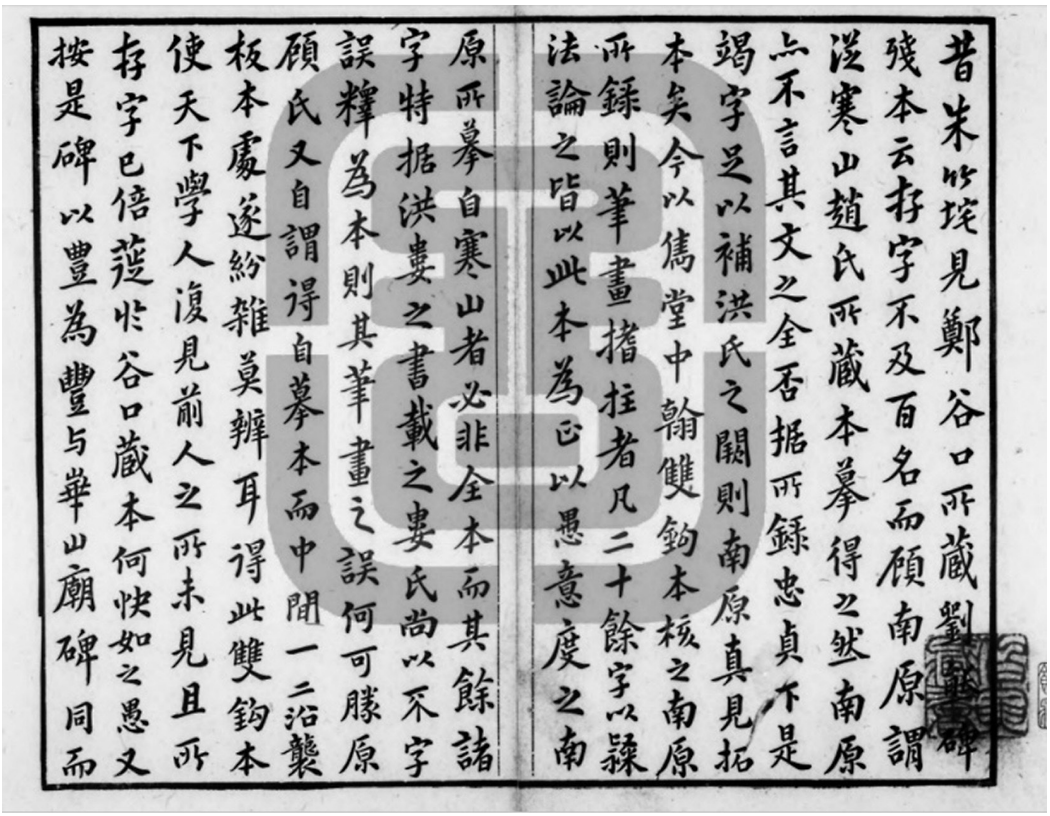


圖6　翁方綱跋巴慰祖雙鉤《劉熊碑》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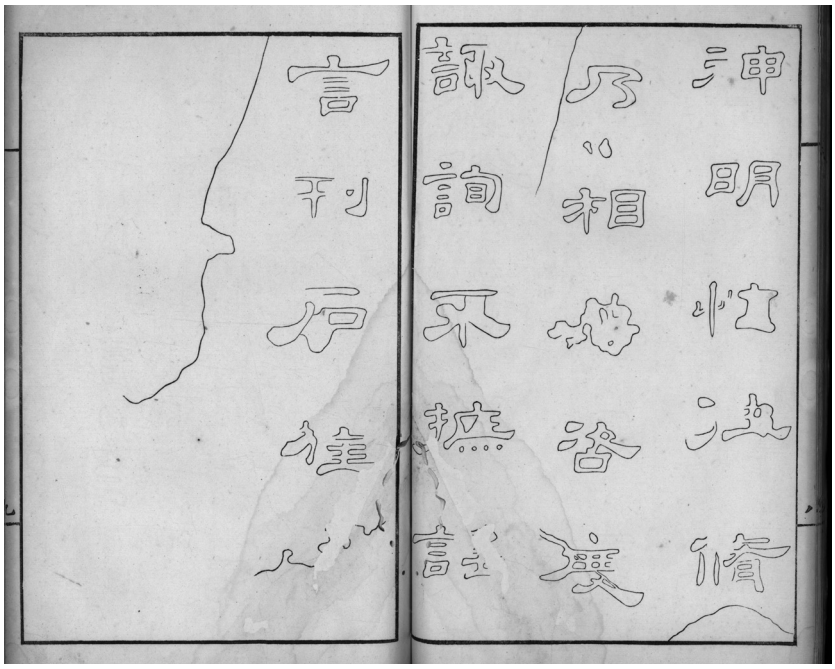


圖7 翁方綱 《蘇齋雙鉤劉熊碑》 上海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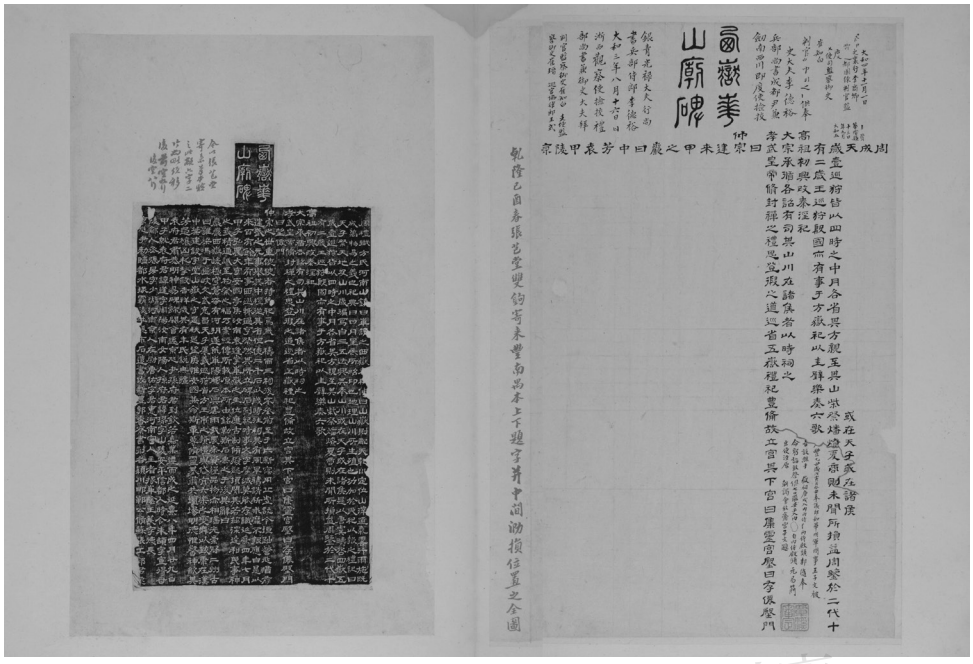


圖8 翁方綱《西嶽華山廟碑圖》 見翁同龢《覃溪翁摹秦篆泰山、琅邪、之罘，坿漢華山碑圖》 翁萬戈舊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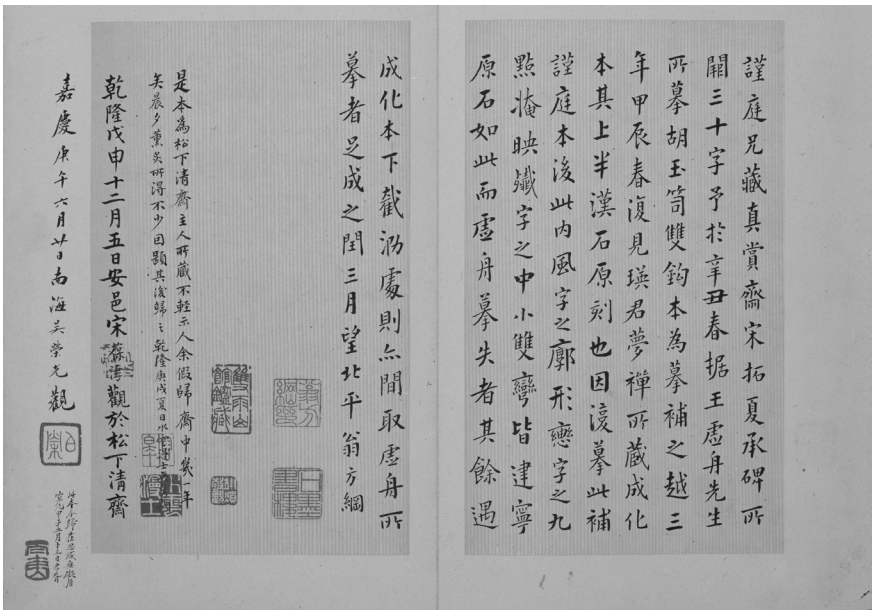


圖9　翁方綱據雙鉤本摹補《夏承碑》題跋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圖10　翁方綱　《致陸恭札》　上海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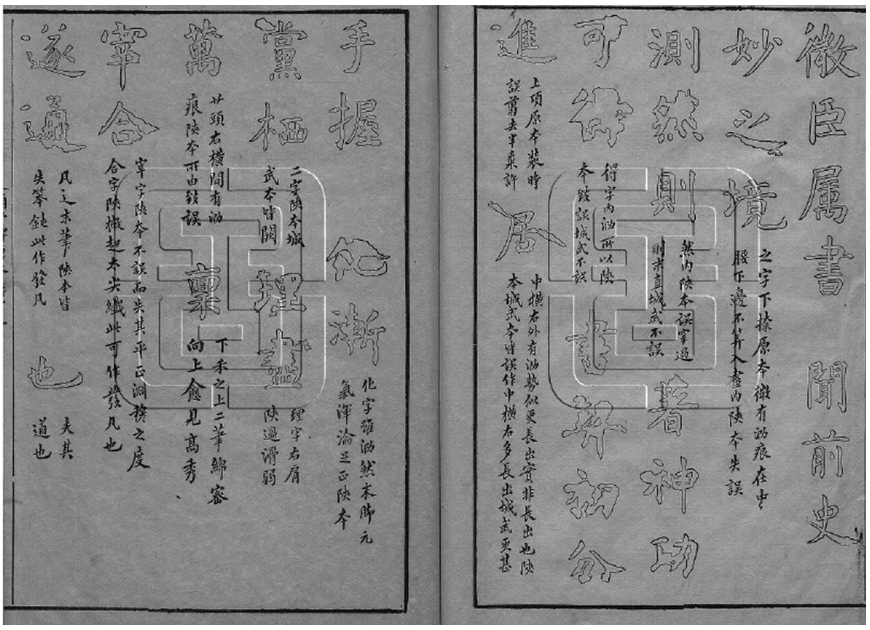


圖11　翁方綱　《廟堂碑唐本存字》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12　趙之謙　雙鉤《群臣上壽刻石》　見《二金蝶堂雙鉤漢碑十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3 趙之謙 「二金蝶堂雙鉤兩漢刻石之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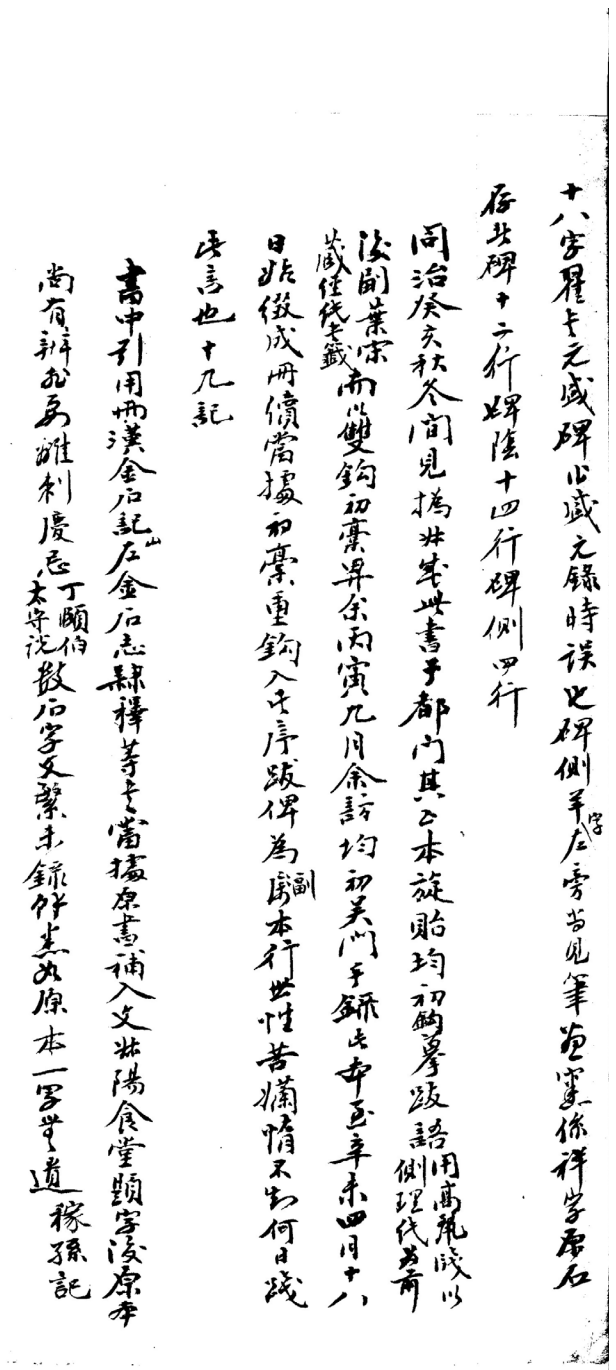


圖14　魏錫曾　《書二金蝶堂漢碑十種序跋後》（稿本）　上海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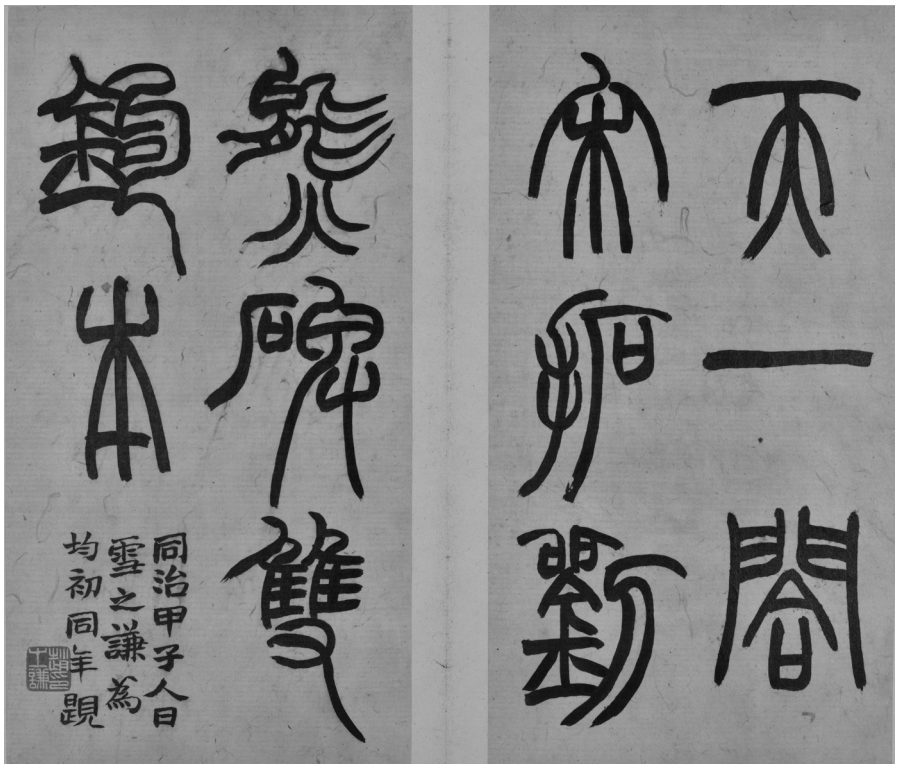


圖15 趙之謙 雙鉤天一閣本《劉熊碑》 見於華藝國際拍賣公司2018年春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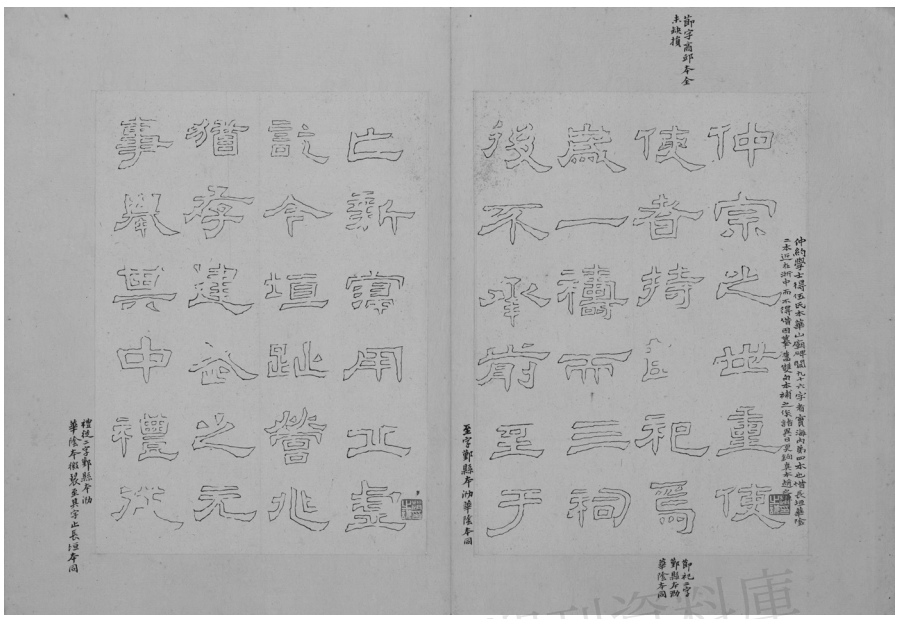


圖16 趙之謙 補鉤《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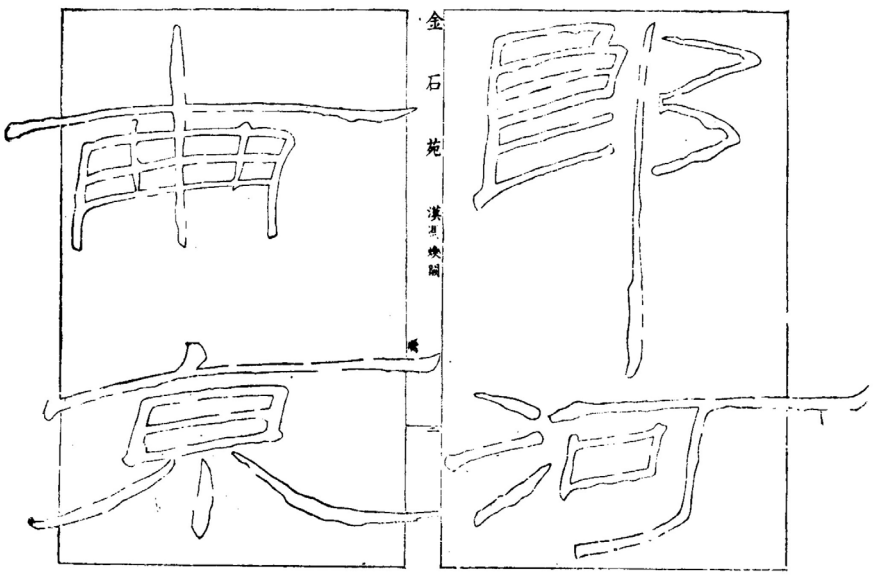


圖17　劉喜海　《三巴舂古志》雙鉤《馮使君神道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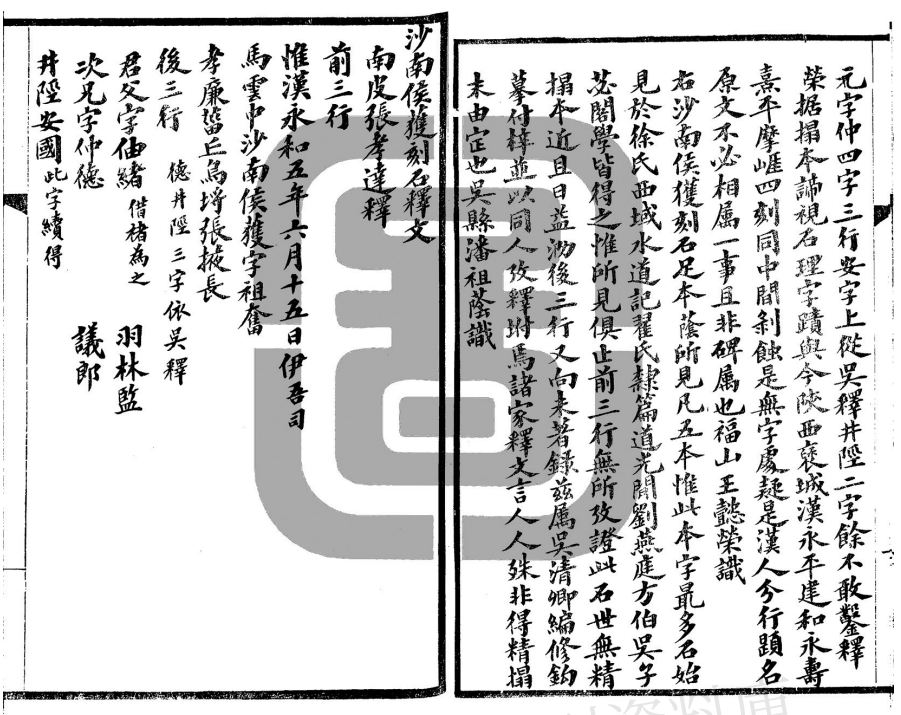


圖18　吳大澂雙鉤《漢沙南侯獲刻石》潘祖蔭跋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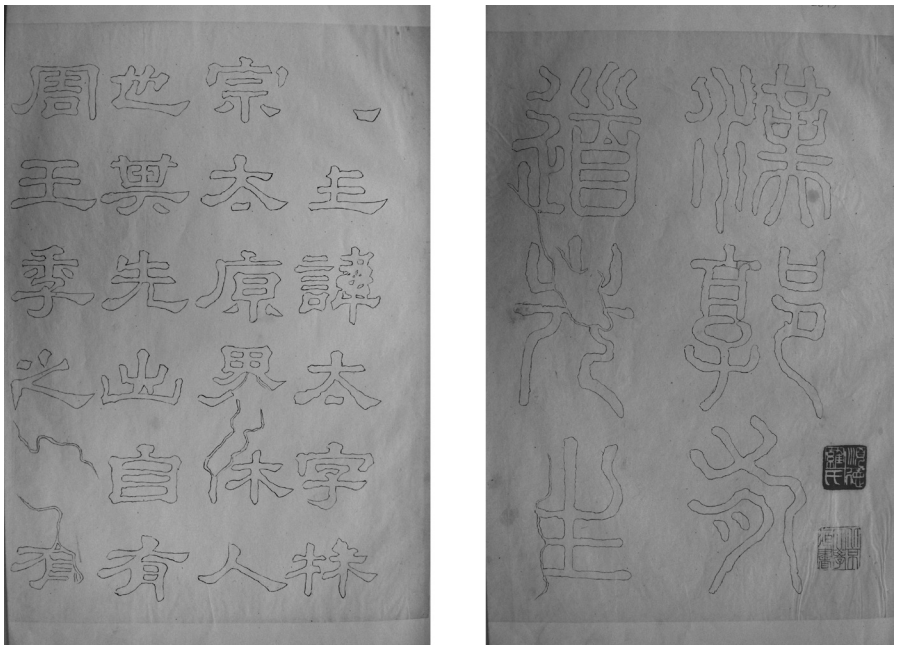


圖19　樂炳元為吳大澂雙鉤《郭有道碑》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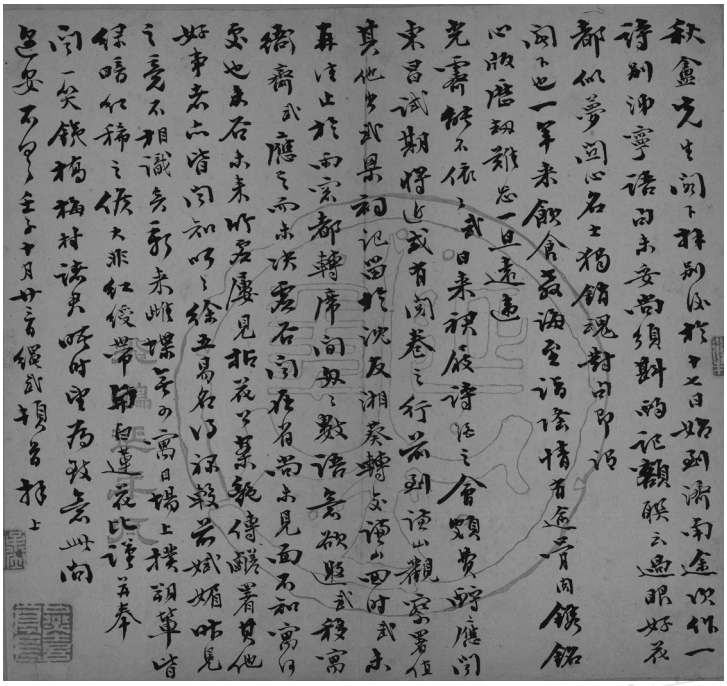


圖20　胥繩武　《致黃易札》　收入《黃小松友朋書札》，第11冊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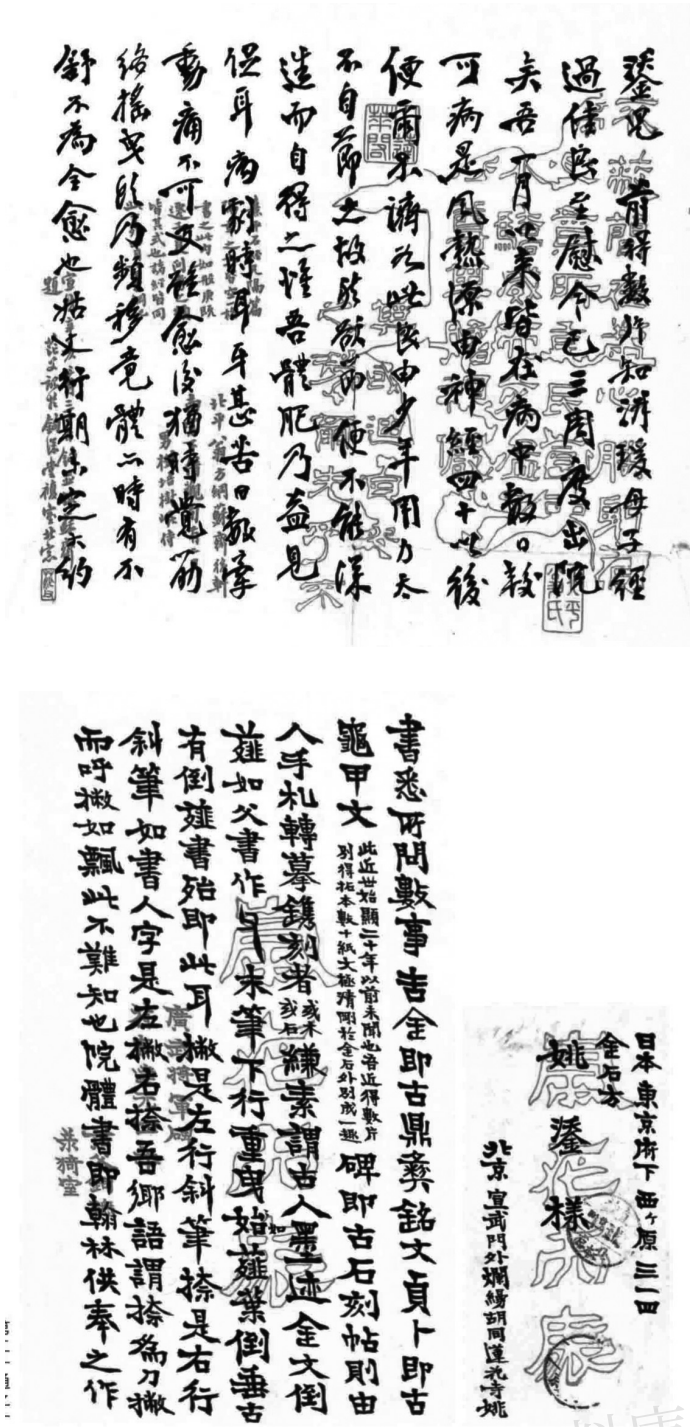


圖21　姚華信箋中木刻的雙鉤《熹平石經》及《廣武將軍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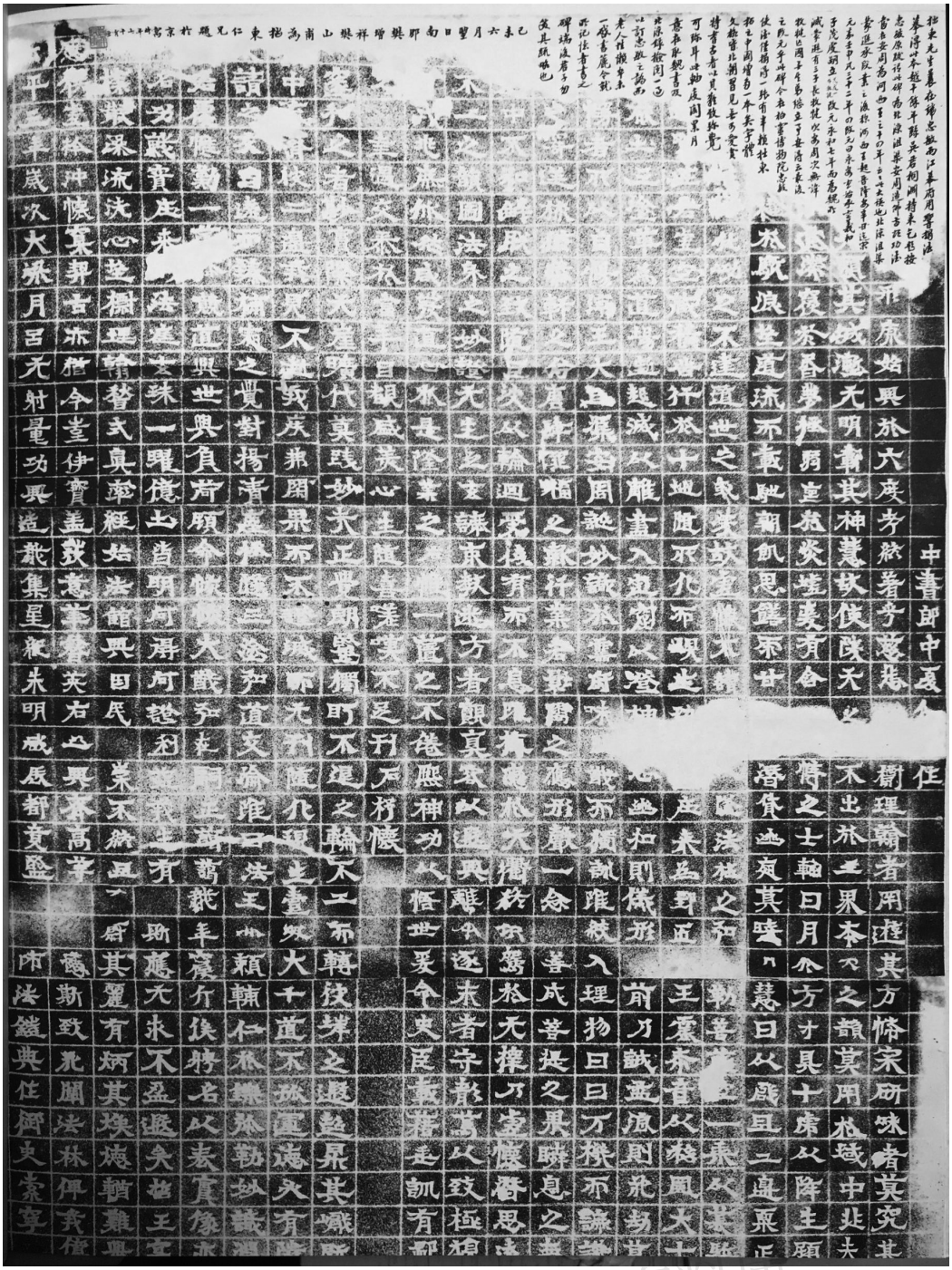


圖22 劉抽東墨筆製作的北涼《沮渠安周造像記》「拓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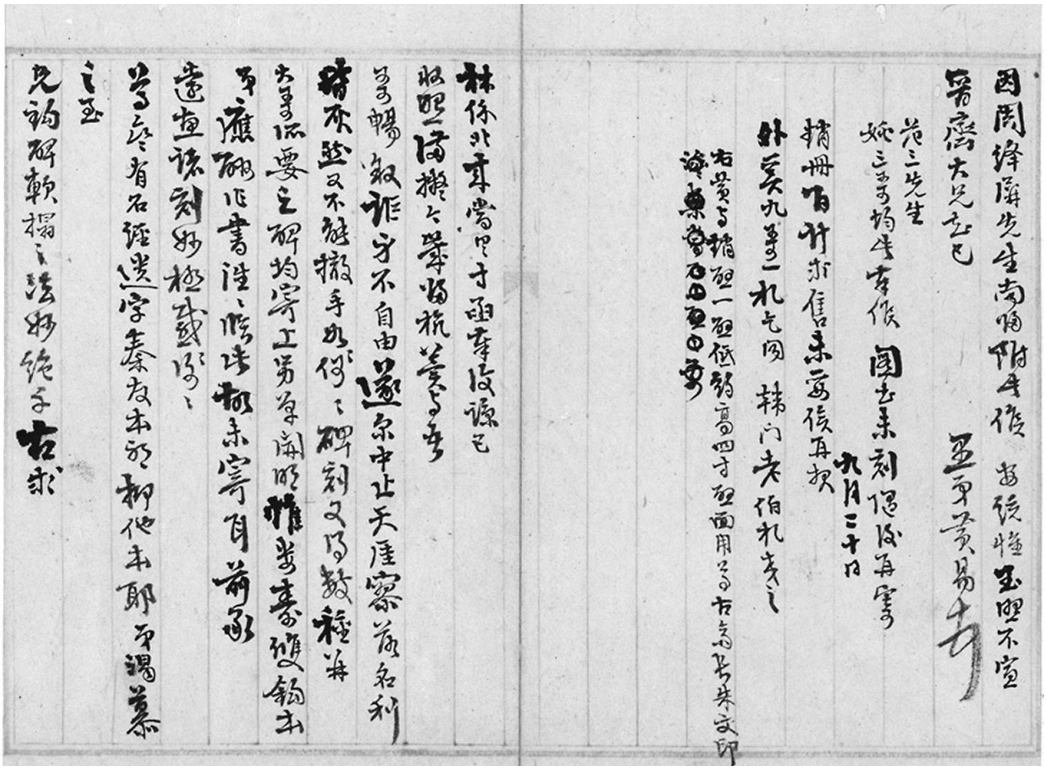


圖23　黃易　《致趙魏札》　張廷濟過錄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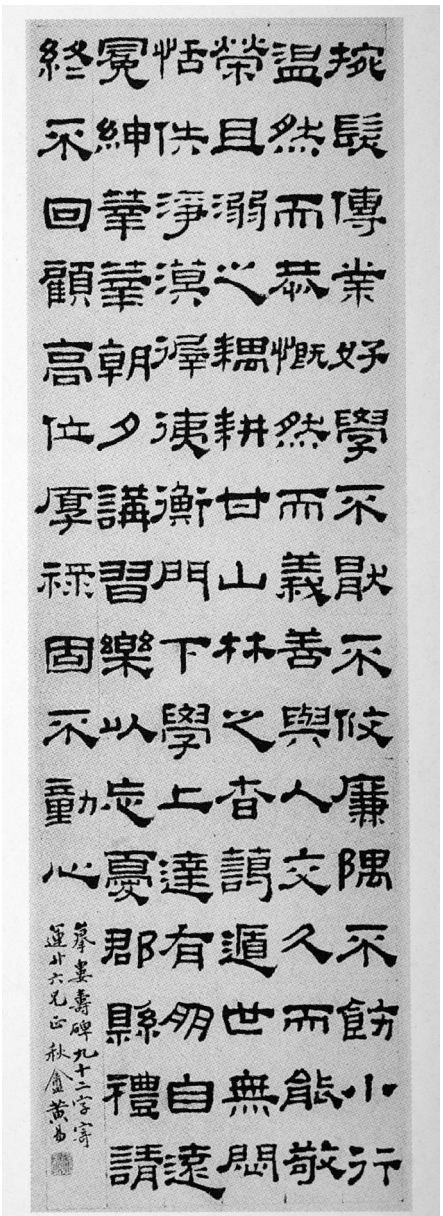


圖24 黃易 《臨婁壽碑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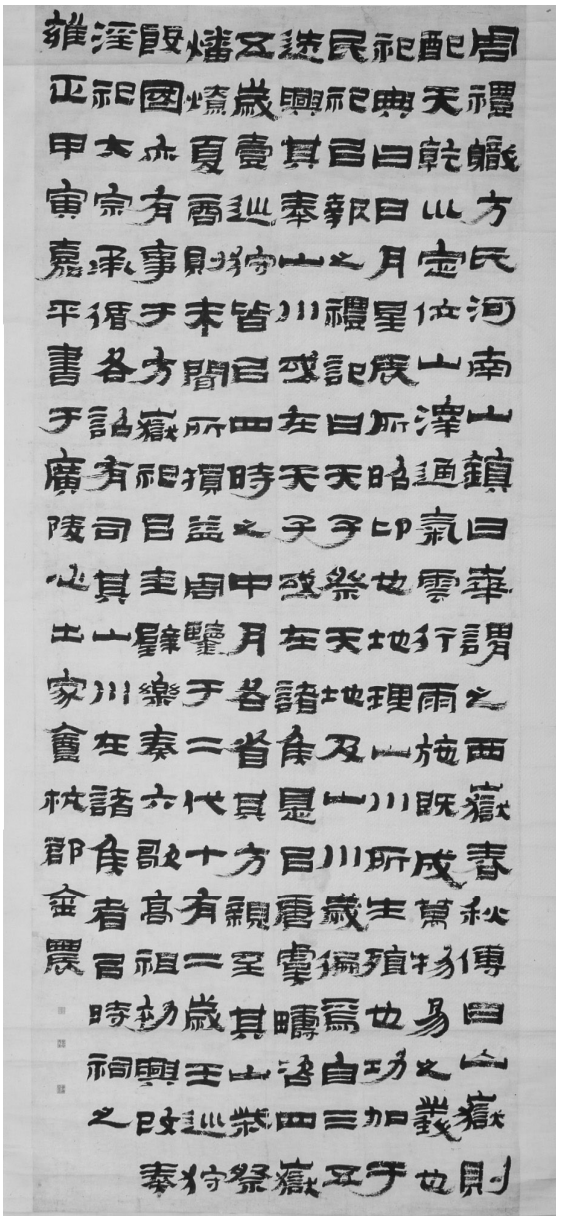


圖25 金農 《臨華山廟碑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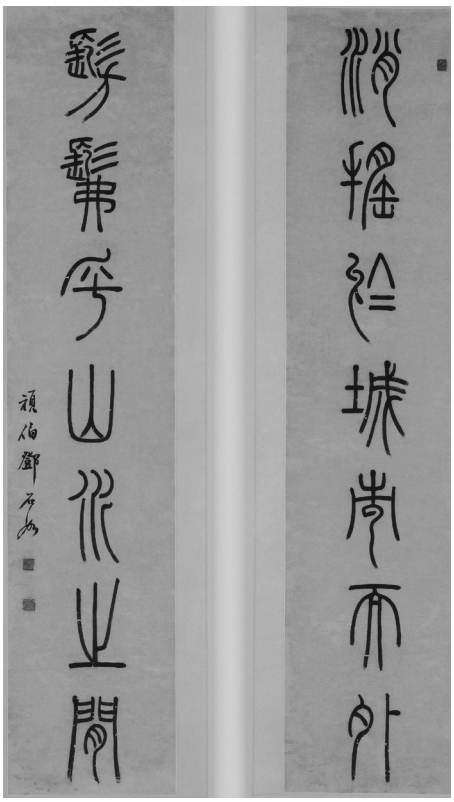


圖26　鄧石如篆書對聯　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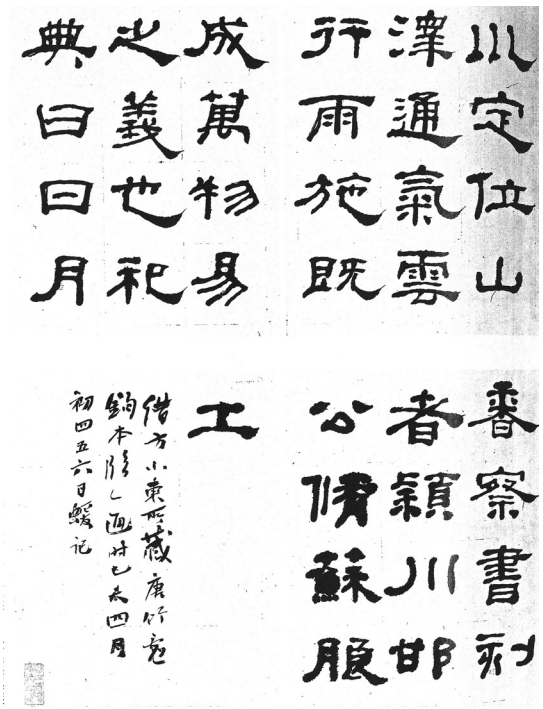


圖27　何紹基　《臨唐翊華雙鉤西嶽華山廟碑冊》　湖南省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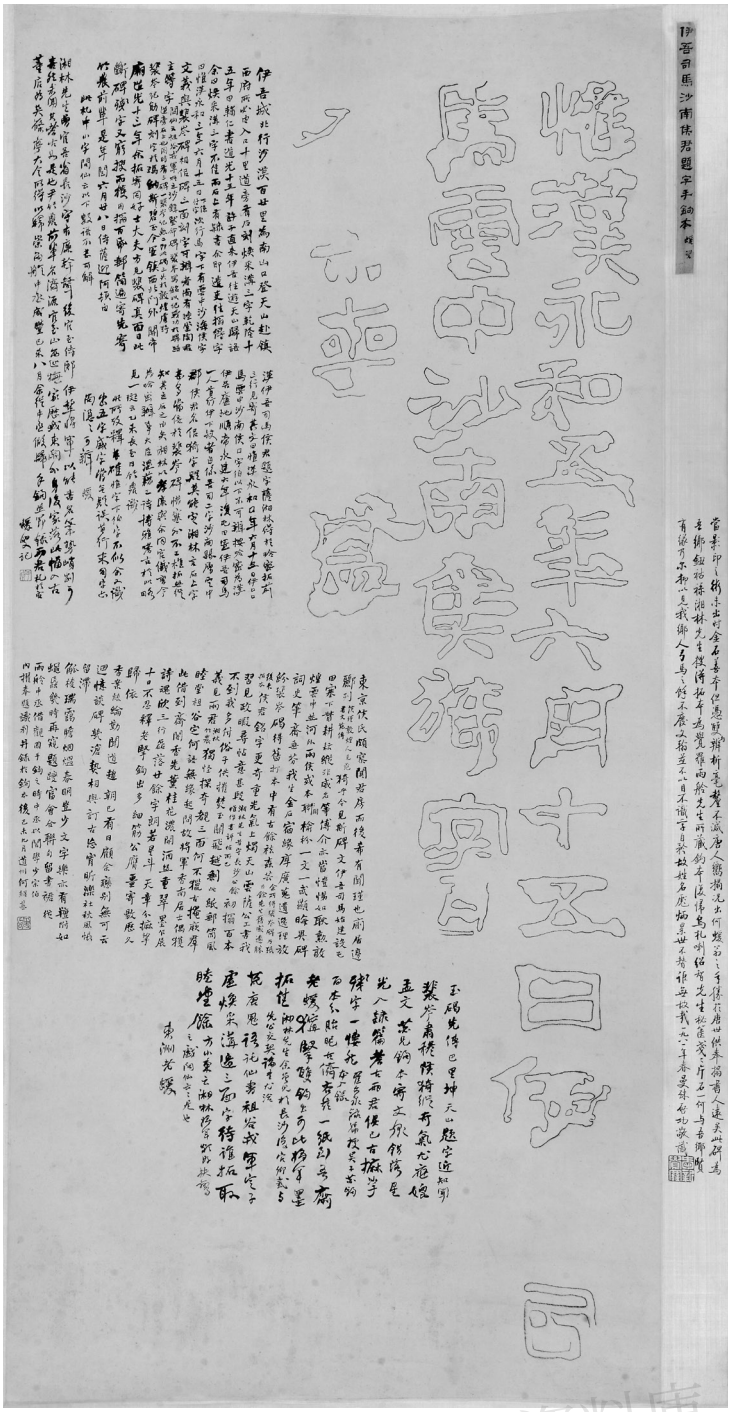


圖28　何紹基　雙鉤《沙南侯獲碑》軸　見於北京保利2017年春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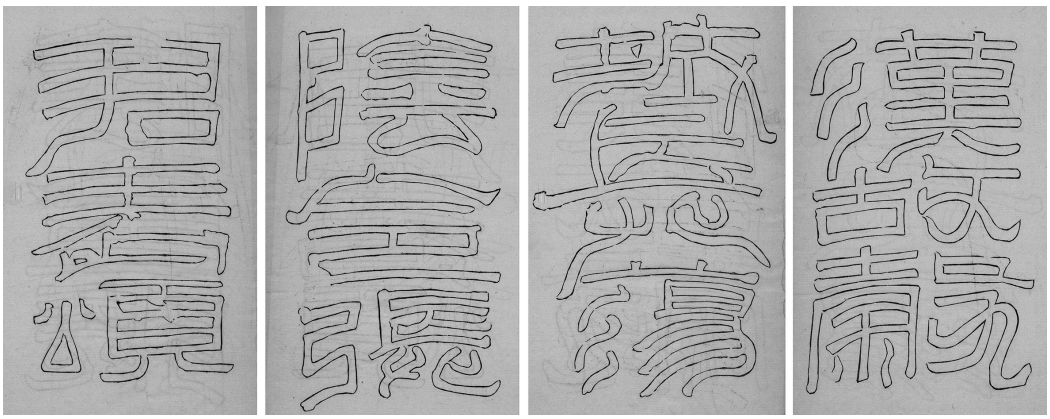


圖29 何澂 雙鉤《漢張遷碑額》 收入《思古齋雙鉤漢碑篆額》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0 褚峻 《金石圖》縮臨《漢白石神君碑》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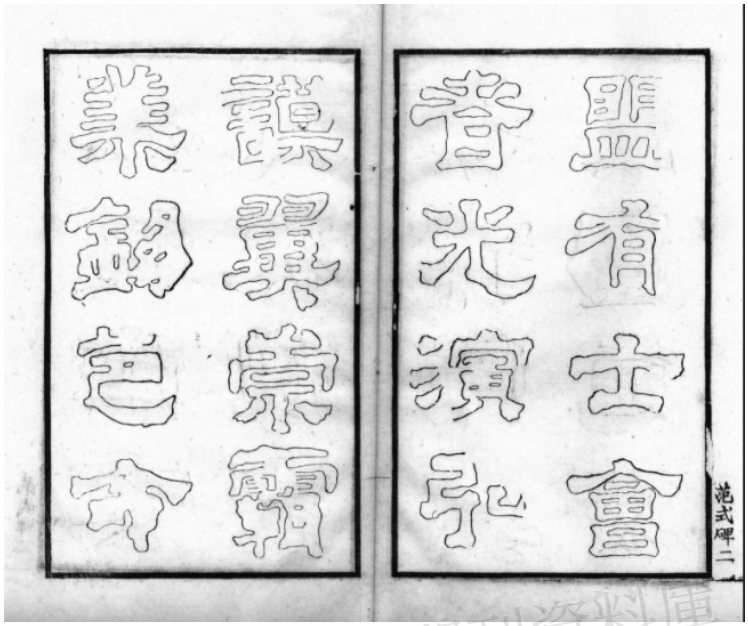


圖31 黃易 雙鉤《范式碑》 見《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天津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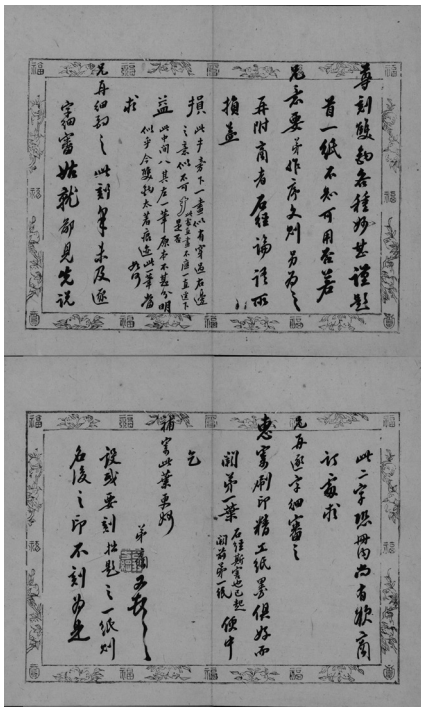


圖32　翁方綱　《致黃易札》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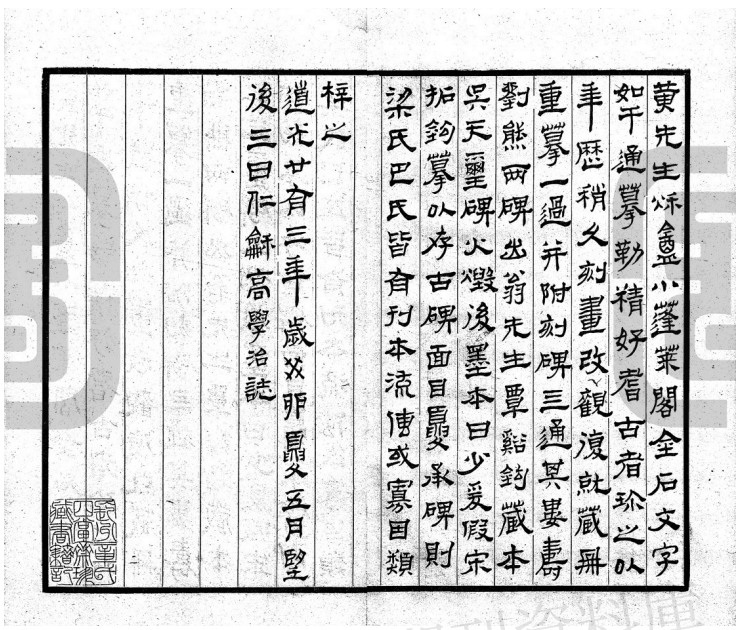


圖33　高學治　《陵苕館續刻金石文字》自跋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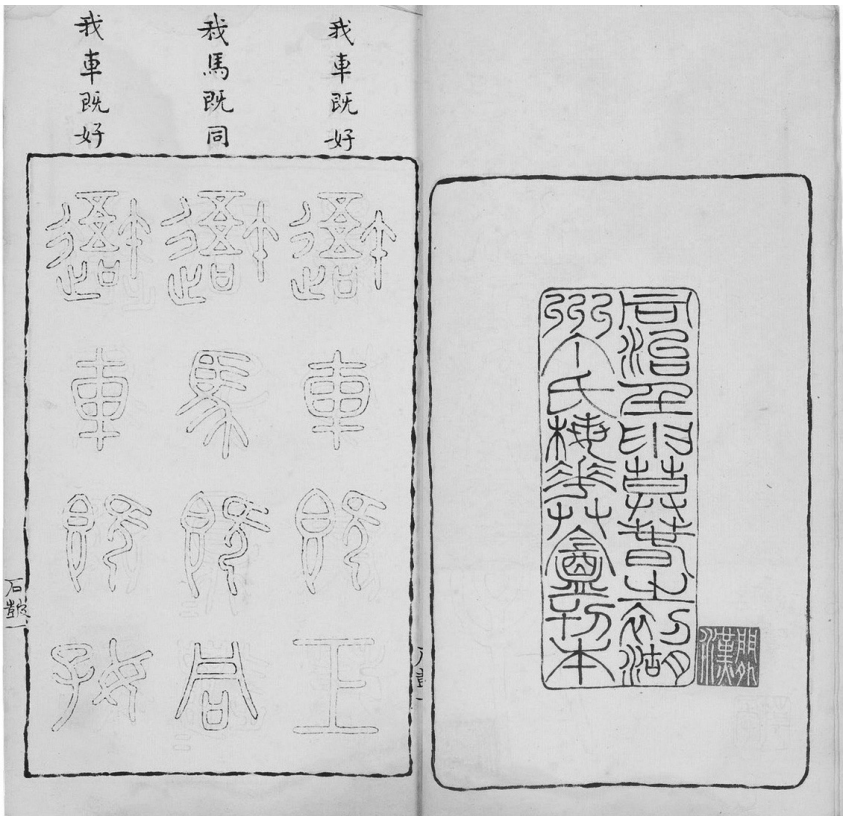


圖34 丁彥臣 《梅花草庵雙鈎碑刻》所收《石鼓文》 見於西泠印社拍賣公司2013年春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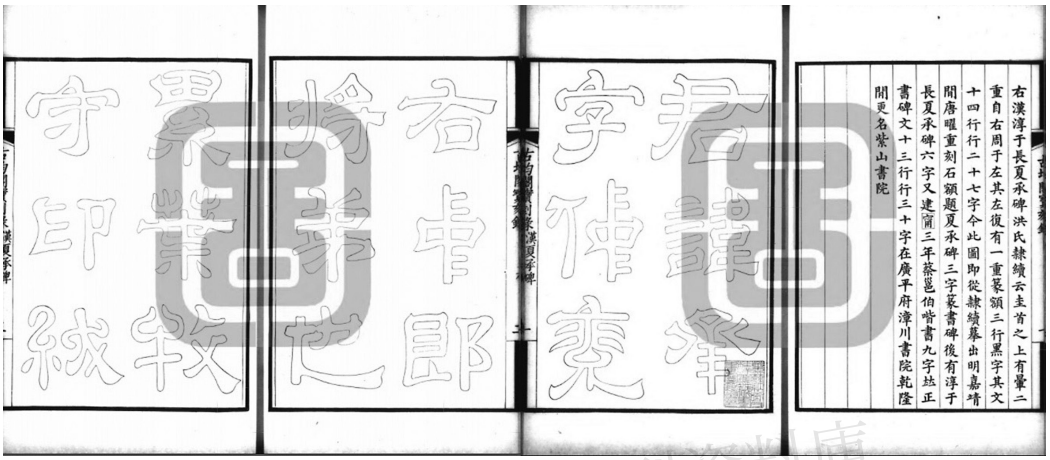


圖35 許槤 《古均閣寶刻錄》雙鈎《夏承碑》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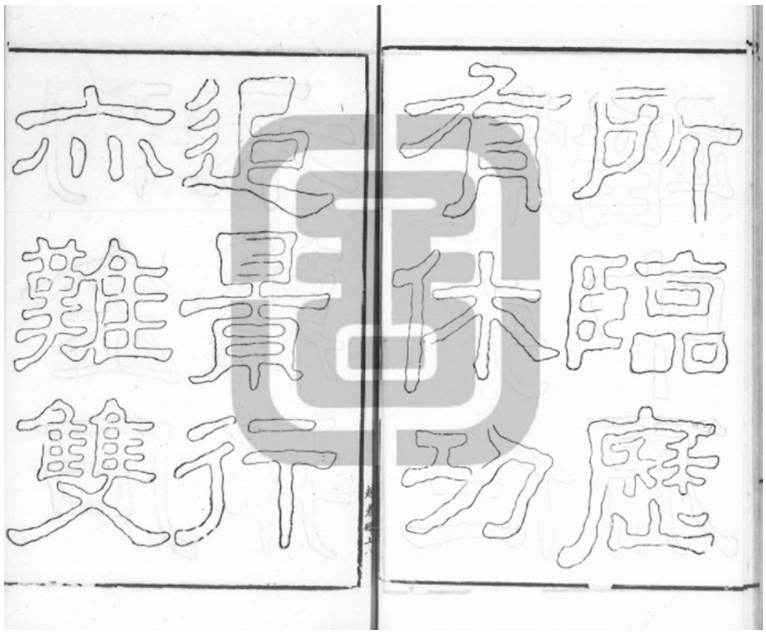


圖36 徐渭仁 《隨軒金石文字》雙鉤《趙圉令碑》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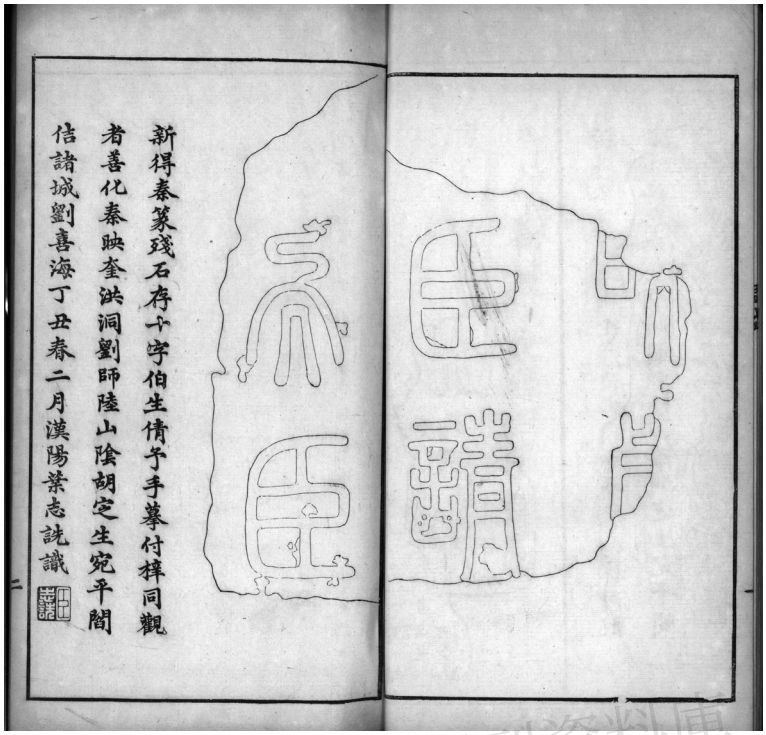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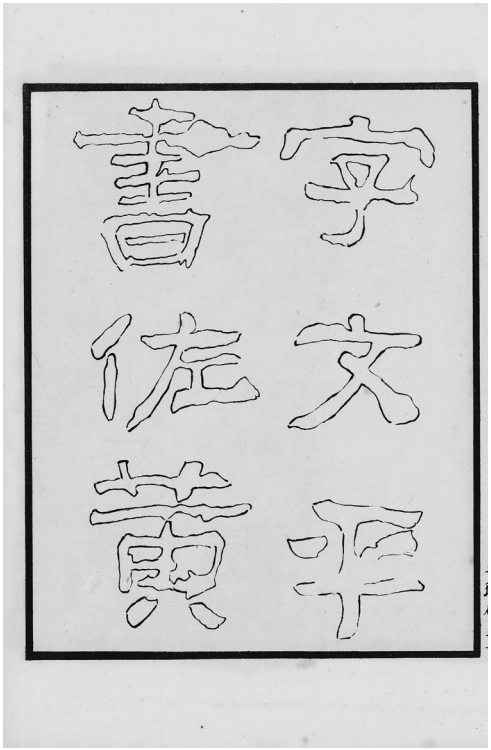


圖37 石宗建 《古歡閣雙鉤秦漢石刻》雙鉤《秦篆殘石》 上海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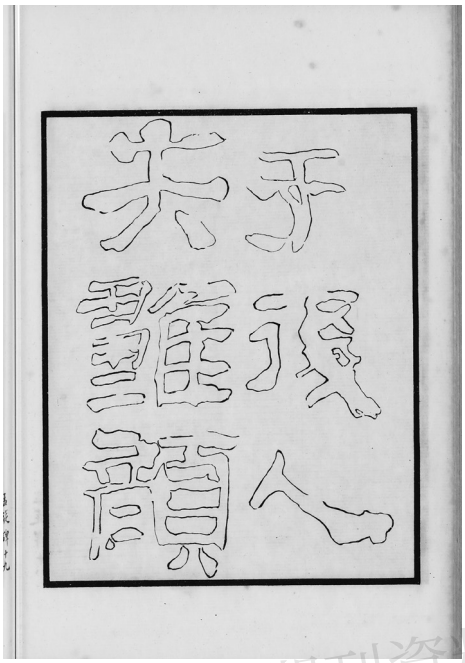


圖38 羅振玉 《漢晉石刻墨影》雙鉤《漢孟琁殘碑》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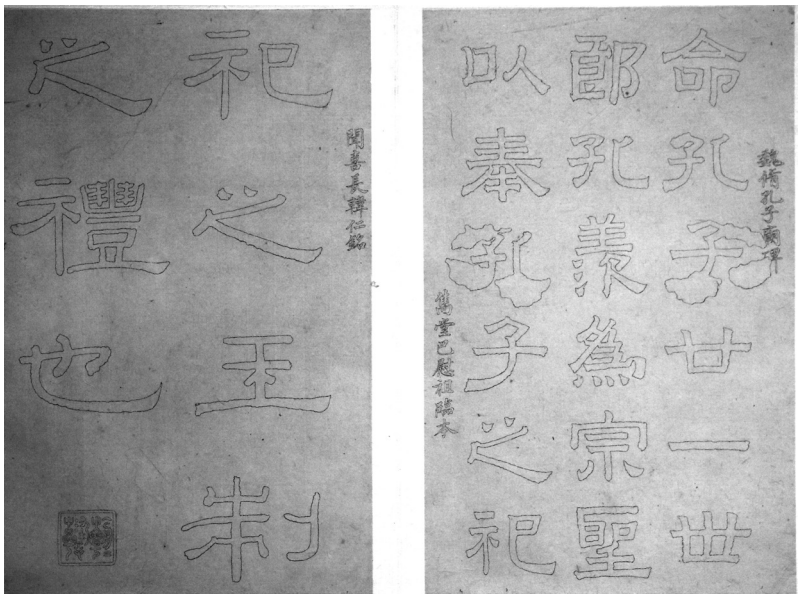


圖39　佚名　雙鉤巴慰祖《臨漢魏碑冊》　安徽省博物館藏



圖40　《西嶽華山廟碑》華陰本與趙之謙雙鉤本比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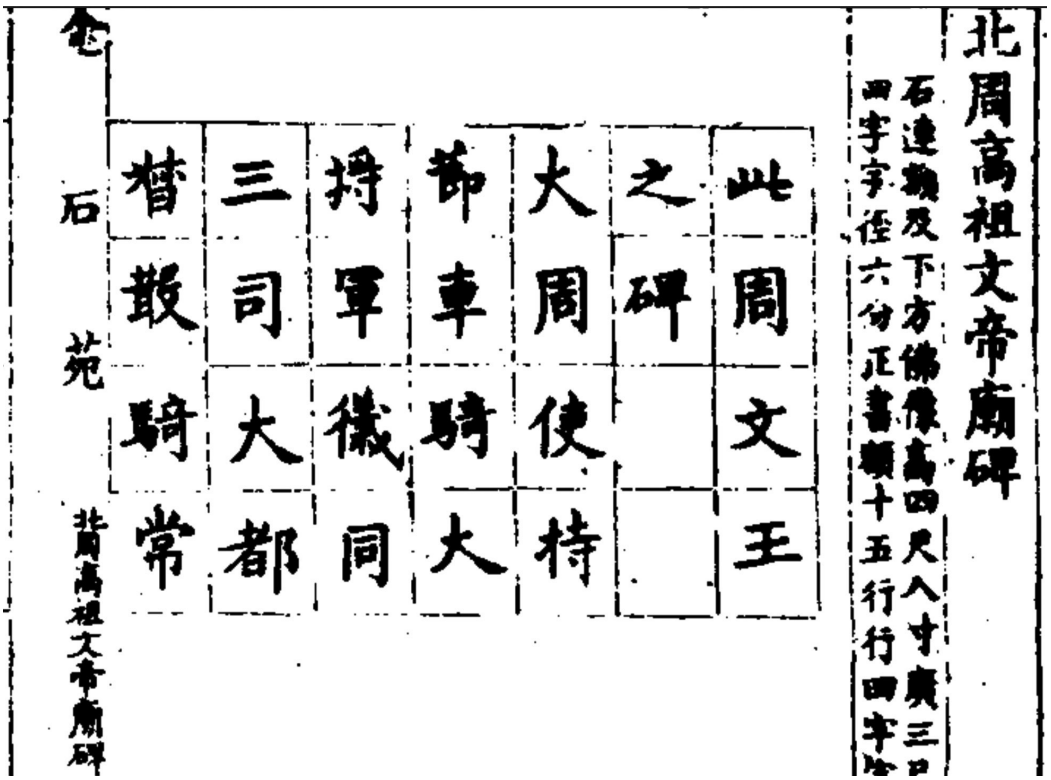


圖41　劉喜海　《三巴舊古志》中的《文帝廟碑》「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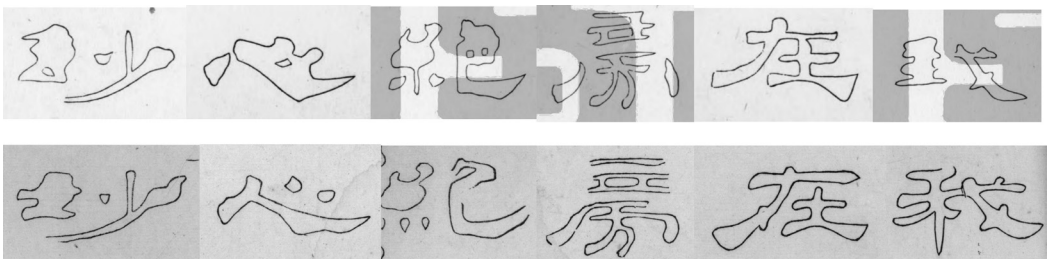


圖42　巴慰祖雙鉤《劉熊碑》、翁方綱雙鉤《劉熊碑》單字比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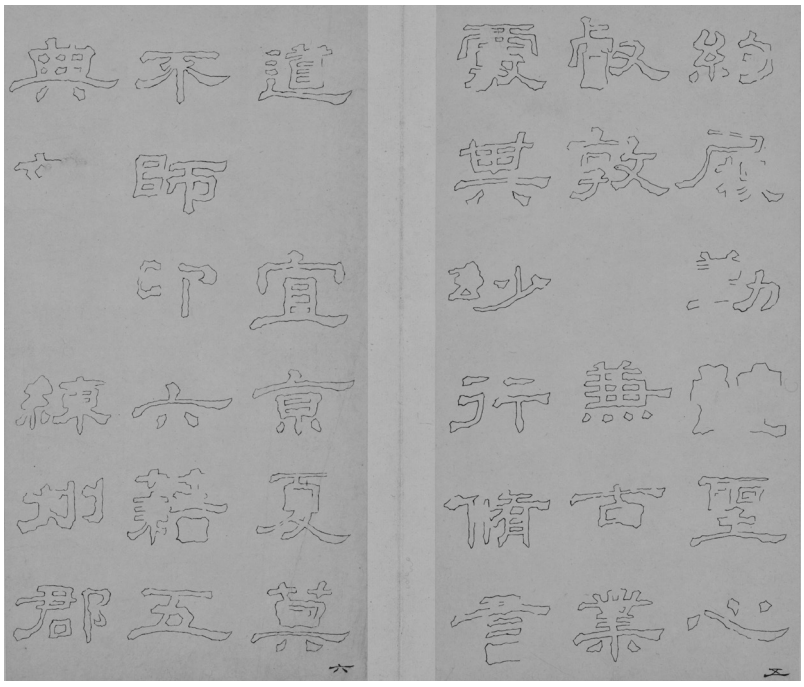


圖43　趙之謙　雙鉤《天一閣本劉熊碑》　見於華藝國際拍賣公司2018年春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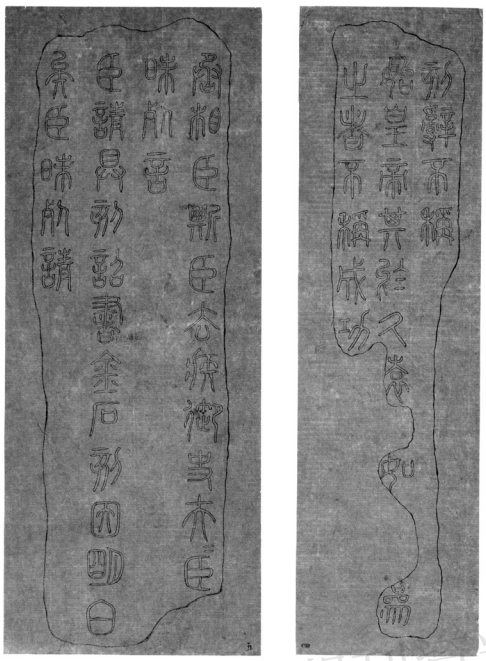


圖44　翁方綱　雙鉤《琅邪臺殘石》　翁萬戈舊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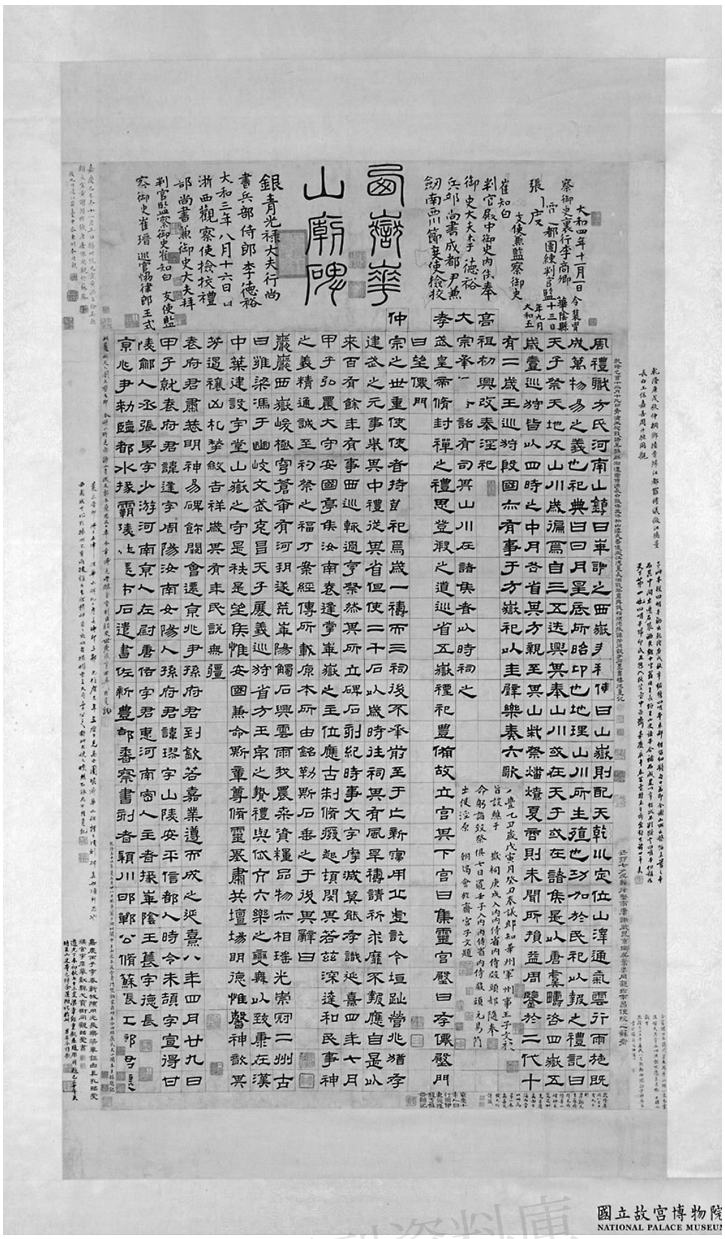


圖45　翁方綱鈎摹　《西嶽華山廟碑》（以四明本為底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6　阮元補鉤　《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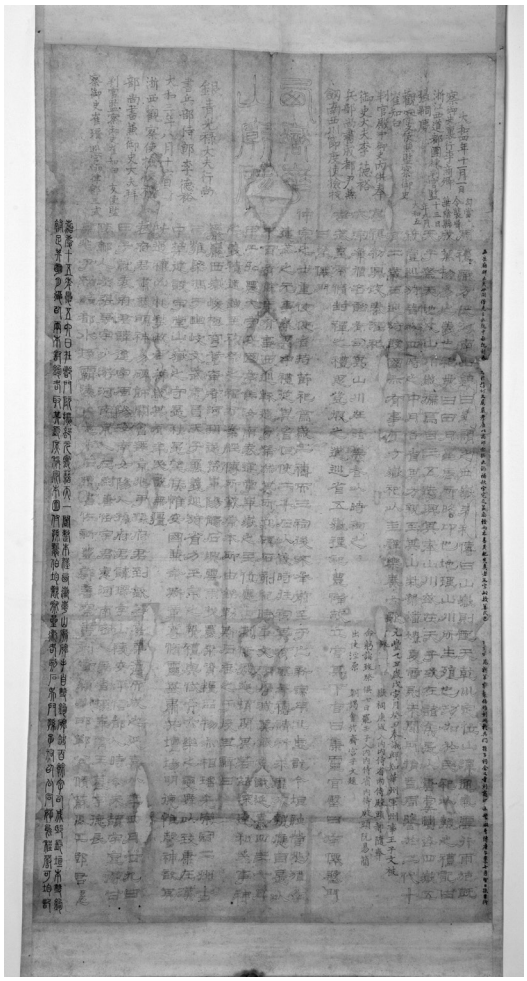


圖47　嚴可均　雙鉤《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以長垣本補）　湖州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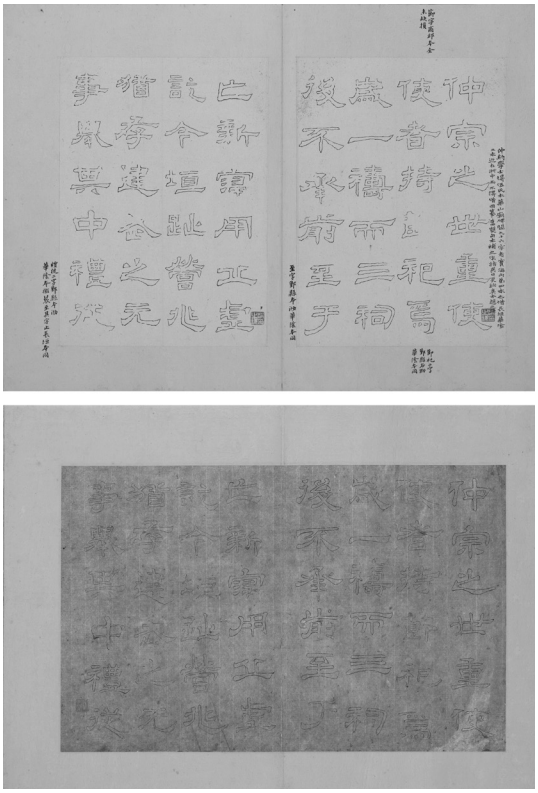


圖48　趙之謙雙鈎《西嶽華山廟碑》及所參照舊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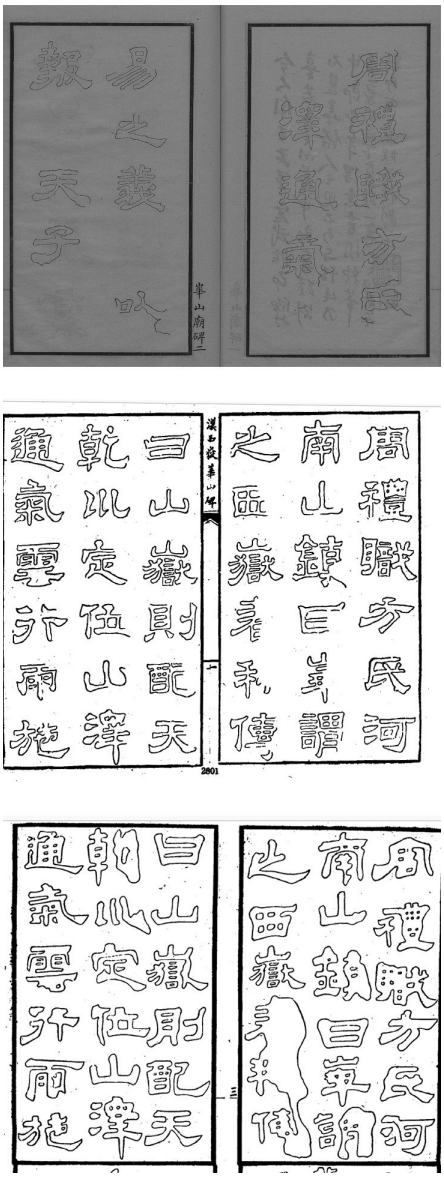


圖49　高學治、楊守敬、丁彥臣雙鈎《西嶽華山廟碑》比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0　《沙南侯獲碑》清拓本及張德容雙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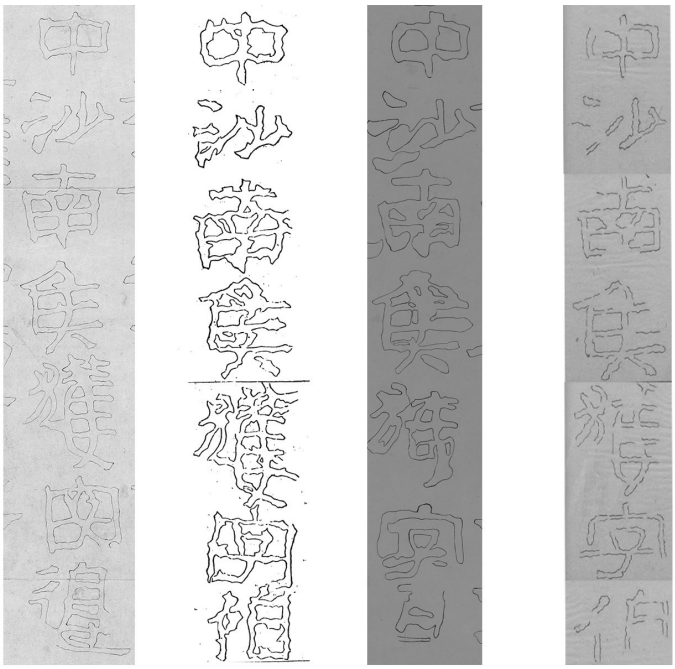


圖51 張德容雙鉤、張德容《金石聚》印本及何紹基、吳大澂雙鉤《沙南侯獲碑》單字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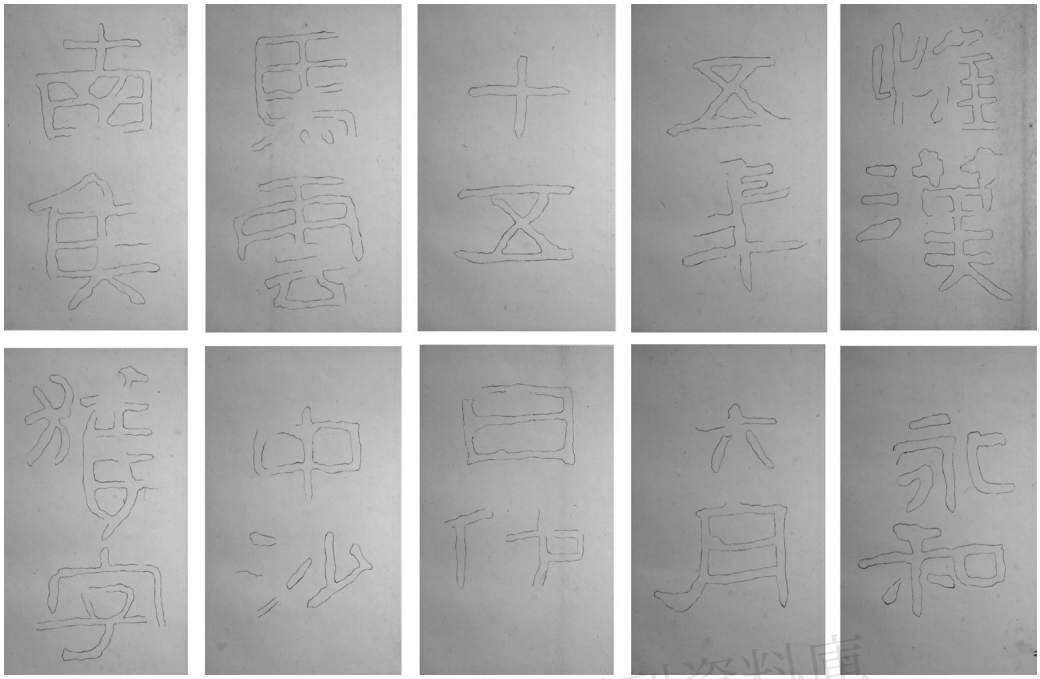


圖52 吳湖帆 雙鉤《沙南侯獲碑》（以吳大澂鉤本為底本） 上海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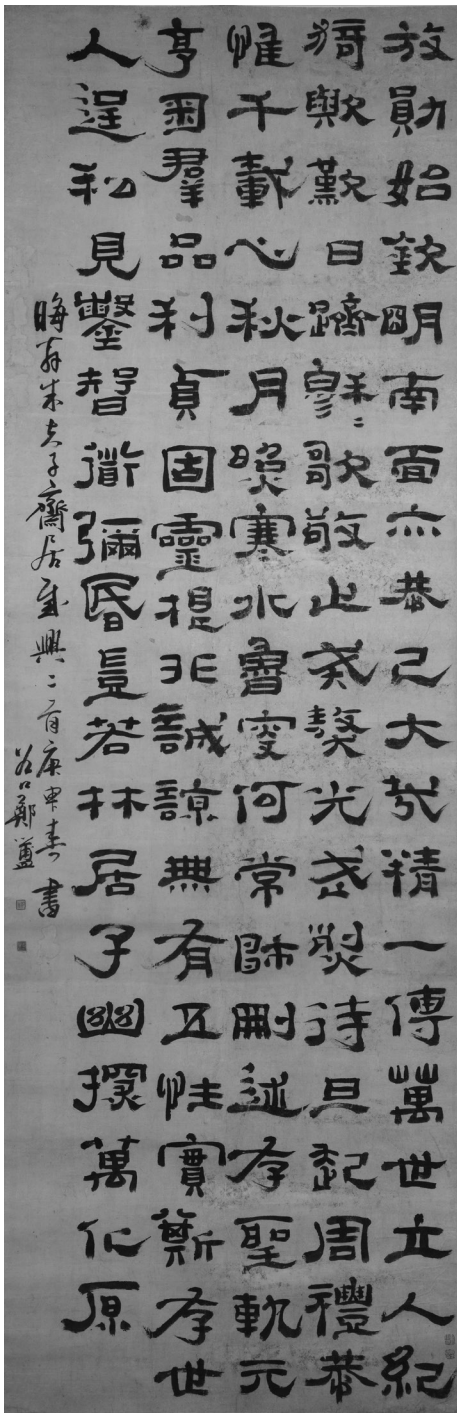


圖53　鄭簠　隸書《朱熹詩軸》　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4 翁方綱隸書對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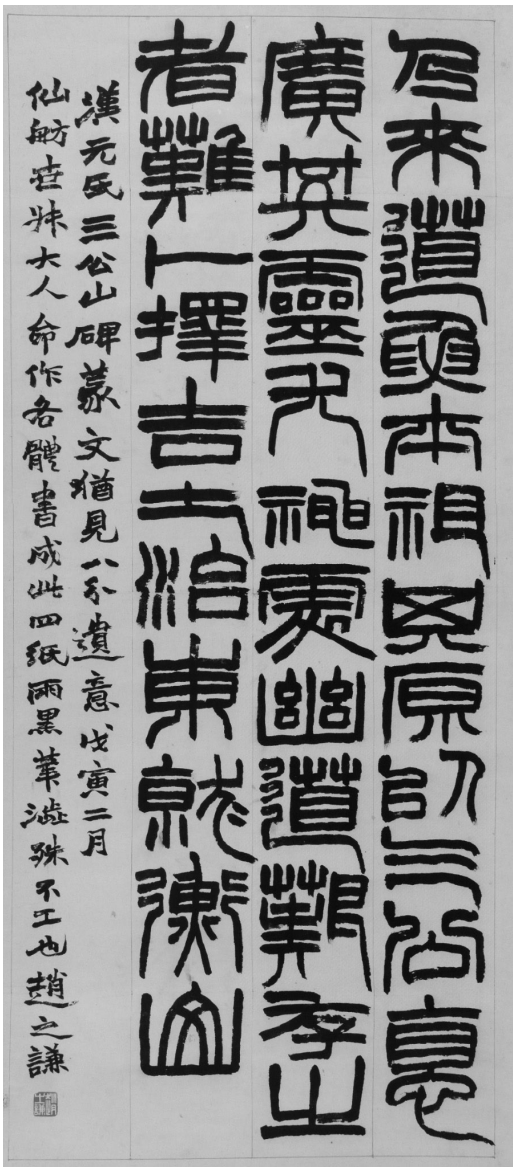


圖55　趙之謙　臨《祀三公山碑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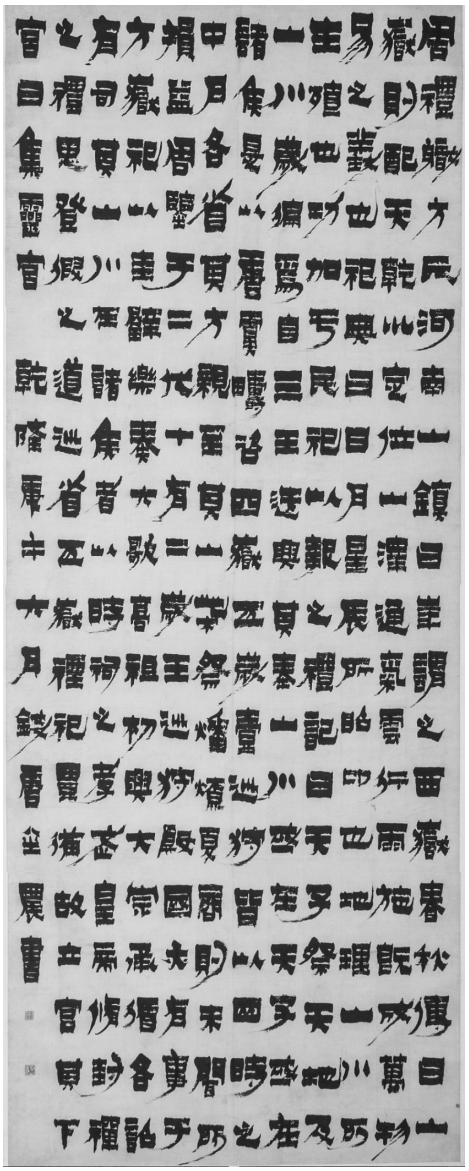


圖56　金農　漆書《西嶽華山廟碑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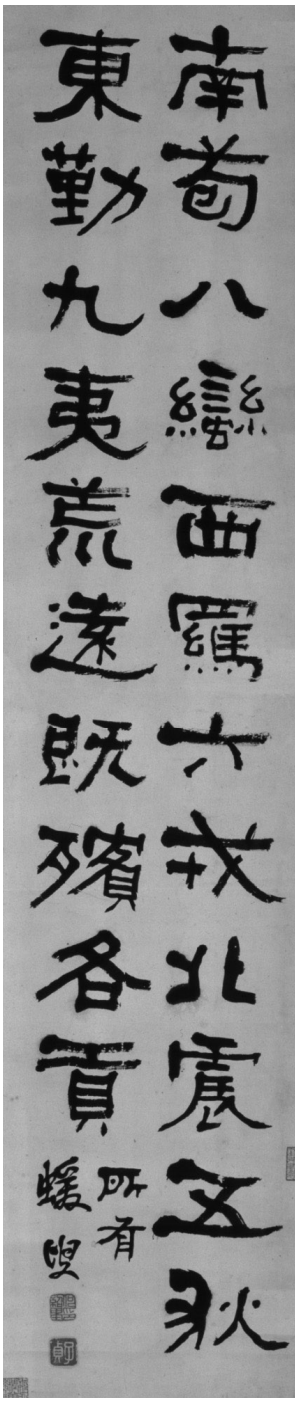


圖57 何紹基 臨《張遷碑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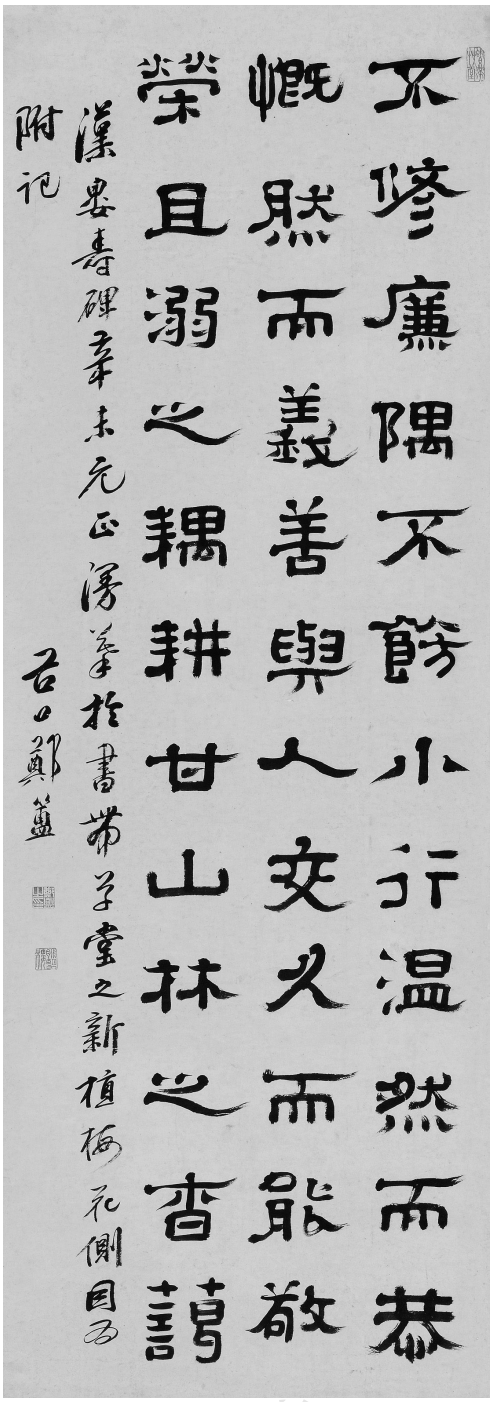


圖58 鄭簋 《臨婁壽碑軸》 見北京保利2014年秋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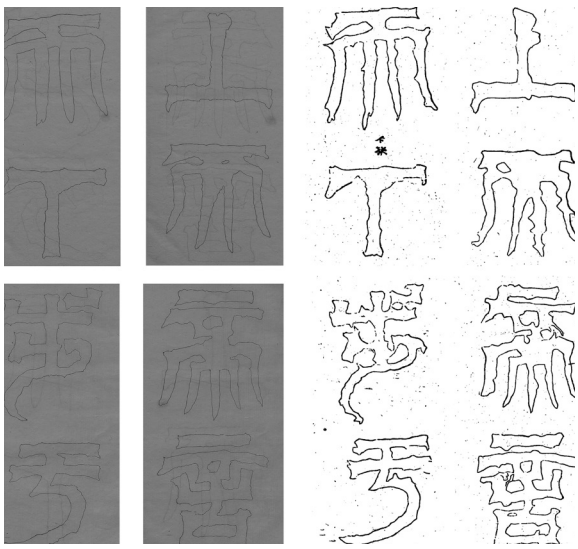


圖59　楊守敬、高學治雙鉤《天發神讖碑》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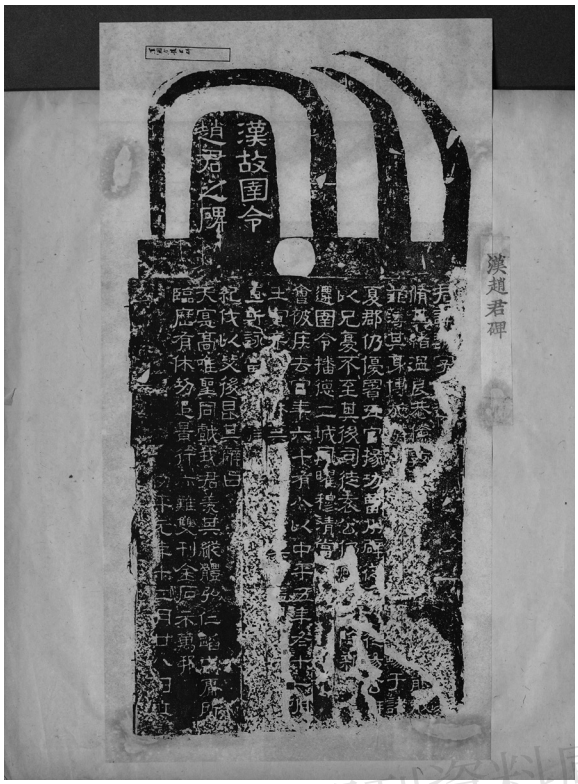


圖60　楊守敬《寰宇貞石圖》所刊《趙圍令碑》拓本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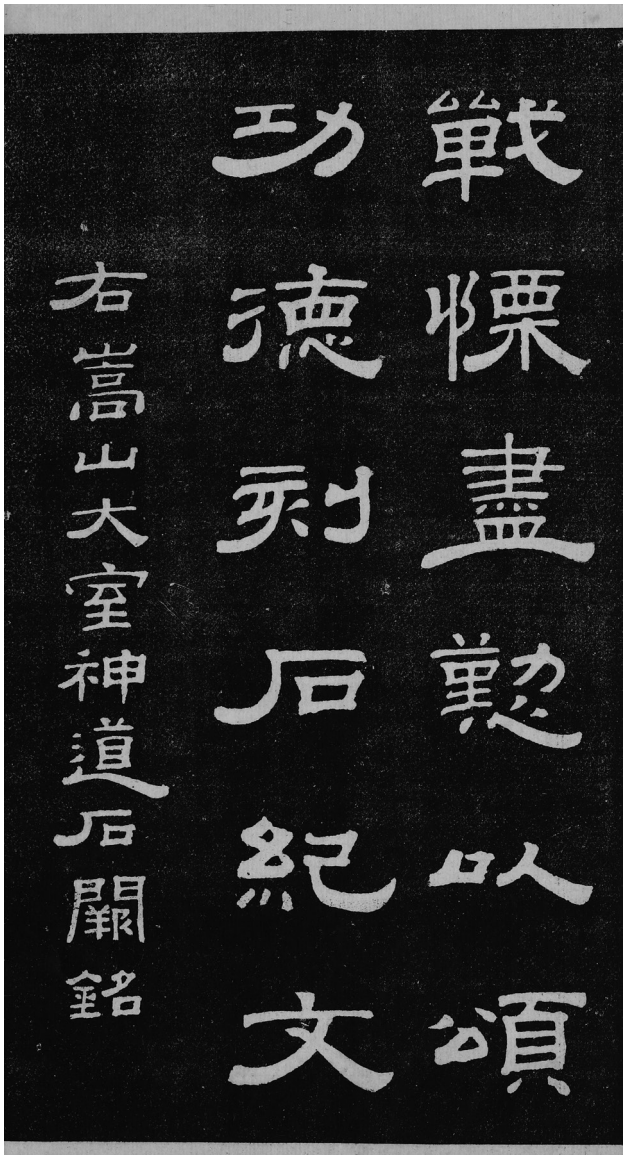


圖61 《漢碑大觀》所刊錢泳臨《嵩山太室石闕銘》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hen Tracing Copies Became Models for Calligraphy: The Tracing, Printing and Sourcing of Ancient Steles since the Qianlong-Jiaqing Era

Xue, Long-chun
Academy of Art and Archae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Since the Qianlong-Jiaqing era of the Qing Dynasty, many epigraphic scholars and calligraphers began creating replicas of the outlines of ancient steles with the method of tracing when rubbings of the precise steles were unattainable. The tracing copies not only served as a replica, research material, and an ancient stele engrave, but also as objects for artistic appreciation and model template for calligraphy. When tracing copies started to be reprinted and became widely available, they incarnated as the primary resource for the Qing Stele School Movemen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issues resulting from tracing copies as works of canon based on the tracing activity and its function since the Qianlong-Jiaqing era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out the lineage of rubbings, the visual focus fell onto the start and end, shapes, and margins of brush lines and dots. This to a large extent redirected the visual deliverables, techniques and aesthetics of the Stele-School calligraphy. Although the tracing copies originally served for the poor scholars with limited access to rubbings, many renowned calligraphers of the Stele School were also involved in making tracing copies. Even only occasionally, their practices inevitably played a role in shaping how the ancient steles were viewed and represented. Further consideration must be given that the tracing copy shares the same caveats with the reprinted books on engraves such as deformation, stylization, etc. Questions should be raised about the so-claimed legitimacy of copying from tracing copies equalling the original works of the Stele School.

Keywords: tracing copy, printing, rubbing, Qianlong-Jiaqing era, the Stele Schoo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